

夏潮論壇 1

探討的、批判的、進步的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一日出版

第一卷・第一期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巴金回想錄•

台北縣地方壟斷勢力的分析

新生代的新走向——訪「在野」編輯

第三世界電影探討——今天的印

度電影

陳鼓應的個人經驗與社會經驗

● 發刊詞 ●

春 天

一九七九年「夏潮」出版了元月號以後，因被停刊而與讀者告別，至今已整整四年。四年中，「夏潮」的編者和作者則曾經嘗試過出版「鼓聲」、「春風」，但都遭到了和「夏潮」同樣的命運。

在過去「夏潮」出刊的四年當中，我們贏得了不少的不虞之譽，例如，說「夏潮」的出現標識著七十年代末期台灣青年知識份子的覺醒。「夏潮」停刊兩年多後，還有人說：「『夏潮』培養出許多具有批判能力的、苦幹實幹的新生代，他們目前雖然彼此分散著，但在政論界、文化界中，人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夏潮』那種深遠流長的影響力——『夏潮』的影子幾乎無所不在。」

除了不虞之譽外，我們也受到不少的不虞之毀。例如，島內的「疾風」集團，指責我們是「統一派」，是國民黨「真正的敵人」；海外一些自稱「台獨左派」的人又指責我們是「沙文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典型傾向」。

「夏潮」有不虞之譽，是作者們的努力和讀者們的鼓勵，也是當時思潮所致，對於一些善意或惡意的批評，我們也都虛心檢討過，由於能力和知識的局限，我們確實犯過不少錯誤，有片面而不周全的地方。在檢討和反省過去時，我們特別懷念日據時代追隨蔣渭水參與台灣民眾運動的前輩黃師樵先生，他一向愛護本刊，但已在一九八〇年元月二日逝世了，黃先生在逝世前還在關心「高雄事件」，並向友人詢及在被拘偵詢中的本刊編輯人員，另外，我們也懷念那些在獄中或放逐在海外的本刊作者。

這四年來，世界局勢有了許多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正面臨三十年代大恐慌以來的最嚴重考驗。

戰爭的危機還來自蘇聯擴張主義的挑釁，越軍入侵高棉，俄軍入侵阿富汗，波蘭政局也與蘇聯有關。然最近布里茲涅夫去世，安德洛波夫上台，中蘇共和解，美國、中共、蘇聯似乎形成三角對立之勢。另外，日本除竄改其侵略史外，中曾根康弘上台，已經揚言擴軍及修改日本的和平憲法。在爾虞我詐的列強鬥爭夾縫中，第三世界各國的內部也繼續呈現擾攘不安的局面。

以中國的局勢而論：在大陸，鄧小平鬥「凡是派」有一定的斬獲，但在經濟調整上並無起色，似乎還要調整下去。以青年工人為主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由絢爛而慘遭鎮壓，以致使鄧小平與「思考的一代」徹底決裂。人民是最富生命力的野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陸民主運動在美國萌出了新芽——「中國之春」出現了。

台灣自「高雄事件」之後，又經歷了二次選舉，選票證明人民的民主願望是不能撲滅的。從一九八一年後，被停刊的黨外刊物開始復刊；新刊物的創辦，雖不時有查禁、停刊之處分，但由於數量眾多，也蔚為言論界之風氣。這一方面固然表示執政當局的某種程度的開明，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歷史的車輪畢竟是不能倒轉的。

再者，八十年代的中期以後，政治上又作為「法統」象徵的國大代、立監委也勢必發生難以為繼的問題。在經濟上，我們以前一直批評的經

的 宣 言

濟問題，愈來愈嚴重了。這項事實令以往自詡台灣經濟「奇蹟」的經濟官員也不能不承認了。經濟蕭條直接影響基層民衆的生計，種種社會問題隨之而起，並終必影響政治。屆時台灣將何去何從？

本刊在復刊之際面臨著這種國內外的問題，值此復刊之際，我們也想把自己的方針和理想向讀者諸君作一告白。

一、由近代資本主義所建立的經濟政治制度及其文化，造成人類精神之空虛，及生態破壞等等問題，我們要有一定的批判，並從批判中尋求其合理的部份。對由馬列教條建立的極權主義，所造成人類精神和肉體的摧殘，我們也要有一定的批判和揚棄，以尋求真正的「人的解放」的理論途徑。對列強之間的軍備競賽造成戰爭危機之因素我們也要有所分析和批判。

二、第三世界的人民今天雖仍然處於被壓迫與被剝削之地位，並且各國之間也矛盾重重，對第三世界人民爭取自由的奮鬥，我們義不容辭必須聲援。並且，我們認為佔世界人口最大部份的第三世界人民一旦解決自己的問題，終必成為決定人類未來的主力。只有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出現，也才能阻止列強之間的戰爭。並且，今天的中國（包括台灣和大陸）亦屬第三世界，故第三世界各國奮鬥的經驗亦有值得我們研究參考之處。

三、從康梁變法失敗以來，中國人民歷經辛亥革命、北伐統一、八年抗戰、中共統治，終於新一代的青年起來爭自由、爭民主。經過一百多年，中國人民竟又重新要回答「中國往何處去」

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不能以任何政權的意識型態來掩蓋問題的本質。在方法論上，解決中國問題，就必須對其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予以科學的分析，根據中國過去的經驗和現實探索中國的道路。我們願意和大陸同胞共同探索中國的道路，也願意和大陸同胞共同締造祖國的春天和促進祖國的統一。

四、台灣是我們的鄉土，我們聲援大陸的民主運動，更聲援台灣的民主運動，並且也希望大陸的民主運動能聲援我們。國民黨當局應該知道自己總理所說過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遺教。除了為民主、自由、人權奮鬥外，為了台灣的現在和未來，我們認為台灣問題的研究有其必要。探討台灣問題，我們也必須對台灣問題的社會根源和歷史根源有科學的分析和調查。

本刊以往一向被認為是台灣民主刊物之一，未來我們將更堅持此一立場。但我們認為有正確的理論才能有正確奮鬥的運動，孫中山嘗言：「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人心的改變，是有利於促進民主的。因此，在民主運動的陣營中，我們願意從文化、歷史、文學、藝術、哲學的各種領域中來探討世界和中國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的道路還很遙遠、崎嶇，但歷史的巨輪總是前進的，歷史的殘餘終必消失在歷史之中；冬天一定會過去的，春天必將來臨。在春節來臨之時，讓我們懷抱樂觀奮鬥的信心踏著前進的步伐，迎向春天的陽光！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一日出刊

● 第一卷 / 第一期 ●

夏潮論壇 目錄

● 發刊詞 ●

■ 政治經濟 ■

每月評論

地方壟斷勢力分析系列

春天的宣言

- | | |
|--|---|
| <p>4. ● 努力做一名政治犯
● 利益團體的污染
● 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 評宋楚瑜的「文字遊戲」
● 公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嗎？</p> | <p>陳嘉宗
郁浩
慎思
羅利滾
顏華</p> |
| <p>8. 土地保衛戰
——二重疏洪道示威真相</p> | <p>何文振</p> |
| <p>12. 租賃公司
——新興的暴利行業</p> | <p>陳振興</p> |
| <p>14. 新生代的新走向
——訪「在野」雜誌編輯</p> | <p>春雷</p> |
| <p>20. 黨外的抉擇</p> | <p>汪立峽</p> |
| <p>22. 台北縣地方壟斷勢力的分析</p> | <p>王乃文</p> |

發行人 / 柯水源

社長 / 黃溪南

總編輯 / 蘇逸凡

執行編輯 / 鍾喬

美術編輯

業務經理 / 王智章

廣告顧問 / 進步廣告小組

發行所 / 台北市泰順街59巷10弄12號4樓

編輯部 / 台北郵政第29-247號信箱

電話：(02)9144333

劃撥帳號 / 555202 黃溪南

零售 / 國內每册新台幣50元， 國外每册美金2元

長期訂閱 / 國內：全年12期500元 半年6期280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30元

亞太地區美金26元

港澳地區美金20元

印刷所 / 翔象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大路640巷30號

■ 世界之窗 ■

潛望鏡

名著書摘連載

■ 歷史與思潮 ■

近代西洋史講話 (連載)

歷史小品

書介

■ 藝 文 ■

光復前文學研究系列

大陸文學

詩選

■ 電影廣場 ■

第三世界電影
系列探討

■ 環境與公害 ■

- | | | |
|-----|---------------------------------|---------------------|
| 30. | 世界中心移向亞洲 | 蔡仲章 • 譯 |
| 32. | ● OPEC 與西方世界
●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癥結 | 陳 新 |
| 34. | 大眾消費時代的終結 | 犬田 充 • 著
金 劍 • 譯 |
| 39. | 歐洲資本主義的萌芽 | 學 述 |
| 42. | 從個人經驗到社會經驗 | 陳鼓應 |
| 46. | 從日警的黑牢中死裡逃生 | 洪瑞麟 |
| 47. | 甲午戰爭與台灣的割讓 | 杜 宇 |
| 48. | 評「西方美學史」(上、下二卷) | 張恆豪 |
| 49. | 「送報伙」五十年訪楊達 | 鍾 喬 |
| 52. | 麒麟兒的夢
<small>朱點人及其小說</small> | 張恆豪 |
| 58. | 「詩人」又鬧笑話了！
——中華民國詩人代表團在西班牙 | 張香華 |
| 62. | 巴金回想錄 | 張香華 |
| 55. | 路 | 集體即興創作 |
| 69. | 今天的印度電影
——三位印度新潮導演訪問記 | 韓良露 • 譯 |
| 77. | 一隻台灣黑熊的控告 | 徐上山 |
| 80. | 公害日誌 | 編輯室 |

北美洲代表 / MR. JAMES NING
106 ROOSEVELT BLVD.,
FLORHAM PARK, N. J. 07932
U.S.A.
美西聯絡處 / MRS. San San Chen
2627 Hillegass # 104
Berkeley Ca. 94704
U.S.A.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誌第3474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 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為感謝您的鼓勵，即日起至三月底
止，工農朋友、學生讀者六折優待
全年300元；一般訂戶八折優待
全年400元。



夏潮愛大家，大家愛夏潮

——夏潮徵求贊助性榮譽會員——

“夏潮”又出刊了，
開始了再一次的漫長新征，
在這坎坷艱辛的征途上，
夏潮需要您——
需要您的精神鼓勵與財務支持。

只要您捐贈五千元，您就成爲
夏潮的榮譽會員，您就可以
成爲夏潮的永久性訂戶，
更是夏潮的永恆之友。

榮譽會員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帳戶 •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自立叢書

出版者：自立晚報

· 服務專線：351-9621轉262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 劃撥：3180帳號自立晚報社

總代理：忠佑實業有限公司

· 電話：393-6770

■ 郵購一律九折優待(不包括特價)

① 自立藝苑書畫選集

自立晚報編印
定價600元

自立藝苑書畫選集，係精選宋、元、明、清及近代時賢書畫、金石二百餘家、三百餘幀之代表作品，以八開銅版紙彩色精印精裝，足以存真，無論欣賞或珍藏，均具價值，共二〇八頁，定價六百元。

② 台灣民族運動史

吳三連等著
定價250元
特價200元

本書描述民國三年至民國卅四年之間，數百萬台籍同胞在日本殖民帝國統治下掙扎、奮起、衝刺以爭取民族尊嚴的一系列民族運動。將卅三年來血淚凝聚不朽的民族情操，萬千個烈士捨身塑造的大漢尊嚴，詳盡完整的記載出出，共五六八頁，二十四開。

③ 蓬壺擷勝錄(一)(二)(三)(四)

林 藜著
每冊定價100元
合購四本特價300元

台灣又稱美麗之島，名勝古蹟遍佈，今所遺留建築多樸質可愛。本書作者鑑於台灣大陸血脈相連，不僅對山川景物普作指引，進而對文物因革，風俗民情善作報導，可視為探風問俗的經典之作，共八五七頁，二十四開。

④ 法窗夜語(一)(二)(三)

吳啓賓著
每冊定價80元
三冊合購特價180元

吳啓賓律師以故事形態、深入淺出的方法灌注您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的法律常識，不僅可以培養國人守法的精神，維護個人合法的利益，對於違法亂紀者也有遏阻的效力，共四五五頁，三十二開。

⑤ 吳豐山專欄(一)(二)

吳豐山著
單冊定價60元
合購特價100元

吳豐山專欄是國內唯一正式具名之長期性政治專欄，自六十四年迄今仍屹立不斷，以鼓吹民主法治和繁榮為寫作準則，常能言人所不敢言或不願言，對時政發揮相當影響力。現書已出版計第二冊，共四三四頁，三十二開。

⑥ 替歷史作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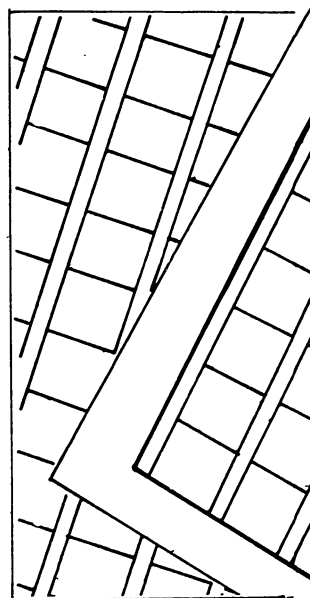
張忠棟等著
定價100元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許多專家，學者踴躍地提出鞭辟入裡的見解，本報鑑於此乃輯各家之說，逐日整理成「替歷史作見證」以為這一代有良知、有勇氣的知識分子為維護人權所留下珍貴的記錄，共二四五頁，三十二開。

⑦ 雷根小傳

章台生、林琳著
定價 60元

本書係中文版介紹現任美國總統生平最詳盡的一本，作者因此得雷根總統親函致謝。內容自雷根總統童年至大學時代、好萊塢生涯、州長任內迄三度問鼎白宮，皆有詳實報導，共一四九頁，三十二開。





慈林教育基金會 典藏
新夏潮

不要忘了買舊“夏潮”

敬請珍惜民國67年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當您翻開這一本中斷了四年，爾後復出的“新夏潮”，請您不要忘了四年前“舊夏潮”波瀾壯闊的一年，就是那一年，文學界掀起了空前激烈、燦爛的大論戰——鄉土文學論戰，就是那一年，黨外開始了行動上的大聯合，就是那一年，中美斷交突然宣佈了，也就是那一年，新人輩出、洶湧澎湃的大選舉，中途停止了……而“舊夏潮”也就在那一年停刊了……。

“舊夏潮”第四卷、第五卷合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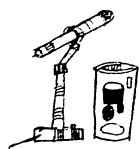
第四卷中華民國67年1月~6月

第五卷中華民國67年7月~12月

要目：

1. 鄉土文學論戰——
 王文興教授談鄉土文學的功與過
 論鄉土經濟與鄉土文學
 胡秋原論王文興 nonsense in sense
 中國人立場之復歸
2. 論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
 諍言給「聯合報」副刊
 為大老板服務的報紙
3. 黨外民主運動大採訪——
 訪問康寧祥、蘇南成、康水木、余登發、黃順興、陳鼓應、周滄淵、張德銘……。67年大選選情分析
 黨外民主餐費報導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1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7元 / 亞洲美金5元 / 港澳港幣25元 (存書不多，欲購請從速。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五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南帳戶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號信箱 ●電話：9144333



每月評論

努力做一名政治犯

□陳嘉宗

我同情政治犯，我認為政治犯都是義人。

基督是羅馬帝國的政治犯，他是義人；蘇格拉底是古希臘霸權的政治犯，他也是義人；孫中山先生是清廷的政治犯，他更是我們所熟知的義人。

所以，政治犯不僅僅是義人而已，他們往往還是造福後世的偉人。

讓我們向政治犯學習。

行政院答覆立委質詢說，我國沒有政治犯，那麼，幾處政治監獄豈不都是白蓋的！行政院答覆質詢一向慣於閃避重點（像王迎先命案的答詢），顧左右而言他（像報禁答詢），掩蓋事實（像陳文成命案答詢）；日積月累，撒謊成了專長。

行政院說，在監的都是叛亂犯，因為他們都經過法庭審判；這個簡陋的歸納法，充分暴露行政院高級官員 IQ 之低。金大中經過韓國法庭審判，阿奎諾經過菲律賓法庭審判，魏京生經過中共法庭審判，金、阿、魏的統治政權也都認為他們是叛亂犯，但國際觀感怎樣呢？我們又是怎樣在捧魏京生呢？

我們必須教國民黨政權徹底覺悟，台灣已經不是一個你愛怎麼做就可以怎麼做的地方，縱然衰病老死綠島，政治犯的鬼魂還是要驗明正身；不是一句「叛亂犯」就鞏固了政權，遮住天下耳目。

什麼樣的政權最可惡？在我看來，沒有比壓制言論自由的政權更過之的了。台灣在二十餘年的禁限報導下，已經使政府的一切說法變得可疑。

木炭再怎麼洗，依舊是黑的，謊話講一千次不會變成真言。

如果因為一篇評論文章，引來「某單位」的

騷擾，甚而「節外生枝」，這永遠是一樁政治事件。我願為此事做見證。

讓我們努力做一名政治犯，好教我們的後代免除這個威脅。

利益團體的污染

□郁浩

最近立法院、台灣省議會和台北市議會，都因電動玩具的取締與補償問題，出現正反兩面意見、針鋒相對的現象。

在立法院，先有主張准許電動玩具合法經營的委員提出聯合質詢，持反對立場的立委立即跟進，提出相反的質詢；在台北市議會，本月廿日舉行電動玩具問題公聽會，正反意見強烈衝突；在省議會，民政委員會於廿四日初審電動玩具營業查禁辦法，然後交由大會審議。

三個民意機構處理電動玩具問題，都是因為業者向民意代表進行遊說活動，部分民意代表也樂得為業者爭取利益，以累積政治資本。這種現象說明利益團體的影響能力漸趨強勁，其活動方式已從隱密性轉為公開性，成為我國政治體系運作過程中一股無法漠視的力量。

在民主社會中，不同階層或行業之間，利益不盡一致，各自以共通的特殊利益集結起來，對行政部門或民意機構行使壓力，以追求各別集團的利益，於是利益團體成為具備壓力的準政治團體。

壓力團體的形成因素，不外是：①現代社會的利益趨於多元化，各行業的利害和慾望不同，為追求共通利益而組合起來；②政黨無法涵蓋所有團體的不同利益，大多數政黨都無法公正不倚地踐行代表功能；③政府機能擴大，擁有極大權力處分人民利益，相關利益團體不得不起而向公權力機構爭取利益。

所以，壓力團體擔任著表達利益和統合民意的雙重功能；和政黨擔任的政治功能並無根本差異，壓力團體是以實現特殊團體利益為目標，缺乏整體性的政治理想，普遍都有「知偏不知全」的缺憾。

這種將「私利」轉化為「公爭」的團體，基本上並非政治上的干擾因素，也絕非一種罪惡。如果壓力團體的活動方式步上正軌，不循違法途徑活動，且利害衝突的利益團體都擁有公平而充分的機會施展政治壓力，則壓力團體的功能可補政黨政治和代議制度的不足，使各群體的民意真正表達出來，影響政治的決策，達成民主的理想。

然而，壓力團體的本質即在追求私利，極易以私害公，造成種種弊端，例如：①以政治資金支持政黨或個別政治人物，使政黨或政客淪為其利益代理人，侵蝕政黨和議會的代議功能；②利用「施給和取得」的原則，收買政治人物，造成政府、政黨或議會的腐化；③組織能力强或活動經費多的利益團體，對政治決策擁有較大影響力，利益與其衝突的團體因力量較弱，而對政治毫無影響力，造成決策不公和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

這些弊病已逐漸在我國社會出現，如果不能及早規訓利益團體的活動規範，將壓力團體的活動導入正軌，則上述弊病必將益趨嚴重，違害我國政治體系的公正性和清純性。

政治歸政治， 藝術歸藝術

□慎思

前陣子報載文建會主辦「年代美展」，因有七件人體藝術作品，被國父紀念館管理當局認為裸露的女體對國父不敬，乃以「有損尊嚴」為理由，嚴拒在中山畫廊展出，此事經傳播界披露，喧騰一時，引起國內關心現代藝術人士的紛紛議論；二十一日又報載中影正籌備拍攝的「孫逸仙博士」，由於有人主張國父在戲中不宜正面露臉，已使得整個籌備工作受阻，而某些電影界人士對於此一干預，深感不以為然。

其實這些都是老問題，就像中學生的髮型一樣，儘管輿論界與學生們的反應相當熱烈，而主管單位卻視若無睹，不敢也不願去面對實際問題

。從上面這兩則已不算新的「新聞」，可說都牽涉到一個相同的觀念問題：即有關人士對國父精神的認識如何？和對文化藝術的態度又如何？

孫中山先生的一生，反封建專制的壓迫，反帝國主義的侵略，具有平等博愛的偉大胸襟，以及民主自由的前進思想，在不斷流血犧牲的失敗與奮鬥中，殷切希望能建立一個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這位有新觀念與平民風的開國之父，絕對沒有想到在他逝世半世紀之後，他的肖子肖孫中竟然有人用他終生所反對的舊思想與帝王夢來紀念他、效法他。

人體藝術，究竟是藝術，或抑色情？這在先進的文明國家已是不必再爭得面紅耳赤的問題。或許管理單位太低估了國人的藝術品味，惟恐污染我們的世道人心，而我更相信凡有心進國家畫廊參觀者，必備有起碼的鑑賞水平，相信都能以健全的心理去欣賞人類共通的語言；若有人以異色眼光視之，這不正表示國內的藝術教育仍待加強？那主其事者豈不責無旁貸，更應該負起教育群眾，為藝術示範的責任？或許管理單位太高瞻了國父紀念館，視裸體為淫褻，有辱神聖，不能登大雅之堂，其實在大庭廣眾中，讓人類以博愛代替仇恨，用和善平等的眼光去發現、去體會人體最原始自然的美，正是人類思想解放的一種象徵，而打破一切束縛人性的封建教條，為自由奉獻，替民主催生，正是國父終生所貫徹到底的。有關人士的食古不化，國父地下有知，能不感慨歎呀？

再言籌拍「孫逸仙博士」，無非旨在追思國父一生救國救民的行儀，以做為當今青年憂患興邦的楷模，並且拆穿中共統戰所謂「辛亥革命乃資產階級革命」之謬論。因此，以平實的角度，將這位偉人拍得愈親切、愈人格化，愈能拉近國人感情的距離，激發有血性、有良知的海內外中國人由衷的敬仰，當然更有說服力的粉碎中共的統戰陰謀。豈能「基於敬意及恐演員形象、氣質不能表達國父之偉大於萬一」的理由，便因噎廢食，開倒車式地將國父造型神格化或帝王化，實在大大違反了國父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精神。而且，主角人物不能露面，那劇本如何

編寫？影片如何拍攝？豈不授人笑柄？中影已往所拍攝的「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笕橋英烈傳」，由於八股教條的作祟，顯得拘泥自限，放不開來，將張自忠、謝晉元、高志航拍得英氣肅然，悖離常情，洵不如外國影片將麥克阿瑟、隆美爾、巴頓將軍塑造得那麼自然親切，富有人性。藝術創作貴乎人性，有深刻的人性寫照，才能撼動人心。不能引人共鳴，還談什麼宣傳效果呢？

要使一個有自尊的民族走向現代化，除了要有現代化的科技和設備外，更需要有現代人的觀念和精神。尤其在一個開放的民主社會，群眾的眼睛是明智雪亮的，千萬勿以政治的狹隘心理去干預文化藝術的自由發展，政治是一時的，文化藝術却是永恒的，讓政治歸於政治，文化歸於文化，主其事者能不慎思乎？

評宋楚瑜的 「文字遊戲」

□羅刹滾

這一陣子，新聞局長宋楚瑜突發「靈感」，不斷推出新口號，如「中國歸中國、中共歸中共」、「比中共更中國、比台獨更台灣」、「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而是中國人的台灣」等等，文字生猛鮮活，句子講究音韻，唸起來順口，真可謂「字句珠璣」。

在現代複雜的社會，主管全國性新聞傳播事業的單位，爲了維護國家的新形象、廓清輿論界的「混淆視聽」，經常創造一些簡單易懂、暢達有力的口號，藉收宣傳教育之宏效，的確有其必要性。但是，在提出甚至推廣某一種口號之前，若不能慎重斟酌字義、注重邏輯，因而造成紛歧疑慮，反而容易產生誤解和反效果。

就以「中國歸中國、中共歸中共」來看，宋局長原來是希望藉著吳榮根的來歸，呼籲自由世界不要把「中共」和「中國」混爲一談；但在直覺判斷上，這句話容易引發「兩個中國」的聯想，即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河水不犯井水，各歸各的，這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原則背道而馳。

再說到「比中共更中國、比台獨更台灣」。宋局長強調政府在台灣的建設，無論就所本的精神或實際的施爲來看，這句話是最好的註解。但是，它同樣容易讓人產生誤解。因爲，這句口號無異承認中共也是中國，只是程度上有別而已，否則何來比中共更中國？相對地，這句話也承認台獨就是台灣，否則如何比台獨更台灣？尤其後者，更容易讓人臆測中華民國政府似有強烈「台灣化」的傾向。

最後，我們再看「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而是中國人的台灣」。這句話，容易助長民族分離主義的氣焰。因爲海外台獨高唱「台灣民族論」，渲染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我們不同意這種偏激的論調，我們始終相信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如今，新聞局提出這句口號，間接承認「台灣人」和「中國人」不同，豈不是自己往海外台獨的窠臼跳，呼應「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說法？

總之，新聞口號固然首重文字新鮮、簡潔有力，容易上口；但對於內涵和用意，也務必講究清晰、力求肯定，不能籠統、含混。譬如，前面第二句口號若說成「比中共更愛中國，比台獨更愛台灣」，第三句若說成「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也是中國人的台灣」，豈不更具有立場和說服力？

寄語宋局長，「文字遊戲」應避免「混水摸魚」，徒生副作用；今後有必要再提新口號時，應該慎重，兼顧正反面效果，以免自失立場，也予人攻訐之口實！

公權力是至高 無上的嗎？

□顏華

在執政者罔顧民意，悍然執行的威勢下，二重疏洪道終於在鎮暴部隊的重重護衛中開工了！開關工程所引發的糾紛，據省府主席李登輝所言

，其繳結在少數不明就理的頑固份子向政府的公權力挑釁，是少數敗類勾結群眾企圖搗毀政府的公權力。李主席並指出：「政府依法執行公權力，此一公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不容許任何人以其野心和私利加以侵犯。」堂堂省府主席運用如此強烈的政治性語辭，來為一項基本上是法理的問題進行強辯，我們實在不敢苟同。

這次政府徵收開關疏洪道用地，雖說是依據土地法第二〇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國家因水利工程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法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因此說公權力是至高無上，則可能是對公權力觀念的誤解。因為，法律關係的發生，必需符合法定構成要件並踐行合法程序，對於問題的爭議亦賦予人民異議的權利，可見公權力與私權利同時在法律的規定內受到相對的看待。而事實上，請願的民眾便是依據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進行抗議與呼籲，執政者應該尊重人民的土地所有權。

眾所週知，此番疏洪道工程强行開工，根本未曾顧慮土地權利人的基本補償費。以致造成如此巨大的示威，抗議行動。依據法律上規定，土地權利人對補償費過度偏低有異議時，地政機關應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只是，評定的

結果，往往還是不可能達到民眾的基本訴求，是以法定補償地價永遠與市價相去甚遠，如此一來，必形成官民對峙，爭執不下的局面。這是現行體制蔽病層出不窮的必然後果！

基於以上的觀點，我們實在無法同意李主席的看法，基本上，他誤以為統治權便是公權力，統治權可以是至高無上，公權力卻絕非至高無上，如公權力是至高無上，又何必設計許多制度來牽制它，以使人民有補救的可能？如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乃至國家賠償法，都是在公權力執行有違法或不當時，給予受害者補救的機會。我們在此還要依法理的觀點鄭重指出，在公權力的操作過程中，除符合法律所規定的程序外，也該讓行使公權力的對象獲知其所能享有的權利。否則，政府以地位上的優勢造成既定事實，就難保人民不使用激烈的手段以求抗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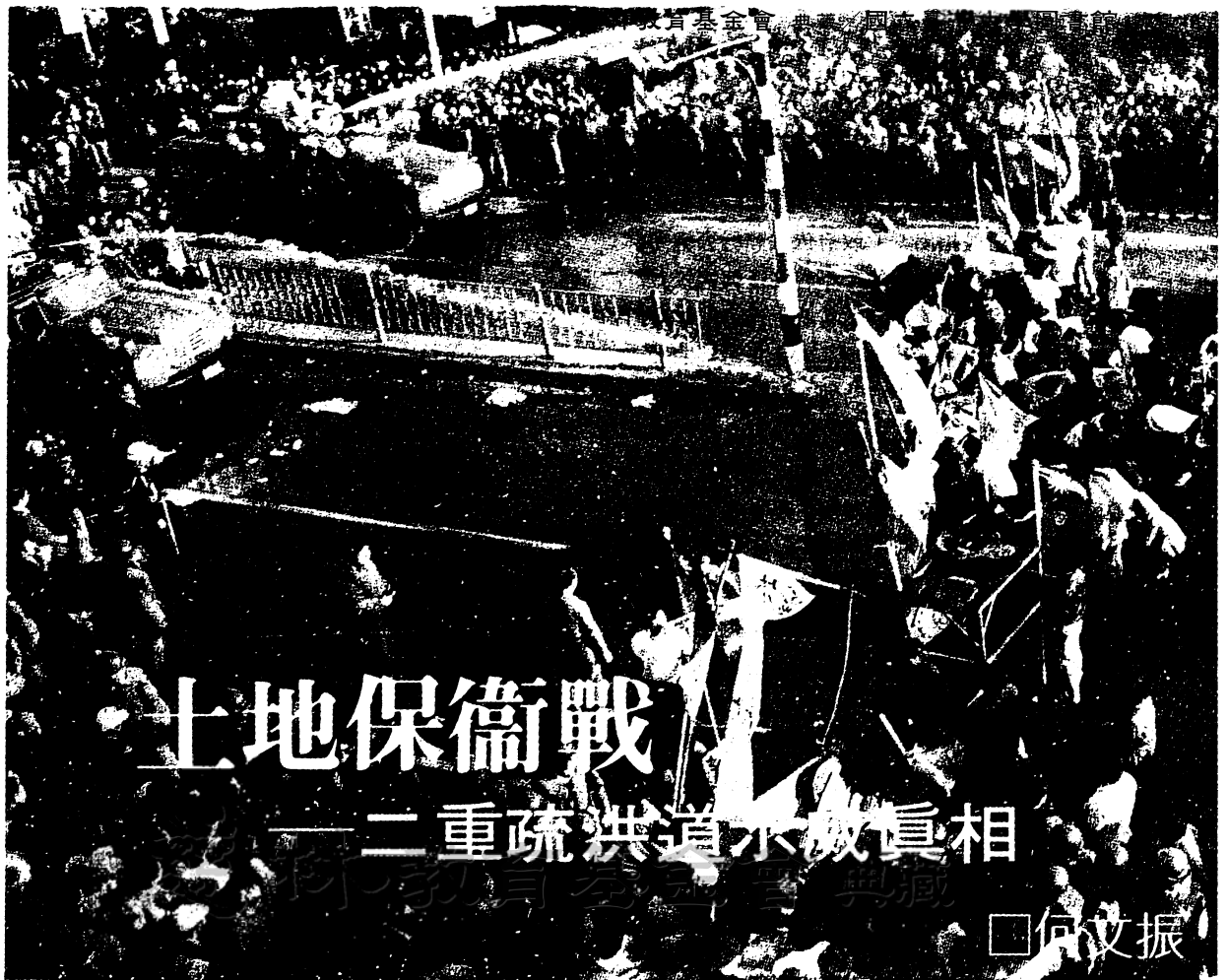
行政的手段總免不了有瑕疵，因此私權利的保護必需獲致可期待的權衡。基於對法治前途的關心，我們實在不忍繼續看到一項公共政策的執行，人民無從依合法的程序維護自己的權利，再者，主其事的公務人員也應該具備更豐富的法律常識，否則非但法治前途堪憂，徒然造成了官民之間的嫌怨，更是推行民主政治的一大絆腳石！

夏潮的朋友，請您來投稿

——夏潮徵選精簡有力的短篇小說創作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是社會寫實的、批判的、各階層的，
夏潮所需要的短篇小說
最好是五千字到八千字之間，
不長不短，不多不少，
只要是好小說，
夏潮將致一字一元稿酬。

投稿請寄：夏潮雜誌社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29～247信箱
電話／(02)9144333
(請於信封上註明「小說徵選」字樣)



土地保衛戰

——二重疏洪道水淹真相

□何文振

向幽冥世界求公道

民怨，古往今來，除非獲得公正解決，否則不但不能平息，反而會愈演愈烈。在歷史上，民怨從來沒有用強制武力就可以解決的。今年元月四日，三重市重新路五段，中連貨運公司前，我們看到了三十餘年來，在台灣所爆發最大的民怨，這件民衆對政府公共工程的憤怒抗議，已經傳遍全省。雖然在僵持九小時後，治安當局用鎮暴部隊和水龍頭，對準高舉「蔣公顯顯靈救救命」的白布標語，以及手捧「蔣公香案」的民衆噴以強大水柱，把示威民衆壓服下去，但是民怨從此平息了嗎？

北區防洪計劃已經爭論了廿年，其中反對聲音最大的「二重疏洪道」的業主，在六十八年行政院通過實施「台北地區防洪計劃先期方案」以來，便不斷請願、抗議，最後終於在今年元月五日預定開工前夕，爆發了抗議行動的最高潮，使省道交通車輛受阻達九小時，十九人被捕。

事後我們只看到報紙一面倒地報導治安單位如何用水龍頭、鎮暴警察、大巴士抓人，如何保

釋、如何偵辦其中三人，有些記者甚至還出點子要檢察官嚴辦，追查幕後是否有陰謀份子策動。如此報導媒體，非但不能公正報導民怨的真正原因，做官民雙方溝通的橋樑，反而欲嫁罪這些將無立錐之地的可憐人，真不知道今日新聞界「探求民隱」、「爲民喉舌」的良心那裡去了？

當一般電視報紙在宣傳防洪效益，希望民衆體諒政府苦心，充分做到「捐棄小我，完成大我」之際，對於這些年該地民衆請願案中一再指出的疑點——關渡出口太小，加上颱風海水倒灌，洪水難以適時排出一一卻絲毫未曾交待。政令宣傳既然無法解答大眾內心的疑惑，到底如何要求民衆犧牲小我？又怎麼可能疏導、平息民怨呢？

民怨爲何不斷擴大？

二重疏洪道業主們，這二、三年來規模一次比一次大的抗議運動是如何形成的呢？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業主們曾向第六屆省議會陳情，當時黨外省議員張俊宏即向建設廳長楊金樞及水利局長等省府官員質問：對於二重疏洪道完工後的防洪效益，到底有沒有把握？敢不敢

保證絕對有效？——然而，當時有關省府官員竟然答稱：「不敢保證！」

對於這件將耗資四十五億（那時之編列預算）、拆除工廠民房千餘家、徵用民地一百五十餘萬坪；若再加上板橋配合築堤的工程費、地價補償費及土地廢棄損失等，耗資一千餘億的大事，我們的省府官員居然對其效益不敢保證。

當時輿論曾為之嘩然，於是省議會七十多位議員一致通過決議，請政府暫緩實施。

可是面對全體民意的反對，政府仍舊「超乎民意之外」的，於民國七十年省議員選戰結束之後，宣佈決心幹到底。於是在連番請願無效，執政者全然罔顧民意的情況下，二重地區幾百位業主終於在七十年十二月廿八日聚集三重成功路第一教練場前，沿路遊行示威抗議，造成中興大橋附近交通阻塞，有關單位只好請求築工處的拖車，將進入疏洪道工地的挖土機暫時拖走，方結束了首次的緊張對峙。

接着是官民面對面的爭辯，七十一年二月二日，省府主席李登輝接見業主代表，不料卻有五百多名關心自己權益的民眾聞風趕至。隨後二月八日，台北縣長林豐正亦在三重中山堂接見業主，結果又是近千人的大場面。

這些「官民懇談」，對於歧見絲毫無法溝通



，最後仍是不了了之。而開工的風聲又緊了，於是七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又爆發了先齋宮前廣場的群眾演講大會；由黨外前輩鄭秀卿，及陳化義律師帶頭舉行「誓死反對開關二重疏洪道」的立誓大會，至此業主們情緒激動已極！

立誓大會之後，到了十一月三十日，近千個民眾又搭乘十五輛大巴士浩浩蕩蕩的開往中興新村，求見李登輝，請求停止該計劃。由於群眾場面浩大，驚動了中警部，遂派出情治單位人員，「請」他們回去。於是省府大請願，「上告」李主席又無結果。

之後，七十二元月五日開工的消息又緊迫的傳來，在請願不成，上告無門，民意受到政府如是漠然的情況下，民怨已然沸騰，元月四日開工前夕，終至再度爆發了省道大示威！

當天清早七時，兩千多位的二重疏洪道住民，在縱貫公路邊擺起 蔣公遺像的香案，焚香祝禱，白布橫條寫着：

「先總統 蔣公顯顯靈吧！」

「敬愛的 蔣公救救命呀！」

「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

這三句標語確是使人驚心震撼的。然而僵持了九個小時，仍是抵不過鎮暴部隊及各方情治單位。到下午四點，消防車開始以水龍頭噴散示威民眾！有些民眾舉起 蔣公遺像高喊：「這是蔣公遺像，看你們敢不敢噴水？」得到的答覆是照噴！可憐這些百姓，象徵他們最後一線尋求公道的幽冥希望，隨着 蔣公遺像跌個粉碎！

從民國六十八年開始的不斷請願、抗議、示威，林林總總，無非是希望當局聽聽人民的聲音，可是結果呢？面對即將被拆毀的家園，人們情何以堪？

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

民眾之反對二重疏洪道的開關，除了對自身權益的覺醒與家園依戀外，更重要的是對疏洪道防洪效益的質疑，而這些質疑卻是當局於政令宣導中，始終避而不談的：

一由於疏洪道的出口仍然是關渡，而隘口寬度僅有五百公尺，却要匯聚五、六條河川，由此出海。因此，有人比喻，恰如人體肛門只有一個，肛門若不通，就算再增加一條直腸也是無法排洩



「不妙哉之極！水洪未疏，人洪已泛！」

的。

關渡隘口窄小的事實，當局不是不知，民國五十三年，政府曾經有拓寬關渡隘口之舉，挖掘「獅仔頭」，但因工程失敗，洩洪不成却反而引起海水倒灌，並使今日五股、蘆洲、新莊一帶，約二千甲良田盡成水上澤國。

農民慘重損失，因政策錯誤、施工失敗，浪費人民七億巨額稅款，這些過去的事也就罷了。然而既有前車之鑑，為什麼執政當局仍是一意孤行？對於民間的質疑與指責，又有那位官員曾具體的答覆過？

二蘆洲、五股一帶的土地，部份低於海平面，颱風來時海水倒灌，這帶居民常飽受水患之苦。而二重疏洪道幾乎有一半是淹沒在海潮之下，假如海水倒灌，恰好提供引「浪」入室的寬敞大道，長驅直入台北盆地，到時候誰敢保證，台北不會變成汪洋一片？這就難怪示威標語要寫着：「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

在從事防洪治水工程過程中，省府水利局雖然曾做過水工模型試驗，但卻考慮不周密，竟未思及海水倒灌的嚴重性和後果，因此一直無法說服眾人。而且水工模型亦曾留下許多笑柄。

以前根據水工模型，將三重地區劃分為一級管制及二級管制。所謂一級管制，水淹較深，絕對禁建，而二級管制，水淹較淺，只要批准便可以建築，是為限建。有關單位依水工模型，竟將三重最高地的二重劃為一級管制，結果兩年後的一場颱風豪雨，一級管制的地區及二重疏洪道內，安如泰山不會淹水，而二級管制區卻盡成汪洋。由此可見當局對製作水工模型的草率，攸關百萬人民安危的防洪大計，竟如兒戲！此次民衆對水工模型的不信任，亦是其來有自。如果水利當局對海水倒灌，提不出使人信服

的答覆，甯說水利專家如沈怡博士、苟淵博士、宓正博士、宋希尚教授等學者的不贊同，面對社會大眾的指責，也難以交待。

另有炒地皮的隱情

長久來，外間即有不少傳言，認為二重疏洪道的開關，牽涉到某些特權人士炒地皮的隱情。今年元月四日省道大示威的現場，即透露了一些端倪：當監察委員李炳盛出現在示威現場時，立即引起群眾的叫罵：「他來做什麼？他的錢還賺得不够嗎？」、「土地通通給伊買去，疏洪道如果開，他們三重幫通通賺大錢！」

據悉，北區防洪計劃之初，疏洪道並非經過二重，而是塹子川。但是民國五十七年，政府在花費了七億鉅款開關塹子川疏洪道之後，卻因塹子川有「迴淤」之嫌而中途放棄。（現在的二重疏洪道仍然會合塹子川，當初既嫌「迴淤」，現在倒又不管了。）

而塹子川在中途放棄之後，便改為二級平原

區，開放管制，准許建築。於是一夜之間，土地由每坪不到百元之價格，上漲到每坪一萬五千元。而居間買進廉價土地，高價出售的，卻是以林榮三為首的三重幫！他們從塭子川炒到新莊中港，利用政策的變更，大大發了一筆橫財。民間甚至傳說，三重幫可能透過官商勾結，暗中操縱政策，使疏洪道由塭子川變為二重，再將塭子川開放為二級管制，如此這般，使得三重幫大發利市。由於這種傳言甚盛，因此業主的陳情書中也指出：「是否受炒地皮財團的唆使？」為了昭信於民，我們要呼籲政府公佈近十多年塭子川土地買賣的土地移轉登記謄本。

不公平的補償措施

財團可以利用二重疏洪道炒地皮賺大錢，但相對的，疏洪道區內的升斗小民，却受到不公平的「地價補償」待遇，難怪會引起強烈的不平之鳴了。

地價補償標準，係引用禁建十七年，從未調整過的公告價格。在同地段相鄰的土地，公告地價一坪已達兩萬元之際，而二重疏洪道內被徵用的土地，却僅公告，一坪八百元！差距如此之大，人心焉得信服？而一坪八百元的廉價，又能給予業主多少實質上的補償？他們怨嘆的表示，就算墳墓一坪也能賣個數千元！況且這些區區補償，還得征收受益費、增值稅。

至於安遷的購屋優惠，也不過是空口白話，八十萬的購屋貸款，卻需要有三百萬的不動產做抵押設定，這豈非強人所難？現有房子被拆除，何來不動產抵押？

大財團如三重幫者，因為二重疏洪道數千居民的拆遷，得以大賺炒地皮的橫財，而數千居民卻承受着無家可歸的脅迫！世間豈有如此公道？

· 先建「民意」的疏洪道

儘管有許多不公平，許多質疑，許多反對的聲音，而二重疏洪道到底還是開工了。元月十八日凌晨四時三十分，在憲警與其他治安單位，嚴密的部署各種安全措施：交通管制、拒馬擋道、警衛崗哨、嚴禁居民出入……，於是官方宣佈：「二重疏洪道在沒有任何外力阻擾的情況下，於黑夜中順利的開工了。」

不再有反抗，表示人民心悅誠服了嗎？自元月四日政府強硬鎮壓示威民眾，大量逮捕抗議居民後，隨即「乘勝追擊」，十八日再度以武力脅迫居民就範。——疏導民怨，豈是以鎮壓部隊做工具的？

我們更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條民意疏洪道：首先是執政者的負責態度，對於民間質疑的防洪效益提出正面的答覆解說，如果計劃確有不週之處，亦應勇於修正或廢止，若悍然不顧民意及學者專家之反對，一意孤行，萬一再度發生錯誤，致使百萬人民蒙受其害，豈是區區官職所能擔待的？

近年來，政府施政如刑事訴訟法之修正，公然不顧廣大民意強行通過，如今二重疏洪道又見一例。

國民黨政府若仍以民心向背為重，如今之計，我們建議請先開釋被移送法辦的三名示威者，因為他們並未使用暴力，只不過是表達傳播界不能讓他們表達的切身權利罷了。然後請政府召開聽證會，公正地面對防洪效益問題，詳加研究，若有不妥，應該勇於認錯，予以廢除或修正。

民眾力量有如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歷史上沒有只依靠武力便能使江山長久的，這點執政者應深深繫記者；不要逼使人民去走險路。

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頁!!

關心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學歷史
的知識份子，不可不讀——

李南衡 編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

- | | |
|------------|-----------|
| 1. 賴和先生全集 | 4. 詩選集 |
| 2. 小說選集(一) | 5. 文獻資料選集 |
| 3. 小說選集(二) | |

出版／明潭出版社
訂價／國內新台幣1250元
國外水陸美金50元
郵撥帳號／555202黃溪南

在經濟不景氣，許多行業瀕臨窒息倒閉之際，租賃公司是少數幾種飛快崛起的新行業——這是很奇特的，令人不解的「崛起」。

但是，在深入瞭解租賃公司崛起的背景及其營運方式之後，我們可以發現，「租賃公司」這個新興行業，原來是資本主義以金融兼併生產工具的舊瓶新包裝。

由於這些年來景氣低迷，有太多的工廠公司倒閉，工商界對未來的景氣預期普遍悲觀，投資意願低落，紛紛把錢存入銀行，使銀行可貸資金空前未有的寬鬆而達到一百億的「爛頭寸」。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雖然不斷大登特案的融資辦法，以救濟垂死中的工商業者，但是銀行却依然「侯門深似海」！依然只容許政治特權、大企業家及呆帳大人物「進出」，而容納百分之九十五就業人口的中小企業，大部份仍是告貸無門。

在這種景況下，一些橫跨政經兩界的特權人物，便憑藉其勢力，輕易進出銀行，拿出大把鈔票，轉而放高利給告貸無門、在生存線上掙扎的小生產者。

而對這些每天趕三點半、調頭寸的中小企業商而言，他們常是被剝削得莫可奈何，甚至有人還以為，這不但怨不得大人物放高利，反而要感激他們肯借錢。在存亡掙扎中，租賃公司也是這些小企業經營的救命菩薩之一。

因此，我們可以說，金融體制的特權化和不平等與管道的阻塞，是促成租賃公司興起的主要原因。

銀行非但借錢不易，即以辦理「分期付款」的功能而言，台灣的銀行是不辦理分期付款的。而一般信託公司，也只與大企業家打交道，辦理數千萬的大宗生意，至於小本經營者的分期付款，銀行與信託公司常是拒之門外。於是租賃公司便趁機而起，提供中小企業購買機械原料所需的分期付款額，彌補銀行這方面的不足——單就這個角度來看，租賃公司對中小企業是提供某種程度的便利。

一般租賃公司的主持者，都是金融界的特權人物，他們將銀行低利借到的錢，轉放給小企業，轉手間即坐收一倍以上的高利——這豈只是不公平而已，簡直是欺壓剝削。

而特權的存在，在我們的社會是不足為奇的。衆所周知的中華工程、榮工處，擁有長期承包政府大工程的特權，一般營造廠商根本無插足競標的餘地，只有接受特權工程公司轉手發包的「下游工程」。而特權公司即從中剝削，拿「回扣」等，不勞而獲的坐收高利。

同理，當社會的金融體系變質成官僚與大資本家的堡壘時，特權人士包辦銀行的所有「工程」，再化身為「租賃公司」，轉放貸款，從中奪取暴利。

一般所謂的租賃公司，其營運方式如下：

譬如一家小工廠，接到突然湧來的訂單，必須趕工交貨，可是原料、人工管理等費用，又無處可借，於是便找上租賃公司。

租賃公司首先要工廠將機器設備、生產工具等全部賣給它，因為擁有所有權比不動產設定抵押還要靠。之後再以年息百分之二十四的利息（約為銀行放款利息的一倍），貸款予工廠。然後再依照償還期限，將一切本金利息，按分期償還的日期，把支票全部開給租賃公司。

而租賃公司拿着貸款廠商開出的客票到銀行，憑藉其特殊關係，要求支票貼現。支票貼現一般可

租賃公司

新興的暴利行業

□ 陳振興

借出支票金額的八成。即以中型租賃公司來估計，收回本利共六千萬的支票，可以貼現四千八百萬。

然後租賃公司再把四千八百萬出借，又收回約六千萬的本利支票，再去貼現，又可得到第二個四千八百萬，如此一再循環。而一部機器，最保守也可以融資三次以上，只要憑着四千八百萬資本，即可以做三個四千八百萬的生意，至少一年做一億五千萬的放款，而每次放款，均可獲利一千二百萬，三次就有三千六百萬。

而本金四千八百萬所需支付的銀行放款利息，在百分之十二以下，一次付息六百萬，三次則為一千八百萬。因此營收利息三千六百萬減去支付銀行利息一千八百萬，其毛利為一千八百萬。假如再扣除律師、會計師、估價師等人事費用，一年所得必然在一千五百萬元以上，其投資報酬率約為本錢四千八百萬的三成以上。這是相當保守的估計。

我們對這套錢滾錢的經商術不以為訝，但值得重視的環節，是其控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租賃公司本身不生產、不投資、不必辛苦經營，却輕易地控有生產工具，憑的是什麼？

這種商業資本，不投入生產而能夠兼併生產工具，其形式與本質，與三七五減租之前，大地主控有土地，自己不耕作，放租給農民，坐收佃農的辛苦血汗，有什麼差別？

另外一種打着租賃公司名義，使地下錢莊合法化的公司，其行徑更是惡劣。這種公司所收取的利

息，高達年息百分之三十六至四十五，幾乎是銀行的三至四倍！而其抵押方式，除了房地產、機器之外，另外加上空白支票做抵，日後要是發生問題，租賃公司更是佔盡法律優勢。

在不景氣的時候，小廠商原本就沒有什麼利潤可言，為的只是不讓工廠關門歇業，但是經過這種高利盤剝，焉有不虧本的道理？而當廠商無法償還本利時，使地下錢莊之質的租賃公司，立即以黑道暴力討債，造成社會秩序的動亂與崩潰。

總結當前租賃公司的特點，可歸納為：

一它是不公平社會的產物，其經營者不出政經界要人。

二商業資本業已經有組織、有計劃地控制中小生產者的生產工具，使小生產者隨時可能喪失其生產工具。

三租賃公司只是披上合法外衣的地下錢莊，其中不乏黑道暴力。

一個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目標的政府，應該要有誠意整頓特權化的金融體系才是，因此對於租賃公司這種不公平社會的畸形產物，財經當局是不應該視若無睹的。因此，我們期望當局開放金融管道，使人人擁有平等機會！同時公佈各個租賃公司負責人名單及向銀行貸款額數，以昭信人民。

而對於商業資本控有生產工具的事實，更應設法遏止，否則豈不違背民主主義原則？

名人第10期出版了

◎名人雜誌第七、八、九期連遭查禁，財物損失不貲，編輯同仁身心倍受打擊，但為爭取言論自由，善盡言責乃咬緊牙根，繼續出版，以答謝萬千關心本刊的讀者。

◎我們也提供了「溝通與共識」的意見，當然我們沒有忘記提醒執政當局尊重言論自由。

◎本期特別訪問陶百川先生，「交響樂團中引發的政治啓示。」



「在野」雜誌在今年的第一天創刊，立即引發滯悶已久的政治話題。「在野」的言論如同一顆顆黃色炸彈，嚇壞了青年黨，也震驚了國民黨，還教訓了黨外。

如今，「在野」已被新聞局莫名其妙的下令停刊，但是它震耳欲聾的吼聲必將歷久不衰。

「在野」的兩位主編，都是在學的大學生，他們的表現，他們的主張，預示了又一批新生代的崛起，而且是心胸寬廣，眼界高邁，肯上進，能思考，敢講話的一代。

青年是民族的生機，國家的希望，社會的動力。不久的將來，他們一定會匯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走向社會，引導群眾，推動全中國的民主運動，使「民主」從台灣爭艷吐芳，香冠全球。

下面，讓我們來聽聽「在野」三位主要負責人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們對台灣民主運動的看法。

新生代的新走向

——訪「在野」雜誌編輯

□春雷



我們的言論也許稍嫌過激，但說的全是事實。

程福星：「在野」雜誌社長。36歲，安徽人，海洋學院畢業。

Q：你和青年黨台北市黨部的幾位年輕幹部，從何時開始有創辦「在野」的念頭？你個人在雜誌社中的性質與角色是什麼？

A：前年（民國70年）選舉後，有一些青年黨的年輕幹部，從青年黨只能獲得微少票數，知道這個黨的民意基礎太脆弱，就有心集資辦一份新刊物為青年黨打氣。我本人去年七月

入黨後，因為想法和這些幹部相近，又和黨外政論圈較熟，可以協助解決編輯人員、稿源及發行等問題，所以由我出任「在野」的社長。去年九月大家會商定案後，就由我出面邀約劉一德和黃嘉光負責主編。他們兩人年紀雖輕，但實際黨齡却比我高出很多，而且編寫經驗也有一些，足可勝任。事實也證

明如此。

Q：願不願意談一談你加入青年黨的動機？

A：去年七月間正是黨外發生路線之爭的時候，我有甚多感慨，同時又感於國民黨絕無開放黨禁之意。在此之前我讀過一些青年黨的書籍，深以為青年黨過去所為與今日黨外類似。如果青年黨能堅持過去的理想，今天台灣民主政治應該會更進步。我加入青年黨不過是想為國家做一點事，當然也是因為對黨外有些失望的緣故。

Q：你是在什麼時候，以及什麼因素促使你對現實政治開始關心，並且介入一些選舉活動的？

A：我58年從海洋學院畢業後，在船上服務，經常來往美國台灣之間。有一次偶然在洛杉磯一家外文書店看到一本有關全球人權狀況的英文報告，駭然發現全世界123個國家中，台灣名列第107名，當時我很吃驚。原來我的想法是很單純的，看過這份報告後，有如一個小學生看成績單，覺得很可恥。後來我在美東巴提摩爾的書店又看過一本有關人權的英文書，其中列有118國，台灣名列97，更加深了我的震撼。這是我畢業第二年的事。民國65年拿到船長執照後，我就離開了航業界，開始做生意。66年選舉時我到桃園幫許信良發過競選傳單。當時我覺得許信良很有魄力和理想。從那時開始接觸黨外圈子。我的了解是黨外都是愛國的，並非什麼陰謀份子。

Q：「在野」雜誌創刊號的內容引起軒然大波，甚至傳言你們被人利用，現在可不可以請你把當初你們擬定編輯方針以及核稿的經過談一談？

A：關於編輯方針，事先經過社務委員討論，大家希望在主題上震醒青年黨，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創刊號上有關青年黨的討論文字，是經過社委全體同意的，當時我們已預料到會引起青年黨內的強烈反應。

Q：你的意思是說並沒有想到社會輿論的反應也會那麼熱烈？

A：老實說，我們只預想到青年黨的反應。出刊

後竟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注意，則為始料未及。我想，一個僵死的黨，突然有所表現，才是使人震駭的原因吧？

Q：從「在野」創刊號內容來看，顯然是對民主運動有所期望，那麼你個人對民主運動的看法是什麼呢？

A：我相信黨外的活動，包括青年黨，是能夠刺激國民黨有所改變。但要不斷努力，社會才能進步。

Q：對目前黨外政論雜誌有什麼意見？從「在野」的內容來看，或多或少對黨外也是一種刺激吧？

A：我個人認為「八十年代」、「深耕」、「縱橫」、「大地生活」與「生活與環境」，談的方式和路線儘管不盡相同，但對黨外民主運動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

Q：請你再進一步談一談外傳「在野」被黨外利用的事？

A：「在野」就是黨外，那來誰利用誰呢？青年黨有些大老看問題若是喜歡劃地自限，這是很落伍的！

Q：李璜先生對「在野」事件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曾說「解散」青年黨未免太過份。

A：我們的言論也許稍嫌過激，但說的全是事實。只不過我們沒有婉轉的、修飾的說出來，或者說我們並不去顧慮什麼政治藝術之類的問題。

Q：你是說你們不願世故，不願婉轉，也不講求權術？

A：是的。這些是目前國民黨及黨外最大的毛病。我們想糾正。

Q：青年黨中央有沒有人支持你們？

A：有人曾打電話讚揚我們的勇氣，而且非常稱讚劉一德、黃嘉光，認為他們是可愛、難得的年輕人。但也表示希望他們在言詞上稍為收斂一點。

Q：你們所感受到的一般反應如何？

A：大多數是正面的鼓勵、支持。也有少數表示反對的。有一通電話罵我們是陰謀份子，共匪的同路人。

我們希望社會大眾能以正常的心態和眼光看待我們。



對我來說沒有樂觀或悲觀這個問題，只有去做或不做的問題。

劉一德 「在野」雜誌總編輯。21歲，父湖南邵陽人，母台灣嘉義人。台灣大學政治系學生。筆名左又新。

Q：你可以說是所謂「半山人」，對於這點你有什麼看法？

A：雖然我父母的籍貫不同，但我認為我是台灣人，因為我對父親的家鄉毫無了解，我只能對人說我所知道的家鄉，雖然我也嚮往大陸的山光水色，但我還是要說我是台灣人。不過，這樣說並不表示任何政治態度。

Q：請你談一下答應主編「在野」的原因，好嗎？

A：有四個：第一，程福星的热誠邀請感動了我。第二，這可以給我和黃嘉光一點編校外刊物的經驗。第三，想賺點生活費。第四，找個機會開開老頭子們的玩笑。但我想強調，其實第三點對我最重要。

Q：如果是「開玩笑」那麼李璜及青年黨中央認為你們「太過份」，豈不是說對了？

A：不對！不對！那是他們缺乏幽默感。

Q：談談你的人生觀吧？這也許和你的想法有點關係。

A：我覺得人實在很渺小，如果都在爭這爭那，實在沒意思。我認為「現在」最重要，現在該做什麼，該講什麼，就憑真心誠意去說、去做。沒什麼好自鳴得意或自我膨脹的。其實，真把青年黨解散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何必那麼認真。就是國民黨解散了，天也不會塌下來。

Q：是否在你所接觸的年輕一代大學生中都是這麼想的？

A：我認為有類似想法的人並不少。

Q：目前你對「在野」風波的看法是怎樣的？

A：我要罵幾個人。第一個是程福星，以他這幾個月努力，竟然想在青年黨內引起風暴，根本就不可能。他好像還真的想利用這次事件自己搞出一個派系呢！我也反對他在報紙上發表那些冠冕堂皇的話。同時，他這個人滿腦子封建思想，比如他在報紙上說，如被青年黨開除黨籍，他要把編輯人員帶走。這是很不好的想法，跟國民黨差不多。各人有各人的志願，他有什麼資格和能力決定我們的動向呢？

其次，我要罵發行人李榮基，我對他在中央日報發表聲明廣告的經過，提出嚴重抗議。他說他是不得不妥協，這種說法完全無視於我們編輯人員的存在。雖然他曾私下對我們道歉，但應公開聲明認錯才對。

第三個要罵的是李璜先生和青年黨中央大老，他們年高智昏，沒有政治認識。這話怎麼說呢？搞政治沒有絕對反對，也沒有絕對妥協。「在野」雜誌是給他們力量和機會，而他們沒有善加利用，這是短視的結果。如果改變編輯方針，青年黨辦的雜誌絕無人看。

Q：你倒是很會說笑，能不能請你說說對黨外的看法？

A：對，我還要罵黨外。國民黨的輿論和青年黨某些人，認定「在野」事件是黨外企圖質變青年黨。其實，依我看來，黨外根本無此頭腦、氣魄和能力，那是高估了黨外。例如，在我們辦「在野」之前，黨外不是敵視，就是拒絕。他們只想到會被青年黨或國民黨所利用，而想不到其他。這是黨外愚蠢之證明

又如事後，黨外一些論調紛紛對「在野」表示讚揚和支持，這是事後撿便宜，不能洞燭機先，沒有開創局面的氣象。

當然，我不能說，所有的黨外人物都是這樣，但就我接觸所及，給我的印象確是如此。

Q：如果「在野」由你繼續編下去，你採取何種態度？

A：如果是這樣，我只會更銳利，比創刊號更銳利。不過，話說回來，雜誌的老板不是我，在性質上我只是一個受雇的勞工而已。受雇的時候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就談不上了。

Q：那麼你對台灣民主運動的展望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A：對我來說沒有樂觀或悲觀這個問題，只有去做或不做的問題。

Q：有人說「在野」的創刊不僅衝擊了青年黨，

而且衝擊了黨外，這是否當初你們所期望的？

A：在我們這個社會，有不少人都企圖對別人有所衝擊，只是碰巧我們碰對了，很多人想這麼出鋒頭還出不成。我們原來確實有意一石三鳥：第一，對青年黨來說，給垂死者打一劑強心針，這一針打下去是加速死亡，還是起死回生，我們並無多大把握，完全要看青年黨的反應。以目前來說，很令人失望。第二，給黨外一個反省的機會，提醒他們在民主運動中，還有很多戰場他們沒有注意到，這是由於黨外的智慧與心胸限制了他們的識見與眼光所致。第三，給國民黨出一個難題，他們必然左右為難，因為我們並沒有直接打擊他。若不處理，又怕青年黨真的從此坐大了。這是國民黨今後經常會遭遇的兩難式。

我覺得黨外大多數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忽略了中下階層



黃嘉光「在野」雜誌執行主編。22歲，父湖南零陵人，母台灣台南人。東吳大學政治系學生。筆名路程。

Q：你的年紀相當年輕，而你和劉一德合編的「在野」却一鳴驚人，我想這跟你的政治意識啓蒙較早或許會有些關係，你認為呢？

A：多少有一點吧！初中時，因家父的關係，經常聽到一些他親身參與抗戰、內亂的經歷，這是活的中國現代史，使我有了一些粗淺而被動的政治認識。到高中後我才較主動的去吸收政治知識，例如看中華、夏潮、長橋等雜誌、及改組前的台灣日報等。

讀政治或法律一向是我的志願，只看錄取那所學校而已。父親原只希望我讀一門實用專長就好，例如報考工業專科或學理工之類。但對我選擇法政，也並沒有強烈反對。

Q：據說你和劉一德讀高中時就加入了青年黨，

真有這麼回事嗎？事實經過如何？可否說明一下。

A：那時我們就讀省立嘉義中學，學校常半強迫的要學生加入國民黨，每班至少80%，若未達此數，一般就用抽籤。不過，我個人倒未受到強迫入黨的遭遇，這跟我高三導師的作風有很大的關係，他對我相當好。當時我們對北部黨外活動並無認識與認同，僅從書本中知道政黨中還有民、青兩黨。我和劉一德就想找一個加入，多了解一點。那時還談不上對青年黨有多少認識或認同。後來，我們找到了青年黨嘉義市黨部，就填表加入了。

Q：在這次後，你對現實政治的看法有沒有什麼

轉變呢？

A：高中畢業後我重考過一次，比劉一德晚一年進大學。民國68年到台北時，正是台北政論界熱鬧的時候，我先在新店通用電子公司做過幾個月的工，也曾在雙葉書廊幹過一陣子影計。暇時，我閱讀美麗島、八十年代、春風，甚至疾風等雜誌，增加了不少對現實政治的了解，也加強了我讀政治的決心。

Q：在黨外運動中，你算是少數曾經介入選舉活動的大學生之一，這種介入有沒有給你在學校生活方面帶來什麼壓力或麻煩？

A：大家都知道我和劉一德曾經參與康寧祥和謝長廷的助選工作，但那是在校外，與學校無關。學校當然知道我們的行動，但我們並未將校外的政治活動帶進學校，所以校方也沒有給我們直接壓力。

Q：你是「在野」的執行主編，在稿件的撰寫和取捨上，當時你的態度是什麼？

A：「在野」雖是青年黨的刊物，但它與青年黨辦的其他雜誌並不一樣，我們當時決心以較激進的方式來促使青年黨進步。

Q：東吳大學方面對你介入「在野」編輯工作的反應如何？

A：迄今校方尚未對我施壓力。不過聽說系主任曾表示我既在校外兼職，不宜同時再做「東吳政治月刊」的總編輯，要找人取代。我覺得這種處理方式也很好，一方面避免我無法全力編輯系刊，一方面其他同學也有機會磨練編務，這是我樂見的。

Q：「在野」風波發生後，據說青年黨中央不肯承認你和劉一德的黨籍。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A：其實他們知道我們確曾入黨，黨籍是真的。而今不承認我們的黨籍，我猜完全是為了避免造成外界對他們壓迫年輕黨員的印象，同時也為了免除青年黨中央處置我們時的困難，所以乾脆說我們不是黨員。但我們確是黨員，而且有黨證。不過，我們也確實只是「黨證黨員」，而非「實質黨員」。

Q：李璜和青年黨中央對「在野」創刊號的激烈反應，你覺得是不是預料中的？你的看法是

什麼？

A：李璜並未搞清楚事情真象，太介意文章的標題和用詞的尖銳。也許這是李璜的性格使然。

我認為李璜先生不僅是一黨之主席，而且對社會、國家的進步有責任，要對中國民主運動負責。社會大眾對青年黨多少有所期待，而青年黨未能把握「在野」所打開的時機，這對青年黨是很不好的，會使社會大眾對青年黨更失望，更嘲笑。

Q：如果你們能有機會當面和李璜交談，情況是否會較現在好一點？

A：直接溝通，對彼此都有幫助。李璜主席的資訊來源可能有些閉塞。

Q：據你所知，青年黨中央的心態與性格究竟是什麼樣的？

A：基本上他們是愛黨的堅貞黨員，並無意對國民黨妥協，但他們對政治認識上的取向太受制於「國家主義」，他們與國民黨之間的「共識」其實是一廂情願的，因此所謂強調「團結」「和諧」，就變成了很奇怪的東西，實在很難堪。

又比如強調與黨外劃清界線，可能也是所謂「國家主義」所造成的虛幻愛國觀念在作祟。青年黨大老李祖培曾說過這樣的話：「做基督徒絕不能說基督不好，同理，青年黨員絕不能講青年黨不好」，我認為此話大可商榷，而這正是青年黨大老們的共同心態。

Q：在你這樣年齡的大學生中，有你們這樣政治水準的人實不多見。最後請你談一下對黨外民主運動的看法？

A：所謂民主政治，當然是執政黨不好，就應由反對者來取代。但若在野反對者本身也不能代表真正民意的話，那就要徹底檢討了。我覺得黨外大多數人，包括青年黨在內，最大的缺點就是忽略了中下階層。其實，搞民主運動唯有重視佔大多數的中下階層，才能說得上「民主」二字。

同時，我認為黨外尤其需要培養容忍異己，信任他人的心胸，不宜太堅持新興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何不讓大家多方嘗試？也許這才是有效達到民主社會的途徑。

黨 外 的 抉 擇

□ 汪立峽

有些人，由於他們的政治想像力，其失敗是可以預料的。甚至我們的一些職業政客，或許他們無能想像，或許他們不敢想像以更合理、更有效率、更民主的方式，來組織我們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他們之所以如此，是怕遇到可能的挑戰及挫折。有的人會拒絕接受一切公平合理的改變，祇不過爲了可以避免掉別人檢討其得失的遭遇。

——Michael Parenti “少數人的民主”

最近由「在野」雜誌所引起的討論話題，呈現了現階段台灣民主運動的關心層面及實質內涵。從一開始，幾家報紙就把主題導向於青年黨中央對「解散青年黨」這個問題的反應上，此後幾家黨外政論刊物在評論這件事時，也跟著報紙所設定的這個主題繞圈子。這充份表示出現階段民主運動的關照面僅止於現實政治權力結構中的權力分配問題，也就是「政黨政治」這個範圍內。

但是，如果我們把「在野」創刊號仔細讀過一遍，當會發現，它所要表達的內涵意義並不止於此。在其他幾篇諸如「我們的力量在哪裏？」「打破黨禁怪論」的長文中，他們實際上對台灣民主運動已經提出了突破性、前瞻性的見解，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說，都具有拋磚引玉的作用。

現狀的形成根源

一般知識份子和黨外會有意或無意的忽略掉這些文章，其實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些文章的論點與向來主導台灣民主運動的「精英輪替」理論（circulation of elite）有其根本上的不同。

「精英輪替」理論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革新觀念。從這個理論出發，實質上所爭者不過是精英份子參與政治之機會及權力分配之要求而

已。這和投票支持者（黨外選民）的真實利益並無真正之關聯。事實上，黨外選票大部份的意義充其量是對國民黨表示不滿，雖真實民意在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傾向與要求之間，尚有一道根本上的鴻溝亟待躍越。黨外如果仍然認識不清這一點，是很難突破卅年如一日之三〇%選票的。

就黨外刊物而言，不論是新聞記者氣質的編者，或黨外黨工性格的編輯，歷來所編之雜誌在理論層次上自知或不自知的從未超出「精英輪替」這個範疇。由這個理論傾向所決定的黨外政論性格，是在強調「客觀」、「成熟」或「兇悍」的外貌下，隱藏著虛矯、自滿和世故。同時，它也把黨外的輿論本質限制在政治討論的新聞自由上，在這一點上，幾本主要的黨外雜誌確實爲讀者提供了與國民黨控制的報紙不同的資訊，此之所以「內幕」、「耳語」、「小道消息」成爲必備專欄，亦所以各家雜誌儘管文字表現方式不同，但取材範圍卻擺脫不了膚淺政治話題的原因。

這一切的根源要追溯到黨外民主運動興起的背景與體質結構。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民國六〇年代造就了大批新興中產階級公民和知識份子，近年來的黨外民主運動就是在這個背景和成份結構上蓬勃成長起來。正是因爲這個體質，決定了運動的理論依據和由上而下的導向，也就是說台灣的新興中產階級在本質上認定只要中央政治結構改變，一切都將迎刃而解。

對新興中產階級政治活動份子來說，他們思考問題的最大障礙是無從想像上層結構與權力分配問題的解決，並不能表示真正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問題也同時解決了。其實，就大多數中下階層民衆的實際政治、經濟利益來看，這一切的解決都將有賴於更往下的、更廣泛的、更深刻的民主運動來完成。可以這麼說，新興中產階

級的民主運動終將面臨同樣是在經濟發展中成長的另一股巨大社會力——新的在社會結構中佔絕對多數的中下階層的民主挑戰。

今後怎麼辦？

從台灣社會發展的趨向來說，已休刊的「大地生活」和「生活與環境」是相當前衛性的兩本雜誌。「大地」對社會體質所呈現的病徵，從經濟、社會、勞工及文化等層面加以診斷，並且啓發社會自治和群眾自覺的觀念；「生活與環境」對經濟發展和工業成長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進行指控，並且提出挽救之道。他們做的是真正為民主運動紮根和結合社會力量的工作，所以雜誌的自行休刊不僅並不意謂「大地」徐璐那群年輕人和「生活與環境」創辦人黃順興的失敗，反倒很有意義的指出了這個社會的知識份子及黨外民主運動的失落與無能。失落與無能的基本原因是知識份子和運動份子現代世界觀的欠缺，以及社會意識的普遍墮落。而造成這一切的癥結，則是一股歷久不衰的反智傾向在隱然作祟，此所以黨外之政論內涵始終無法超越「自由中國」時代，亦所以黨外雜誌成天在「叫罵」「過癮」聲中過日子。反智傾向之形成絕對和統治集團的性格與政策有關，但一般知識份子與政治不滿人士的閉塞、偏狹與短視也難辭其咎。終而至於不論在朝或在野，凡搞政治的、寫政論的，都一窩蜂的鑽進所謂「政治技術」、「政治手腕」、「政治權術」的死胡同裏。近來各方盛行以「中國功夫」交相勸勉，即為此反智流風之必然惡果。可以斷言，「中國功夫」愈好，反智氣氛愈濃，終必使民主運動變質，而所謂「民主」也就愈不可及了。

就目前而論，黨外若能「猛回頭」，為時尚不嫌遲。這是說從現在起，黨外必須要重視由下而上的運動方針。從社會內在動力而言，此種以知識引導和行動能力為基礎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基本上是以社會自治和群眾參與為動力來源，也是終極目標。

如果細密的區分，所謂社會動力，除了勞工、青年為主要力量外，還有市民、社區居民、消費者團體、環境保護團體、人權組織、女權組織、宗教團體、和平運動團體、民間請願團體、反

核運動團體、以及各種民間利益團體，都是亟待民主運動者努力開發的社會力源。從運動的角度來看，這些社會動力之間又具有互為牽連的連鎖關係，例如勞工在大多數情況下，既是市民、社區居民、宗教團體及工會的一份子，同時又是環境公害、不潔食品、人權侵害、性別歧視、核能污染等問題的受害者。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在最後總匯民主運動力量的，必定是在我們這個社會結構中居絕大多數的勞動生產者。最明白不過的是，知識階級不可能獨力完成任何事，唯有和勞動階層結盟才能達成徹底的社會民主理想。

可是，黨外大多數人迄今沒有這個眼光，大多數知識份子也沒有這個認識。這就難怪黨外始終找不到社會力量，老實說，這是不能單從雜誌銷售量的成長表象上來自慰、自滿的。試問，黨外的選票何曾超越國民黨過？但從沒有人因為國民黨獲得的選票多，就認為國民黨「甚得民心」，連國民黨自己都沒這個把握，黨外怎能因為多賣了幾本雜誌就沾沾自喜呢？

新希望新走向

我們認為，縱使以目前黨外所掌握的有限力量——新興中產階級，包括大、小工商資本家，經理、技術人員，醫師、律師、自由業者，及小知識份子等等。在這個社會結構與內在力量急速轉變的社會中，這些力量十分脆弱，並不足恃。在未來可能面臨的紛至沓來的經濟、社會衝突，及內政、外交困局下，黨外所一向憑藉的那點力量，勢難避免迅速土崩瓦解的命運。這是任何有遠見、有責任感的政治家、資本家或學者專家必須警覺的。同時也該反省一下，黨外的奮鬥目標和民主運動的理想究竟有多大差距？為什麼聲嘶力竭吶喊的結果還是感到無力和無可奈何？

過去和現在的歷史在告訴我們，任何政治運動若是錯估了時代潮流，客觀條件和社會動力，又不願從觀念上和方法上根本改變，只會走向一條路——徹底的失敗。不過，從已現端倪的社會大動向來看，民主運動新生的一代不會聽任這種結局發生。如果目前的黨外勢力圈（不論新舊和年齡）再不思改弦易轍，那就只有等待逐漸成長的和新生的第三勢力來淘汰了！

□地方壟斷勢力分析系列□

台北縣地方壟斷

□王乃文

蛻變中的地方政治

長久以來，一般人透過地方選舉而知悉有「地方派系」的存在，但是基本上仍將國民黨視為地方上的絕對統治者，對於國民黨在地方上穩固的壟斷性深信不疑。同時也視「地方派系」為地緣性、封建性的落後產物，以為隨着經濟、交通、知識的發達，他們必然跟着萎縮。但是近幾年來，不管是在選舉當中，或選舉季之外所爆發的衆多案件，在在都引發人們重新思考地方政治勢力的問題。

在衆多案件中，最為輿論界所注目的，如本屆縣市長選舉，彰化縣國民黨候選人陳伯村的落選、去年三月所爆發的「陳萬富賄選案」、七〇年底前交通處長常撫生被彈劾案、以及去年底由高雄縣的黑派發動的蔡明耀縣長罷免案等，…都顯示「地方派系」的性質，以及其左右政局的能耐。「地方派系」能夠左右政局者，必已在地方上具備相當程度的壟斷性，對於這種「地方派系」，我們稱之為「地方壟斷勢力」。

一般「地方壟斷勢力」介入地方政壇的時間，短者十年左右，長者二、三十年，或更久。其影響力所及大都在單一的省縣轄區內，也有少數是跨縣的。這些壟斷勢力和一般地方小派系最大的分別是，他們都擁有相當規模的企業，有些還因為多角化經營，而形成企業集團。論規模，就全國企業比較，有不少是屬於中型企業集團的。然而不管這些壟斷勢力所擁有的事業是投機性的、生產性的、金融業或者多角化經營也好，他們的成長都和地方上的發展息息相關，和台灣廿多年來資本主義化的軌跡也若合符節。在他們的發

展過程中，由於政治、經濟的交相為用，使得他們的企業加速擴展、政治勢力急速膨脹。

隨着經濟成長、人口增加和新興都市的不斷形成，在住屋和交通方面的需求也急速增加，因此土地買賣、房屋建設、各種營造以及運輸業遂成為新興的暴利行業。據調查，絕大多數的地方壟斷勢力均和這類行業有關。其中原因主要是民意代表或民選行政官員對於地方建設均有決策權和監督權。在每一個省轄（縣）市均有「都市計劃委員會」、「地價評議委員會」、「不動產評議委員會」等組織，這些組織均由（縣）市長召集，由民意代表、地方士紳組成（但最後的決定權操在縣市長），而民意機構不但可以建議地方自治興革計劃，監督、質詢成果，而且有審查年度預算、決算等職權。換句話說，民意代表或民選官員可以藉機影響決策或者掌握重要情報而有利於他們的企業。但是不論建設、營造和運輸事業均是在有限的空間發展，因而經常爆發激烈的競爭。不斷擴充發展是近代企業生存的鐵則，因此企業成長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這種壓力反映在政治必然造成激烈的政治鬥爭。

此外，由於急速的資本主義化，金融已成為台灣經濟活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但是因為民間銀行成立的設限，遂造成少數地方銀行家壟斷地方金融，進而左右地方商業活動的局面。據資料顯示，不少地方壟斷勢力均擁有金融業（如信用合作社、保險業、信託業），他們一方面吸收民間游資，有利於集團企業的經營，因而加速企業的擴展，同時，由於金融業對於一般商業活動有操生殺之大權，遂使銀行家在地方上很快地成為

勢力的分析

經濟和政治的壟斷者

今天，由於壟斷勢力的形成，地方政治的均衡已發生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對於國民黨在地方統治權的挑戰，以及對民主政治發展日趨嚴重的阻礙。這個形勢固然是台灣經濟發展必然的產物，但是從一般大眾利益的立場來看，却是逆潮流的惡質發展。同時我們可以預測，這個發展必然變本加厲，終而成爲我們社會必需面對的重大課題。

基於地方壟斷勢力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我們有必要對其發展、性質和面貌有所理解，本文作者將做一系列探討，並請各方高明指正。

台北縣與四大家族

台北縣目前人口已經達到二百卅萬，論人口數已直逼第一大都市；而工廠、工商機構的數目更高佔全省五分之一，台北縣在台灣經濟活動中地位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台北縣雖然有這麼重要的經濟地位，在政治上，却一直被政論家們視爲不足掛齒的「政治沙漠」、「人口大縣、政治小縣」……。但是，當去年三月爆發了所謂「陳萬富賄選案」以後，台北縣在一夜之間成爲輿論界注目的焦點，也成爲經常被評論的重要對象。當時一位評論家曾提出「林榮三黨部」一詞，識者均認爲是一語道破台北縣政壇的癥結所在。事實上，台北縣地方政壇已經爲幾股勢力所壟斷了。

台北縣有那幾股壟斷勢力？他們是怎麼形成的呢？

據我們的觀察，今天能夠左右台北縣政局者有四大壟斷勢力，他們分別是以顏欽賢爲首的顏家，李儒嘉、李儒聰爲首的李家，以林榮三爲首的

「三重幫」，以及邱益三爲首的板橋邱家。

這幾股壟斷勢力的形成均非一朝一夕，和台北縣的經濟發展有絕對的關係。

在五〇年代台灣走向工業化前，台北縣一直是以前、漁爲主的農業區，但是由於地形分割、零碎、缺少平原，又加上氣候不佳（夏季多風酷熱，冬季多雨少日光），不利農業發展，台北縣的農業，在台灣的農業發展上並不具重要性。但是台北縣豐富的礦藏，却使它在台灣經濟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如金銀銅礦，幾乎全部產於北縣，硫化鐵和煤礦（蘊藏量二億零九百萬噸）的大半也均產於北縣。台灣礦業的開採雖自滿清一代開始，但是大量的、現代化的生產還自日據時代開始。

煤礦是台灣蘊藏的唯一能源，它的大量開採仍是因應台灣走向資本主義化的開拓期之所需，有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台灣交通的主幹——火車，主要是仰賴來自北部的煤礦；而發電、及一般工廠長期以來也是以燃煤爲主。由於大量的需求而興旺的開採業，造就了台灣歷史上最悠久的家族企業集團之一——顏家。而另一礦業鉅子——李家，雖然在開採的時間上遲了將近廿年，但其成就並不亞於前者。他們二家不但壟斷了煤礦業，因爲開採業而興起的市鎮也成了他們的勢力範圍，他們以此爲基礎，在企業方面走向多角化經營，向各行業深入擴展，在政治上更進而左右全縣性的政局。

當台灣走向工業化時，台北縣的地理位置已經注定了它必然成爲工業大縣。在地理上，台北縣緊緊環抱着台北市——台灣的商業、政治中心



縣政府——台北縣的最高權力中心



B.V.D.下的縣議會——大企業財勢籠罩下，民意無力的寫照。

，也是國際性往來的門戶；在它的東北則連接基隆——台灣最重要的商港，在它和基隆之間則是台灣最重要的工業燃料出產地。於是，透過鐵路和縱貫公路，從南部輸入了人力，從北部進口了重要工業原料和機器，也從此將產品輸出，一個以台北縣為生產地，以台北市為國貿中心的大台北工業區便如此形成了。靠近台北市而散佈在鐵路和縱貫公路二旁的三重、蘆州、五股、泰山、新莊、以及板橋、土城便在以外銷為導向的工業發展中，成了台灣工業的重鎮。來自南部的人潮，將這幾個原先不起眼的小鄉鎮變成了工商業大城，而將傳統的大鎮——鶯歌、淡水、瑞芳、汐止遠遠拋在後面。

六〇年代台灣經濟開始起飛之後，台北縣的人口成長便直線上升。據統計，民國五十年時，台北縣的總人口不到八十萬，民國六十年已增加至一百卅萬，到民國七十年更達二百卅萬。而台北縣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便是集中在板橋、三重、新莊、中和、永和、新店等六個縣轄市。

急速膨脹的城市，在住屋、公共設施以及交通方面的需求也不斷增加，這是將黃土變成黃金的大好機會，許多營造商和建築商因此大發利市而成為鉅富。「三重幫」老大林榮三的「聯邦建設公司」，便是大批建築供勞工和小市民居住的公寓而發跡的。簡陋而廉價的公寓為那些來自南部的「出外人」提供了起碼的棲身處所，而勞工的汗血錢也為「聯邦」堆砌了一個「金世界」。「三重幫」以建築業和運輸業為主，進而成為台北縣最大的壟斷勢力，可以說是新興都市必然的

產物。

板橋是台北縣治所在、商業中心，也因此成為金融活動的中心。隨著工業的引入本縣，人口激增，城市發達，商業發展也極為快速。據縣政府的統計，民國五十七年底商業登記數僅一六、二六〇家，至六十四年底，已增至二九、四五〇家。資本額則由五十七年的二一七、六〇一、九五八元，激增至六十四年底的八九三、七八九、三五八元，增加比率高達百分之三一〇·七四。商業發達，金融業也隨之興旺，又由於金融在工商活動中的關鍵地位，金融業鉅子在地方上必然逐漸形成一股壟斷勢力。板橋的金融世家——邱家，是台北縣的第一號銀行家，以其在金融界舉足輕重的地位，進而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由於「本錢」穩固，已經成為北縣政壇上的明日之星。

總之，派系的形成雖然有多種因素，但派系而能成為壟斷勢力，有其雄厚、不可搖撼的經濟、社會基礎。北縣政壇的四股壟斷勢力在工商業化過程中所建立的經濟地位，正是他們政治力的根源。以下我們將簡述四大壟斷勢力各別形成的經過。

顏家——以礦業起家的豪門

提到礦業鉅子顏欽賢，在台灣幾乎是無人不曉，而其領導的台陽關係企業也是本省歷史最悠久的家族企業集團之一。據中華徵信所公佈的資料，其資產總值在「一百家大企業」中排名第六十六位。（民國六十八年）。遠在民國七年日據



北縣警察局——台北縣的治安中心

時代，顏欽賢之父顏雲年即取得台北縣瑞芳礦山全部開採權，而創立「台北炭礦株式會社」，並遠赴大陸參與興建平漢鐵路開發平漢煤田。民國九年更名為「台陽礦業株式會社」，光復後改組成「台陽礦業公司」，到民國六十二年，為了便於多角化經營措施，才改稱為「台陽公司」。

台陽集團先以開採金礦為事業之發端，之後投資開採煤礦，又投資交通事業，才奠定其集團經營之基礎。目前台陽集團雖仍以開發礦藏為主要業務，但在從事多角經營與運用上，則廣及金屬、機械、造船、電子、交通運輸、貿易、建築以及其他事業。圖一所列乃是這個集團的主體，其它還有廿多家分子公司，因為「族繁」不及「備載」。台陽集團所屬公司雖然大都設址於台北市，但是工廠則分佈在台北縣，其次是基隆，還有遠至宜蘭的。台陽集團和地方的關係，除了透過金礦、煤礦的開採，和其它製造業工廠外，還有最重要的「台北汽車客運公司」。這家客運公司在客運業近年度營收中，僅次於新竹客運與桃園客運兩公司，是北部首屈一指的客運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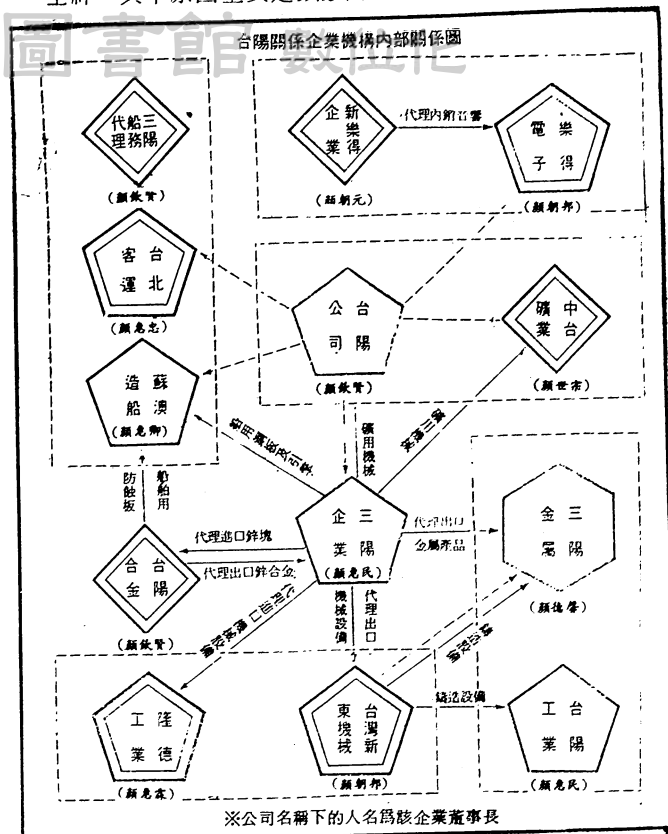
「台北汽車客運公司」之能騰達於客運界，和顏家深厚的政治基礎有密切的關係。「台汽」公司原為廖世琳所經營，其前身是「文山汽車客運公司」（更早為文山輕便客運社），因業績不振，虧累過鉅，而為顏欽賢所收購，並與「台陽交通公司」合併經營。

顏欽賢雖然善長經營，但是「台汽」之能起死回生，還是要歸功於當時台北縣長蘇清波的鼎力相助，將整個北縣海山區的黃金路線劃歸「台

矮化的工會

汽」。

在政治上，顏家並不熱衷選舉活動，既不輕易支持他人出馬，自家人也不出馬，在表面上唯有顏欽賢掛名終身職國大代表。但是這並不表示顏家不介入政治。據傳，顏欽賢和日本昭和天皇有同窗之誼，在日據時代便頗得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的禮遇，而成為著名的御用紳士。光復初期曾和國民政府有過短暫的不愉快，但在出走日本數年之後回台，仍成為國民政府積極拉攏的地方士紳。其中原因主要是顏家的「煤礦王國」不但



在業界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而且煤礦乃是工業化、現代化最重要的動力，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顏家在政治上的運作可以說是非常世故的，他們很少公開活動，完全避免了予人「野心家」的印象，但對於其企業有利的政治資源則積極掌握。在台北縣政壇，他們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縣長」一職的人選。據了解，國民黨對於縣長人選的提名，必徵求顏家和李家兩大家族的意見，使得兩家族對台北縣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歷屆縣長中，蘇清波可以說是顏家非常積極支持的一位，而蘇清波也不負所託，在「台北汽車客運公司」的經營上，給予顏家最大的助力，從而使得在經營上日益困難的「煤礦王國」，得以順利過渡到多角化的經營。

顏家的影響力並不只在台北縣，由於其礦業也有座落於基隆者，顏家在基隆的政治、經濟淵源和台北縣並不相上下。

遠在民國十一年，顏欽賢之父顏雲年便在基隆開創當今的「第二信用合作社」，因業績不佳，乃於民國五十四年轉讓給謝青雲（今議長謝修平之父）。在政治上，顏欽賢曾支持外戚柯水源競選二任省議員，後因表現不佳而為顏家所棄。此外，據傳顏欽賢也曾在幕後支持前基隆市長林番王，並曾介入民社黨在基隆的活動。

顏家和日本不但有歷史淵源，而且目前還保持密切的關係。除了在日本投資，也引來日本的技術和資金，據傳顏家已將大量財產轉移至日本，但既使傳聞屬實，似乎並不影響台陽集團在台的經營。同時在北縣政壇上，顏家仍繼續用那隻看不見的手左右政局。

李家——橫跨北基兩地的鉅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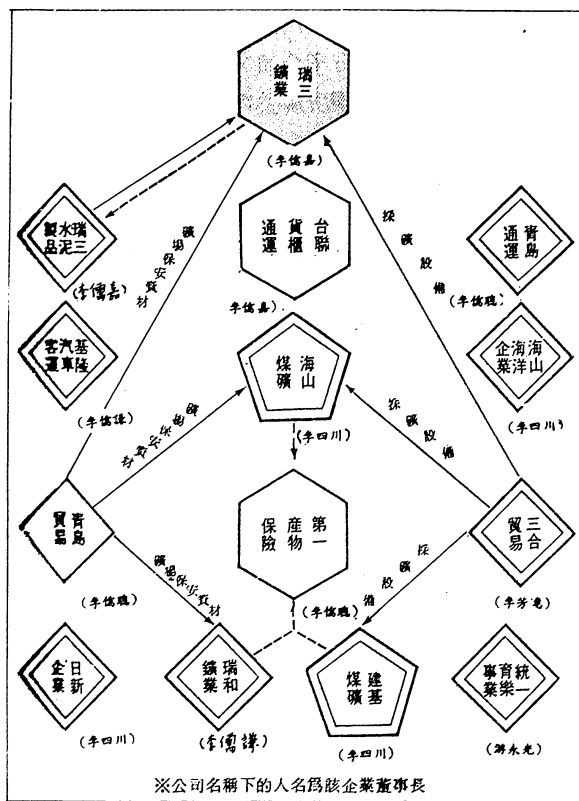
李家（李氏義方居關係企業）是台北縣另一個以礦業為主的企業集團，資產總值在「百大」中排名第七十三位，論財勢稍遜顏家的台陽集團，但是在政界却更為活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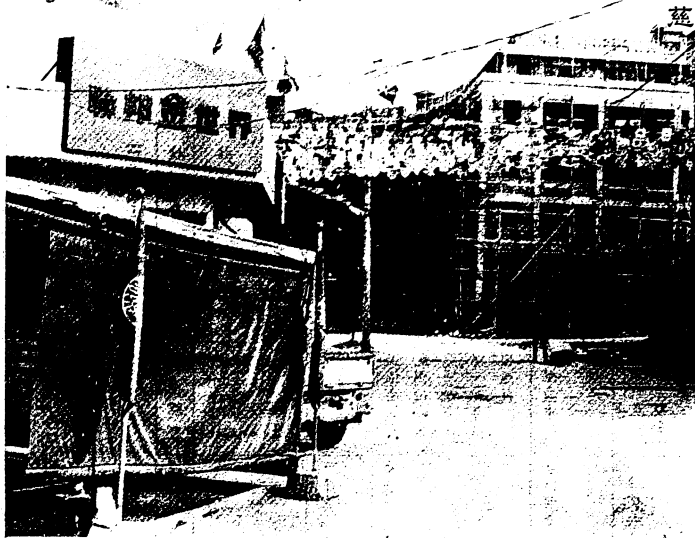
李氏集團是由李建興及其弟李建炎、李建成、李四川及李建和等人，以煤礦業為主發展成的企業集團。由於第一代創建人大都已過世，企業集團的權力中心已轉移到第二代，目前該企業的核心人物是李四川、李儒聰、李儒侯、李儒嘉、李儒謙。

李氏企業集團，是李建興於民國二十三年日據時代承租瑞芳侯硐炭礦及包採基隆炭礦，而成立瑞三礦業公司為其發端。光復後又相繼設立海山及建基二煤礦，加上瑞山煤礦，三家公司的營收達十三億元以上，和台陽的煤礦業已在伯仲之間。民國五十一年又成立「基隆汽車客運公司」（已轉讓給新竹客運公司），及「第一產物保險公司」。六十二年後即效力於多角化的經營，營業範圍擴及營造建築、運輸及水泥等。該集團雖已由第二代接掌，但作風稍嫌保守，發展較為緩慢。但是因為集團中有金融保險機構作為後盾，資金來源不虞匱乏，該企業集團仍具無限發展潛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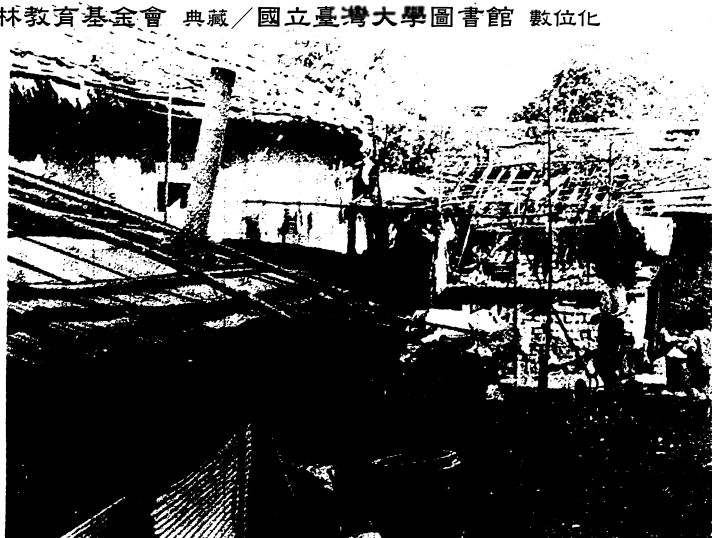
在政治上，自從光復後至今，李家一直都積極介入地方政壇，對於選舉相當熱衷，甚至不惜花費鉅資。第一代的李建和（已逝）從台灣省臨時議會議員開始，連任六屆省議員，並被選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由於李建和為人豪邁，加上其龐大財勢，在歷任省議員當中有地下議長之稱。由此也可知其影響力之大。李儒侯（李建成之子）緊接着擔任第六、七兩屆省議員，第八屆（目前）則由李儒將（李建和庶子）接任。而李建炎之子李儒聰不但蟬聯七屆縣議員，任中還膺

李氏義方居關係企業機構內部關係圖





勞工的血汗錢堆砌了「聯邦金世界」



台北縣的另一面

選第六、七兩屆議長，至民國五十九年還當選增額立委，成為終生職的立法委員。光復後，在北縣政壇上，李家不但一直保有立委、省議員、縣議員等席位，而且也積極影響縣長人選。在歷任縣長中第二、三屆縣長戴德發以及剛卸任的邵恩新均和李家關係密切。李家的票源區主要是集中在瑞芳、汐止、三峽、鶯歌及樹林等和礦產有關之地區。此外李家目前仍控制瑞芳鎮長及瑞芳選區之縣議員選舉。李家另外一名成員——游永光（李建川庶子）也活躍於基隆地區，歷任第八至十屆市議員，及第九至十屆副議長，並掌管李家在基隆的部份產業。縱使李家的第二代已不如上一代勇猛，但李家仍是活躍於北基兩地的鉅戶。

三重幫——商業與政治的暴發戶

在六十三年中央民代的選舉，林榮三以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一舉擊敗了政壇老將——郭雨新。郭從此一蹶不起，國民黨終於拔除了第一選區的頭號眼中釘，而「三重幫」也就在這次選戰中正式結合。只是，國民黨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三重幫」不但功高震主，而且成為往後的心腹大患。

「三重幫」最重要的首腦當推林榮三、李玉泉和蔡詩祥。基本上這是兩個家族的結合——一邊是林氏兄弟及其姻親，另一方則是李玉泉、蔡詩祥及其姻親。他們三個人的結合，就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來看均是絕配。李玉泉智足多謀，當了十多年省議員，是位老政客；林榮三則「勇猛進取」，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個商業暴發戶；蔡詩祥是「三重地區的土司筆」

，他為人任俠，在黑道中有呼風喚雨的地位，透過他，三重的黑社會間接地成為「三重幫」的班底，隨時準備效勞。「三重幫」份子經營的事業的確需要衆「兄弟」們的照應。那些「天」字招牌的戲院、舞廳、百貨店固然需要，就是客運公司、建築公司也有用到的時候；在選舉時不管是賄選、護票都要「兄弟」們出馬。這也是為什麼蔡詩祥一再擔任競選總幹事的原因。他不但是李玉泉每次選舉的總幹事，林榮三初次出馬也是由他掌舵，甚至蘇清波和邵恩新的競選也由他擔任地下總幹事。去年十一月，三重一位綽號「他K」的著名黑社會份子——郭昆竹被一位冷血的槍手所殺，他的治喪委員會成員之龐大和顯赫，曾大大地震驚了社會輿論。而「三重幫」的要角均上了榜——立委蔡勝邦是主任委員，蔡詩祥是總幹事，副主任委員則有國大代表謝隆盛、監委林榮三、省議員李玉泉、三重市長李炎照，而縣議會議長、副議長則送來輓聯。在葬禮中來自三山五嶽的衆兄弟固然震驚了治安單位，二、三百輛的花車也叫台北縣民大大開了眼界。為一位黑社會份子辦如此隆重的葬禮，正顯示「三重幫」「黑手黨」的一面。這一面不但是北縣其它壟斷勢力所不及，在全省各地的壟斷勢力也少有望其項背的。

也正是「黑手黨」的作風使得這一群不甚能登大雅之堂的暴發戶，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發展成北縣政壇最大的一股壟斷勢力。林家兄弟從小小的米糧零售商，進而到大批發商，又從「販仔屋」的小建築商發展到今天以「聯邦」、「宏國」、「宏泰」為首的「建築王國」，不但是拜

三重幫人物一覽表

連勝彥	李昇陽	李文彬	陳運地	陳勝琴	林瑞理	林瑞琪	陳丙傳	林來運	陳萬富	謝隆成	蔡勝邦	李玉泉	蔡詩祥	林榮三	核心人物
濟傳產案 董事長					宏泰建設公司	宏國建設公司	幸福建設公司 董事長、幸福 戲院		大富米廠	四海工專董事 長	「鴻運」、「美 國」、「文華」公 司董事長	三重客運公司 董事長 天台百貨公司 董事長、天台、 天心、天南、 正義、真仙樂等 戲院、天泰歌廳	天台、天心等 歌廳、戲院	現任聯邦建設 公司董事長、 民衆日報(已運 股)、自由日報	所屬企業
國大代表	主席 蘆州鄉代會	蘆州鄉長	前三重市長	國大代表				前縣議員	曾任蘆州鄉民 代表會主席 任縣議員、現 任縣議長	國大代表 謝氏宗親會 總幹事	現任立委	曾任議員 議員	曾任立委 現任監察	政治經歷	
		陳萬福的執選 伙伴		李玉泉親戚	林家二兄	大 蔡家兄弟之老	林來運之姊夫	林氏兄弟堂叔	林氏兄弟的 姊夫	林瑞琪內兄	蔡詩祥之子	蔡詩祥姻親	李玉泉姻親	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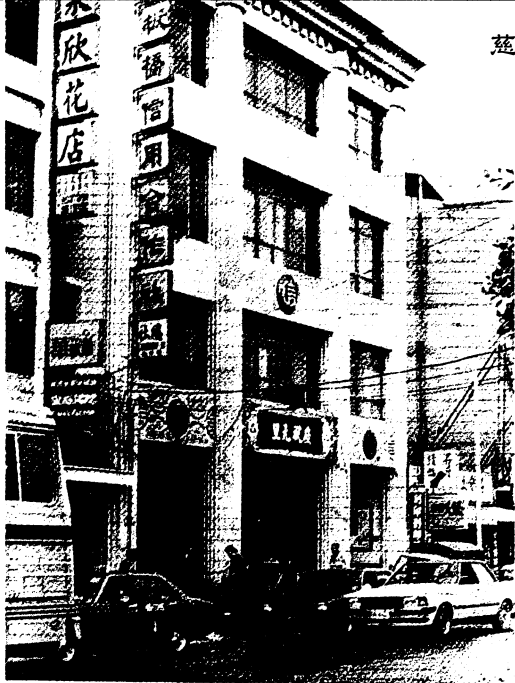
北縣經濟發展之賜，也因為他們的敏銳、進取和勇猛。而在他們正式介入政壇以後，這種作風更發揮得淋漓盡緻。

運用政治特權來護航所屬企業，在今天台灣的政壇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但這幾年來不斷傳出的有關「三重幫」在這方面的作為却相當令人側目。民國六十八年，周滄淵議員曾在省議會揭發，勞保局付給林榮三一億台幣押金，承租「聯邦大樓」，如此明顯的官商勾結，難怪當時輿論界群起攻擊，在輿論的壓力下，勞保局只好在合約二年期滿後停止續租。其它傳聞較令人注目的是，前公賣局長吳伯雄曾以林榮三為介紹人，將公賣局收益轉儲於有關行庫，而讓林榮三得以順利貸到大筆建築融資。像這類傳聞，可以說不一而足。目前「聯邦建設公司」正在塢子川中港地區建築大批國民住宅，但二重疏洪道地區的居民給有關單位的陳情書上却指出，「低窪區塢子川中港，反制定為二級平原區，開放管制，使財團大炒地皮，大發利市，養肥財閥奸商，令衆情嘩然，種恨至深。」另一件曾引起喧然大波的官商勾結案則是前交通處長常撫生被彈劾案。前年七月，李玉泉的「首都客運」、陳金德的「新店客運」以及苗素芳的「雙和客運」等三家新興客運公司為了爭取黃金路線，竟利用交通處急於成立「台灣客運公司」，在將組織章程和七十年年度預算送交省議會審議時，脅迫當時的常撫生處長對三家公司開放路權，以為交換條件。事後，由於競爭對手——以顏欽賢的「台北客運」為首的舊客運集團的揭發，終於導致常撫生在退休後

還遭彈劾的惡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可以說是「三重幫」的基本作風，在這種作法下，「三重幫」固大有斬獲，但引起的反擊也相當大。「陳萬富賄選案」便是一個例子。

據了解，李玉泉早已向有關方面爭取提名縣長，本屆提名不成，國民黨有關方面曾允諾以省議會副議長，但選舉當中國國民黨曾挖走他在新莊的部份票源，以扶持垂危的簡盛義，雖然雙雙當選，但李玉泉得票數的排名竟在第六位，而座失當選副議長的良機，「三重幫」在多方面遭到挫折之後，乃試圖控制縣議會，遂不惜以鉅資賄選。陳案爆發後，許多人才恍然覺悟「三重幫」的勢力已坐大到如此地步。由這個案件顯露，「三重幫」在縣議會六十五個席位中，已穩然控有廿五席，以這廿五席為基礎，更可擴大影響力至四十五席。今天既使陳萬富不能上任議長，台北縣議會仍然在「三重幫」的掌握中。在民選官職方面，「三重幫」早已牢牢控制着三重市長和新莊市長，目前更擴大影響力至蘆州。

「三重幫」的企業並不被列入「一百家大企業」中，但市井中皆傳聞其企業集團擁有的資產價值達數百億台幣，傳聞也許失實，但當建築業界一片倒風時，聯邦、宏國、宏泰却一片欣欣向榮，便可知其基礎之穩固。而所屬的交通公司——「首都客運」在增闢黃金路線之後，其業績也必然會蒸蒸日上。「三重幫」這個政治、商業上的爆發戶，雖然經過陳萬富案而不得不稍事收斂，但毫無疑義的，在可見的未來它仍然是北縣最大的一股壟斷勢力。



板橋信用合作社——邱家大本營

邱家——由金融走向政治

邱家在四大壟斷勢力中，目前看來可能是力量最小的，但未來行情却相當被看好，咸認為是明日之星。

邱家以買賣雜糧起家，所屬企業——邱合豐目前除了買賣雜糧，還經營房屋建設，並進而經營金融業。目前「板橋信用合作社」雖然是邱家和板橋另一世家劉順天家族合資的，但邱家的股份佔多數，因此由邱家的邱明政擔任理事主席。一般均視「板信」為邱家的大本營。「板信」目前的存款額已高達四十多億元，業績蒸蒸日上，對板橋其它銀行已造成相當嚴重的威脅。邱家除了「板信」，還控有「板橋市農會」，目前由邱家另一成員——邱益茂任總幹事。市農會存款額據估計已高達卅多億元。由此可知邱家在金融業界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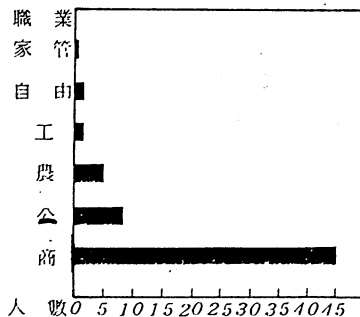
邱家人馬最早介入政治者是邱海水，曾任第三、四屆縣議員，邱明政也曾當選第七、八屆縣議員。邱家在目前政壇上最活躍的是邱益三。他畢業於台大法律系，由於其家世，甚為國民黨所器重。他在民國六十六年曾以無黨籍人士身份當選省議員，當選後不久即加入國民黨。在省議員任內，邱益三的表现是北縣七位省議員中最好的。但邱益三爭取縣長提名時，黨員內部反應並不好，有認為他入黨是為達成個人政治目的，也有人嫌他黨齡太淺。在縣長提名揭曉之後，有關當局便發表他為宜蘭縣黨部主委。邱益三抱著挫折

和無奈的心情去到宜蘭輔選，一方面又人地生疏，於是在黨外力拼之下，終於大意失荊州，在失去縣長又加上一名省議員席位的情況下，國民黨在宜蘭縣已淪為在野黨，這是國民黨在宜蘭縣空前未有的大失敗。選舉之後，邱益三又被調任基隆市黨部主委。黨方如此安排，並不意在懲罰，反而使邱益三離台北縣更近。邱益三是由前內政部長邱創煥介紹入黨的，顯然的，身為金融世家的子弟，他已被台籍高階層人士所接納，在不斷的提拔下，許多人都看好邱益三，認為他在北縣政壇大有可為，而且是未來少數可能由地方進入中央的台籍新貴。而邱家在北縣政壇的實力，也會像他們的企業一樣，穩紮穩打，蒸蒸日上。

國民黨與壟斷勢力

陳萬富賄選案爆發之後，國民黨對「三重幫」的警告固然嚴厲，但是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國民黨對地方壟斷勢力的態度。國民黨號稱是革命政黨，表面上接納所有的階級，但事實上可以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黨。我們從縣黨部的組織形式和實際的權力運作便可理解這一點。縣黨部委員中有來自各階級的成員，但是論權力，則主要集中在麥春福、呂芳契、李儒聰、林豐正、吳梓等人。後兩者是黨團出身，前數位均屬於豪門鉅戶。對權力和利益的爭奪做適當的分配和協調，國民黨在地方上才能維持穩固的統治。他的威信也建立在此。展望未來，北縣的壟斷勢力必然還會繼續膨脹，集團之間因為利益的衝突，而產生的種種矛盾也必然加劇，也因此，國民黨在地方上的統治將日益困難，其權威性也必然大為減低，但壟斷勢力再怎麼膨脹，在政治上都不能超越國民黨，這是「陳萬富賄選案」之後的經驗談。

北縣第十屆縣議員職業統計表





取材自 / 亞洲週刊 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

亞洲 世界中心移向

蔡仲章 · 譯

受訪者：沙納塔柯曼，現年六十八歲，曾受過法國教育，現任泰國副總理。

「我們已益加意識到，世界引力中心正從歐洲移轉到本區域。」

問 以其衆多的人口、豐富的資源、及發展的速度而論，你認為亞洲是世界的中心嗎？

答 世界「中央」或「中心」一辭，完全是中國—中土之國—及歐洲的一種概念產物，而非泰國或東南亞的產物。

時至今日，生活在亞太地區的我們已更爲意識到，世界的政治與經濟引力中心，已自歐洲轉移到此一地區，我們矢志去發展此種轉向。

問 許多人使用「西方」世界一辭以描述已工業化、非共的政治經濟集團。但在描述本地區時，你們是否慣常使用「遠東」一辭呢？

答 「遠東」一辭基本上乃是歐洲人的想法，它顯示出一種自我中心的傾向。歐洲人素來以他們自己爲中心去看待外在世界。因此他們乃杜撰出「近東」(Le Proche Orient)、「中東」與「遠東」等名稱。

問 你認為其他世界可自亞洲學到什麼？

答 我個人認為有一句名言至今仍然適用，那就是「律則來自西方，靈光來自東方」(Ex occidente lex, ex oriente lux 譯按：語出拉丁古語)。「靈光」(Lux)在此的含意係指宗教與哲學。而且，我相信亞洲業已顯示出，它有能力將其固有傳統與文化包容並調和西方的科技文明。

問 在那些發展領域上，亞洲可受益於其他世界？

答 亞洲一直致力於學習西方科學與技術上的發展與進步。

問 你認為亞洲在發展上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答 已開發國家對世界商品市場的控制以及西方大眾媒體的操縱。它們嚴重地阻礙了亞洲的進步、發展、與思想自由。

問 你是否覺得亞洲的學校一般皆過度強調西方？

答 是的，我確有此感覺，那是亞洲渴望在物質上與技術上求發展所使然。但是，現在一般亞洲

國家都有一種追隨及模仿日本模式，而非西方典型的傾向。

受訪者：鮑迪斯塔，法科大四學生，現為菲律賓學生聯盟秘書長。

「……亞洲教育往往無可避免地『曲意迎合』西方在亞洲的需要與利益」

問 你認為亞洲是世界的中心嗎？

答 就天然及人類資源上來說，亞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一塊大陸，而其人民正覺悟到他們待開發處境的現實，並正積極採取具體的步驟，以設法自種種外國主宰的新形式中解放出來，從這些意義上來看，亞洲或可說是世界的中心。在政治與經濟上，它正勇往直前地轉變成一個自重自主的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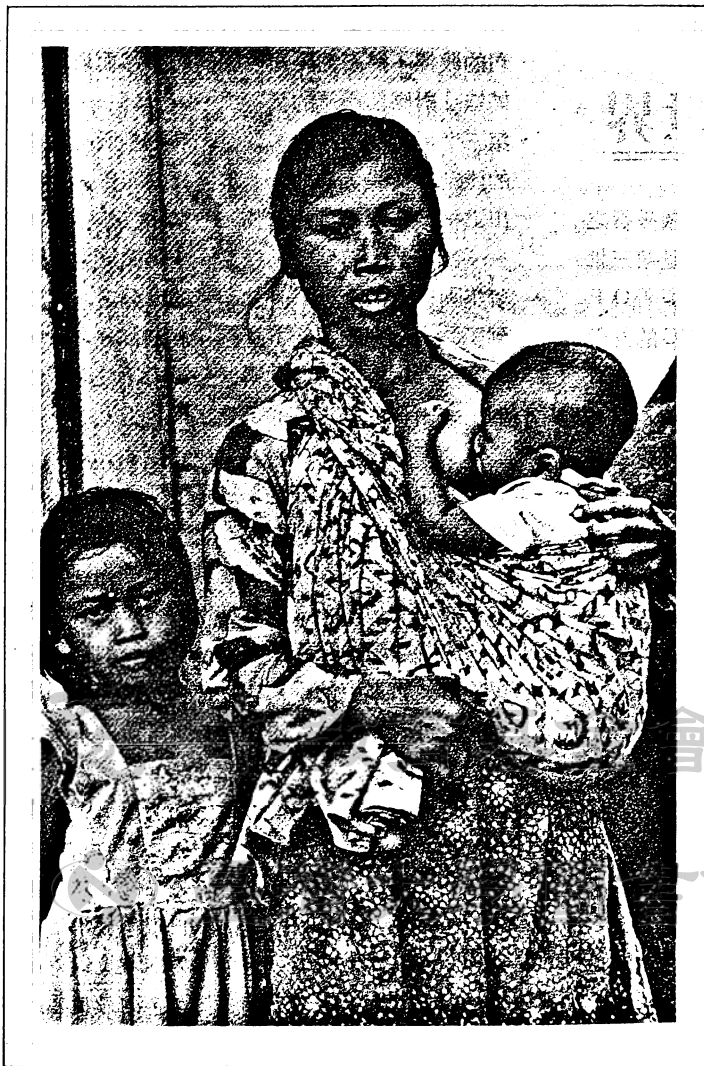
問 你們是否用「遠東」一辭描述本地區呢？

答 「遠東」一辭是十分主觀性的一事實上，它祇是西方的看法。我個人是極力避免使用這個武斷的名詞的。

問 其他世界有那些地方可學自亞洲？

答 其他世界可自亞洲民族的奮鬥經驗中學到許多

勤奮與吃苦的亞洲人民，正積極地採取具體步驟，設法從西方國家主宰的新形式中解放出來。



攝影 / 徐仁修



沙納吉曼柯——現任泰國副總理



鮑迪斯塔
——菲律賓學生聯盟秘書長

寶貴的東西。越南人民與中國人民從外國控制中力爭經濟解放與政治獨立，可為其他第三世界民族提供一種極其重要的經驗。亞洲可以教導西方，其他民族是不可長久奴役的，即使運用微妙的控制手段亦然。

問亞洲可自其他世界學到什麼？

答亞洲可自同樣致力於對抗外國剝削與主宰的鬭爭的非洲與拉丁美洲的經驗中，學到許多東西。

一旦亞洲國家取得了經濟上的獨立，他們將可開始迎頭趕上西方工業國家的先進技術。當然，科學與技術必須善加運用，以造福亞洲大多

數人民。

問你認為亞洲進步最大的阻礙是什麼？

答透過不平等貿易（Lopsided trade），外國貸款，與多國籍公司等手段而無孔不入的新殖民主義控制是亞洲進步最大的阻礙。先進西方國家的富裕導致了其他廣大世界的落後。亞洲進步的先決條件乃是政治解放。

問亞洲學校教育是否太過強調西方了？

答那是無庸置疑的。

由於許多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政策，實際上是由西方所督導的，因此亞洲教育往往無可避免地曲意迎合西方在亞洲的需要與利益。



□陳新

OPEC 與西方世界

一月廿五日在日內瓦召開的油國會議破裂之後，全世界不管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第三世界國家均以極關切和極矛盾的情緒在注視着OPEC的動向。許多評論家均同意，OPEC的瓦解，將爆發石油削價戰爭，短程中，對於石油進口國固然有利，但長程來看，石油輸出國收入銳減，不但會減弱其償付債務的能力，導致國際金融體系運轉失靈，而且，將減少自工業國的進口，而使工業國的出口萎縮，而輾轉影響到他們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間的貿易，如此一來，將又是一場全球性的經濟災難。

然而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全球性的經濟災難，他們固然不能倖免，但是OPEC可能瓦解，對他們來說仍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這話怎麼說呢？

如衆所周知的，六〇年代以前，乃是西方石油壟斷資本集團的黃金歲月，當時除了中國以外的第三世界的油田，大都操縱在號稱「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手裏，真正的石油主人——第三世界產油國却只能向這些外國石油公司抽取石油稅。而據以抽稅的每桶原油的標準定價（標價）的核算權，却操在外國石油公司的手裏。西方石油公司對第三世界的巧取豪奪，在二次大戰後，民族意識日益高漲的第三世界已經引發反抗的暗流。到五〇年代末，六〇年代初，由於蘇聯石油的大量進入世界市場，引發了國際石油價格下跌的危機，西方石油公司爲了將他們的損失轉嫁給產油國，不顧和中東國家的協定，兩度藉自削減標價，使得中東各主要產油國收入大減。西方石油公司這二次削價行動對產油國的打擊，終於使得這些國家覺悟到，唯有團結，有了組織和聯盟，才能有效地反抗石油財團的控制和榨取。OPEC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於一九六〇年成立了。

OPEC成立時只有五個國家，後來很快便增加到十三個國家。透過這個組織，產油國互通聲氣，協力合作，經過十多年的漫長鬥爭，他們逐

次地從提高標價，增加稅收項目，到擁有石油公司的股權，將石油公司收歸國有，甚而取消「七姊妹」對原油標價的發言權……，都一一證明了第三世界產油利益的一致性，和團結所必然帶來的勝利。從一份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報告，便可看出這場鬥爭中力量的消長。一九六三年，七姊妹——西方七大石油公司控制了北美洲、中國和蘇聯集團以外的全世界原油產量的百分之八十二，到了一九七五年，便下降到只控制百分之卅。同一區域內，各國政府和國營公司對原油產量的控制，則由一九六三年的百分之九，上升到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六十二。

在工業時代，石油不只是主要的燃料，而且是最重要的工業原料之一，它可以說是文明的神經動脈，沒有石油，維持這個文明的一切工具便告知癱瘓。早在一九四五年，當阿拉伯聯盟成立時，它的一項備忘錄顯示已注意到石油在阿拉伯民族解放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埃及前總統納賽在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舊作「一場革命的哲學」中也提到，石油是組織阿拉伯力量的三要素之一。

但是石油被用來當武器，還是第三世界產油國掌握了他們的原油控制權之後的事。石油武器第一次使用在國際政治事務上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阿拉伯之間的六日戰爭，當時在OPEC成員當中，除了伊朗和委內瑞拉以外的國家均對美國和英國這兩個支持以色列最積極的國家實施禁運一個月。在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以阿戰爭爆發之後，OPEC的成員國，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領導下，又再度對以色列的西方支持者實施禁運，這次爲時更久，從一九七三年的十月至一九七四年的三月。這次石油禁運所引起的震撼真可以說是驚天動地。由於油料的缺乏，一九七三年尾美國必渡過了有史以來最寒冷的冬天；因爲石油禁運引起的匱乏和混亂中，「七姊妹」與一些獨立的石油公司和一些國家政府的矛盾也激烈化了，整個歐洲也爲了石油供應的分配問題吵得雞犬不寧；一九七三年在西方世界已經出現的能源危機，由於禁運，更是火上加油，而就在危機重重的陰影中，OPEC又將石油標價提高一倍，而這時，整個西方又已開始呈現普遍的蕭條……。一九七三、七四年，對於西方國家來說，是個充

滿災難的年頭，對於西方世界，OPEC 不只結束了他們在原油開採和石油市場的壟斷，使得他們減少了鉅額利潤，而且石油做一種武器，也使得西方世界對第三世界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大為減弱。季辛吉當時便對西方世界強調 OPEC 擁有龐大財政金融力量，帶有極大的凶兆，它們將運用這力量來要求政治上的新關係。這些第三世界石油輸出國，對於自身的處境和力量也已有所覺悟，他們並不諱言使用石油武器；一九七五年三月，在阿爾及爾舉行的第一次 OPEC 高峯會議上，大會主席阿爾及利亞總統布遮丁便曾說道，石油生產國必須是「復興第三世界的先鋒」，要使用石油作為建立「平等的、公正的世界新體制」的工具。

OPEC 不但是第三世界團結、走向獨立、自立的象徵，而且也是第三世界對抗帝國主義的堡壘，因此長期以來，帝國主義者對其內部進行分化無所不用其極，如今見其可能瓦解，焉有不喜？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癥結

中曾根康弘上台之後，據日本民意調查結果發現，他是戰後歷屆首相中最不受民衆歡迎的，而他最近訪美所發表的有關日本軍事的言論，更大大激怒了日本民衆。

縱觀中曾根康弘上台之後的言論，可以總結如下幾點：①日本將追求與其工業力相稱的軍事實力，換句話說，日本將不只是經濟大國，也要成為軍事大國；②日本將要完成自主防衛，防衛區將擴及亞洲其它地區；日本將成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軍事盟友，而且將取代美國成為維護亞洲反共勢力的盟主；③爲了上述軍事目的，日本必需修改和平憲法，賦予軍事行動以合法地位。

上述中曾根康弘的言論，其實是卅多年來，日本軍國主義者彈爛的老調，所謂的三海峽防衛論，也只不過是「麻六甲海峽防衛論」與「釜山赤旗論」的續集罷了！中曾根康弘的言行如果有

新穎之處，恐怕是，戰後至今，還沒有一位日本首相敢把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張作如此積極而露骨的推動吧！

在日本，中曾根康弘早已是著名的修憲份子。所謂修憲，主要是修改現行和平憲法中的第九條：「……永久放棄以發動國權之戰爭，以武力威嚇、或行使武力，如解決國際紛爭之手段。爲達到前項目的計劃，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之戰鬥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和平憲法雖然是在美軍佔領，由麥克阿瑟元帥監督制定的，卻受到日本民衆普遍的支持，當時都認爲這個憲法是給予軍國主義的最後一次打擊。一直到今天，大多數的日本國民也將這部憲法當做抵擋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最後堡壘。而修憲份子却強調現行憲法是在佔領之下受外國人壓迫制訂出來的，是「非日本的」，是違反「獨立、自主」的原則的……在這些愛國主義的表面理由下，軍國主義者的真實目的是日本的再整軍。中曾根康弘在一九七一年防衛廳長官任內，便曾斷言：「爲了使來源可疑的自衛隊獲得毫無疑義的合法地位，有必要修改憲法第九條。」

由於日本民衆的抗拒，修憲的確有政治上的困難。儘管如此，戰後歷屆日本政府，早已無視於憲法第九條的存在，而悄悄再整軍了。直線上升的日本防衛經費便是這個趨勢最好的指針。日本的軍事費用雖然只佔日本全國總生產毛額（GNP）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日本的 GNP 佔世界第三位，防衛預算之龐大，在全球仍然名列前茅，僅次於美、蘇、中共、西德、法國和英國。許多人都不免疑惑，日本的軍事力量早已超過自衛的界限，爲何還不斷擴充？這個問題是要從日本產業界的性質來分析才可能理解的。

由於軍事裝備的大量擴充，武器生產在日本龐大的經濟中遂扮演着極重要的角色。今天日本產業界交易的百分之八十，皆依存軍事關係的訂購，產業界的興衰和軍備的是否繼續擴充已息息相關，也因此，產業界均將「軍事」看成是奠定日本經濟基礎的柱石，財閥們之所以積極支持軍事力的增強理由也在此。在這種「產軍複合體」的背景下，日本財閥和軍部的關係日益密切，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也就成了必然的趨勢了。

第一章 序 說

征服時間和空間，加速輸送和傳播的速度，利用宇宙的力量擴大人的能力、增加工業的生產力、過度地刺激著消費、努力試圖確立對於人和自然之絕對的中央統御……。

——魯易斯·曼福特：「機械之神話」

所謂「提高生活水準」的陷阱

一九七四年，美國有一項調查，問美國人心願中認為「最幸福的狀況」是什麼。結果，認為「更高的生活水平」是人生幸福之最的美國人佔二九%；「有健康身體」者二八%；「對子女的期望達成」者二四%；「世界和平」者十六%；「幸福的家庭」者十五%；「經濟安定，沒有不景氣」者十五%。

這個調查顯示了什麼呢？

「過更好、更豐富的生活」，竟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國社會中的人們的願望。對「更好、更豐富的生活」的祈禱，超過了對「健康」、「家族」、「和平」的企求，而成爲美國人心中最熱切、最高的願望。這其中的社會意含，就不是單純的事了。

一九五七年，李普曼在他的論文「富裕的目的」中，對於美國人的物質欲望，有這樣樂觀的提法：

「大多數在某種程度上富裕的現代美國年輕一代，在基本上並不是物質主義者。以品味和所有物來與人差別，不是他們的生活風格。恰好和外國人對美國的艷羨相反，把物質當作目的本身，而不知饜足地加以追求的情況，如果除去對現金和土地的欲求，一般地顯示衰退的趨向。」

這樣的論斷，是過於樂觀了。關於這一點，著名的經營學者彼得·杜拉卡，就顯得現實多了。在他的大著「管理」中，他這樣說：

「現在，在先進諸國中，大多數的人，至少在傳統的語意上來說，在經濟上都很安定。但是，大多數的人——除了極少數者集團——絕對沒有對物質的、或非物質的經濟報酬失去欲望的徵兆。正好相反，大多數的人，因爲嗜到所謂生產

大衆消費時代的終結

金 犬田

劍 充
／ 著
譯 著

性的果實的美味，明目張膽地對物質的獲得表示熱切的願望。實際上，這些人如果沒有要求得比這個地球所能提供的更多，至少，一定比目前人類經濟所能生產的限度多得多。」

這種對於物質的無厭的追求，絕不只限於美國而已。國民生產毛額僅次於美國和蘇聯的日本，也有許多資料顯示：日本人民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物質的豐富了。

在每一個先進社會中，提高當前而不是來日的生活水準，對於大眾而言，一直是一種具有必需追求的正當性的、積極的價值。

這樣，以大眾的水平，追求生活水準的向上，亦即大眾消費社會的出現和它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是人類歷史上一件不同凡響的大事。

在所謂「物質的豐盛」的甜美陷阱中，存在着某種強烈的東西。要從那陷阱中掙脫而出，在大眾這個範圍中，也許是困難到絕望的地步。因為，正如下文將要逐步討論的，我們是在「被製造出來的慾望」中生活和消費着。只要這種驅策力一日還是有效的社會性機能，人要從大眾消費中擺脫，是十分困難的。目前我們這個社會的目的，是一個享樂主義所支配的世界。正是從這無限提高生活水準的執念中，滋生了大眾消費社會的各種問題。

貧困才是人類生活的常態

消費型態或生活樣式的提高成為大眾狂奔以赴的價值的時代，從歷史上看來，並不久遠。那只不過是十八世紀的英國——當時在全世界上最富裕的——社會。

在那以前的歐洲社會裡，奢侈、豐富的生活，是只有少數貴族才可以過的生活。對於上流階級，奢侈是他的工作。

依於身份階級的生活樣式的規制趨於崩潰，人人都准許，並且可能追求生活水準的時代，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只佔過去兩個世紀那麼短的時期。

從物質的豐裕情況來說，人類的歷史絕大部份和今天先進諸社會的豐厚相比，一直都是極為貧困和匱乏的。

以古代羅馬為例。在當時榮富強盛一時的羅馬，騎士階級算是羅馬社會的中產者。可是一個

騎士最低法定財產，約為一億三千多日圓（約為台幣二百萬）。在當時一百二十萬羅馬人中，有三分之一到半數的人口，是依國家免費穀物配給生活的貧民。歷史上繁華一時的羅馬，較之今日先進國社會，只算是個破落的國家了。羅馬人住居條件極惡，因此，都把大街當客廳，進行他們的社交生活，消磨時間。羅馬的公園和公會堂，其實是羅馬窮人居無適所的社會產物。貧困，在歷史上，是人類生活的常態。

曾經樸素過的日本

不久之前，簡單、樸實的生活，在日本一直是大眾習以為常的生活。一八九六年，歸化日本的歐洲人小泉八雲會這樣說：

「沒什麼傢具，身邊用品，也簡陋猥小，衣服也只有兩三件……就這麼過著日子。這表示了日本民族在生存競爭中具有很強的力量。這也同時顯示出歐洲文明中潛在的某種弱點。在日本人簡單的生活，叫我們反省：我們歐洲人的日常用品裡，有多少無用、不當的東西。我們如果沒有了牛油、麪包和肉，就一天也過不下去。玻璃窗、暖爐、襯衫、毛質內衣、長短靴、皮包、皮箱、棉被……這些，日本人一樣也不要，卻能好端端地生活。不，日本人正因為沒有這些東西，才反而過得很安樂。」

他又說：

「（日本人）有一個奇怪的胃，可以把西洋人看來要命的東西吃下去，從而得到營養。他們的身體，也真是頑健。他們還不會受到不衛生的重裘錦衣、奢侈的用品、暖爐、皮鞋這些東西的毒害，所以耐寒、耐暑，雨露風雪中，身體却硬挺得很。」

日本向「富庶」起飛

對於日本人民大眾，就如小泉八雲所描寫的，在歷史上，他們的生活中貧困一向是常態，富裕才是例外的。富奢的生活，是只有上流階級才被許可的美德。這些極少數的日本上層階級，一直在和日本人民離得遠遠的領域中生活着。

反之，如果下層階級也好奢惡貧，就會以擾亂和破壞現有社會秩序的名義，受到嚴酷的懲罰。窮人要守份、守窮，是這不久之前日本社會共

通的理念。

這種共通理念發生了變化，並且在大家範圍內對奢華、對物質慾求的放縱與滿足，僅僅是最近的事。

促成物慾的放縱和滿足成爲舉世風尚的要因之一，是歐洲的商業革命。重商主義時代的歐洲，從印度、中國運進烟、茶、陶瓷器、漆器等珍貨奇玩。歐洲的貴族、富賈和地主階級，爭相過着「炫耀的奢侈」。而後，中產階級也加入了行列。這是因爲英帝國從亞洲的輸入增加，使這些當時的奇貨價值下降。原先的奢侈品，成了日常品，而統合成爲一種新的生活形態和方式。例如，紅茶原爲上流階級才能享受的東西，隨着輸入和掠奪的增加，紅茶也變成下層階級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就是這樣，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產生了一種「生活的革命」。只要有能力維持一種上層的生活方式，就會被上層階級承認爲那一階級的一員，而以同階級對待。人的生活樣式規定人的社會階級地位這樣一個新時代就這樣開始了。而這種改變，終於成爲近代經濟發展最爲基本而且重大的前提條件。

新的「意識革命」

在產業革命中誕生而成長起來的產業資本家，同從事消費和休閒的貴族階級，在行動上、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上，有截然的不同。產業資本家階級，是一種新的「意識革命」的鼓吹者。

對於產業資本家而言，勞動是神聖的。正直、忍耐、勤勞，是美德。這也就是韋伯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這不僅是一種新的生活態度，他們也確確實實是在進行一種新的「意識革命」。

產業資本階級認爲：節約是一個重要的德目。把利潤有意識地投入下一個生產行程的辦法，是他們卓越而重要的發明。

這種理念，不僅適用於生產，也適用於其後的消費。那就是爲了提高生活水準的永不疲倦的努力。

結果，我們開始身陷形形色色的商品之中去過生活。在今天，我們在各種各樣耐久消費財包圍中生活，已是慣常的事實。據日本政府一九六

二年的調查，日本人最想要的東西，是收音機、縫紉機、電視機、洗衣機。認爲這些東西全有了，生活就滿足的人佔受調查者的二三％。除了上述用品外再加上冰箱、吸塵器才滿足的佔四四％。還要再加上汽車、鋼琴才真正滿足的人，又佔十五％。日本人慾望的巨大成長時期，恐怕就是在這個時候。這「意識革命」不只發生在人的意念世界中，也在物質世界中引起了巨大變化。這是值得深刻注意的一件事。並且，物質世界的變化，又誘發了意識的變更……。

豪奢的太空船

有人把地球比做在宇宙中孤單地運行的太空船。把這地球想成一個乘坐著四十億人類，生死同命的太空船，是從經濟學家B·渥爾德或K·E·鮑爾丁開始的。不錯，這種比喻，真實地表現了這個事實：我們所居的地球環境斷非無限，而且以今日人類所持有的巨大技術力量來看，地球上的發展，是有明顯極限的。

但是，把地球看成太空船的想法，也可有這個思考的開展：謬我們先想地球這個有限的環境，而不是悠渺的宇宙。那麼，我們又可以想到就在這地球環境中，彷彿有幾隻獨航的太空船隻。這些太空船，便是日本、歐洲、美國和第三世界。如果再仔細觀察，我們還可以發現各式各樣種類與大小不同的太空船浮游着。

那叫做「第三世界號」的太空船，譬若救生船，體積小，船上只有極少的設備和糧食。但是，我們這隻日本船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的船，是豪華級的太空船。在這隻船上，我們盡情享受着自由、享受着隨心所欲的消費生活。這個地球範圍中的不同的太空船的概念，是羅馬俱樂部日本研究小組的竹內靖雄所提出的。竹內先生更進一步指出：這個叫做「現代社會」的大型豪華巨輪，根本不曾有「救生船」的裝備（香山健一·公文俊平·竹內靖雄：「關於均衡狀態之社會體制的研究」）。

而我們的豪華巨輪却只有一味變得更豪華、更華麗。一九五〇年代，全世界所生產的財貨與服務總值有一兆美金。二十年後的一九七〇年，這總值跳升到三兆美元。換言之，二十年間，世界經濟活動的規模，約略擴大了三倍！於是我們

的豪華巨輪，也就越來越豪華了。

正如 E·J·米驟所說：

「幾世紀間，在人民習慣於勞苦、辛勤的生活，把經濟活動看成爲惜物、勤儉而日日艱難營生的時代，人類從沒有因爲夢想富裕、豐富的生活而使心境爲之騷動的事。那時候，人們只知道流汗勞苦，一心一意爲營生而工作。」（米驟：「經營成長之代價」）。

然而，如今那流汗勞苦、惜物儉約的日子，早已遠遠地離開我們了。

享有世界最高生活水平的美國人，花掉相當於聯邦爲了撲滅貧窮所需預算的二十億美元，去買大鑽戒寶石；花去相當五十個洲的社會福利預算，從事環球旅行。對於這個事實，安德留·赫嘉說道：

「社會正在加速地頹廢著。濫字充數的學校，人手不足的醫院，雜亂的觀光地，擠滿了車輛的高速公路。今天美國人員只要離家一步，就有危害身體、在美學上是醜惡的、道德上不穩定的環境在等待著你。在美國，公共場所再也不是文明的世界了。」（上述作者：「美國時代的終結」）

羅斯陶的概念

把不斷趨於豪華的先進社會的情況，使用「經濟成長」的概念加以把握的，是著名的 W·W·羅斯陶了。在他舉世聞名的「經濟發展的幾個階段」中，把經濟發展分劃爲這五個階級，即：(一)傳統社會；(二)爲經濟起飛預備條件的時期；(三)起飛時期；(四)向成熟時期前進；(五)高度的大衆消費社會。


羅斯陶以爲，大衆消費社會，且有這五個特質：

第一、經濟主導部門，向耐久消費財和服務轉移。

第二、停止將近代技術的擴大當做一切的優先目的。福利國家的出現——把增大的資源運用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

第三、越來越多的資源，轉向耐久消費財的生產和服務的普及上。其中最具決定性的，是便宜的大衆乘用車。一九一三～一四年，是福特汽車廠的轉捩點。在這個階級裡，社會的關切，從供給轉向需求，從生產問題轉向消費問題。

羅斯陶提出在大衆消費社會中汽車的核心地



臺灣大學圖書館 數位化

新生代 雜誌

敬告

關心國是者

執政國民黨

無黨籍人士

誰是爲民服務的民意代表？

誰是牟利爲己的民意代表？

下期重要預告：

郵政劃撥：541515 新生代雜誌社 電話：(02) 9120900 · 3963186

位，有深刻的意義。

神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與此相反，人却以自己的模樣為張本，創造了神，而造物與受造之物間的類同性，便是這樣產生的。同理，大眾消費社會依照它自己的構造與機能，創造了汽車；而汽車也沿着把自己「合理化」的方向，不斷地改造着社會。

正如本書後半即將提出的，大眾消費社會和生活其中的「消費人」(homo consumer)——以為消費得越多，人就越是幸福；尋求感官刺激、嗜好物質、大量消費資源、追求暫時性的享樂，顯示淺薄的樂觀主義的現代人——這些特性來看，汽車確實是以生產了汽車的社會為張本所模仿出來的東西。

如果在大眾消費社會中還有神存在的話，這神便是以汽車的形象顯現出來。因此，汽車在無數的現代產品中，是能象徵性地表現出現代大眾消費社會的性格，而成為這個社會正統的嫡出之子。

喬治·弗利曼說道：

據說，做為一國繁榮和『進步』象徵，並且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的，便是汽車化的進展和每一公民所擁有的汽車的數量。汽車廠商，試盡各種辦法來推廣這個神話。因此，在他們稱其年度銷售報告為一種『戰鬥報告』(弗利曼：「力與智慧」)。

依據羅斯陶的診斷，日本已經在一九五〇年代完全地進入了「高度大眾消費社會」的階級。羅斯陶在「高度大眾消費社會」的下一階級，預設了一個叫做「脫大眾消費社會」的「消費的彼岸」。到了這個階級會不會發生人類精神的沈滯的問題，以及如果會發生精神沈滯的問題，應該如何加以防範，成了我們的重大的課題。

不平凡的狀況

和羅斯陶不太一樣，從所謂微心理學的立場去研究消費社會的學者，是經濟心理學家 G·卡德拿。在他於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大眾消費社會」一書中，他說道：

「過去二、三十年間，在美國，發展出了一個於人類歷史上極為不平凡的現象，即大眾消費社會的發展。」

大眾消費社會的形成之所以「不平凡」，在於這三個方面：

一、富裕：不僅只是極少數的富人，也不僅是一小撮上流社會的人，眾多的家庭已經具有自由選擇的購買力，以不斷地購買消費財。而購買的數量，也在不斷地增加着；

二、消費者權力的增大：業凡經濟的周期性變動、通貨膨脹、不景氣、成長率等，今日已與消費者的行動發生十分密切的依存關係；

三、消費者心理的重要性：消費需要已不只和所得有密切關聯，且和人對未來的期待有關。自由選擇的需求，已經具有十分顯著的經濟功能。

關於對大眾消費社會的意見，我們已經舉出了羅斯陶和卡德拿兩個代表性意見。他們的意見，可以概括如下：

斷絕了的社會

首先，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歷史中，一向只向一小撮社會上的上層開放的高度生活水平，現在已能夠為一般大眾所享有。一般的大眾可以過安逸的、浪費的生活，並且堅信在今後還可以達成更高的物質消費水準。

其次，是先進各國，對於渴求達成比目前已達成的更高的物質生活水平的慾望，一點也沒有因為今日他們的生活已相當富裕而稍減。事實上，現實、具體的物質獲得，對於今日社會大多數的人，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誘導力。「更高的生活水平」，一直是驅使人為了達到更高的生活，拼命工作的刺激力量。「消費飽和點」即使存在，也存在於遠遠高出目前水平的某一個地方。一切先進社會，看來離開這飽和點很遠。

最後，在大眾消費社會中，炫耀性的消費行動，與炫耀性的生產，相應地增大。

這樣的大眾消費社會，對於當前的人類有什麼影響？對於將來人類終極的發展又會有什麼影響？而這大眾消費社會的本質，又是什麼呢？(1)

下期預告：

日式消費社會之形成



歐洲資本主義的萌芽

□學 述

歐洲中古是所謂的封建時代，時間約從西元九世紀到十六世紀，這個時期的經濟制度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可是，自十一世紀中葉以後，西歐的商業、工業逐漸發達，都市日益繁榮，農耕與採礦的技術也有了改進，到十四、十五世紀時，資本主義即萌芽茁長，莊園經濟則日趨崩解，文藝復興是在這樣的物質環境裏產生的，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也是在這時奠下了初基。

這個從封建的莊園經濟蛻變成資本主義雛形的過程，極為漫長而複雜。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市是最先發生蛻變的地區。十一世紀中葉以後，西歐恢復與東方的貿易，意大利位居地中海海運的樞紐，壟斷了西歐和東方的貿易，威尼斯、佛羅倫斯、熱內亞、那不勒斯等成為商業興盛、資財富裕的城市。這些城市的商人積聚資金，開闢新航線，十四世紀時已能遠航北歐、大西洋與英國、北日耳曼的商業同盟直接貿易。他們為了拓展商務而組織公司、開設銀行，發展出簿記、支票等資本主義的經營技術，具備了資本主義的雛形。封建的莊園經濟原是自物自足的「實物經濟」，此後即漸以「貨幣經濟」為主。

商業的發達與貨幣經濟的實行，深刻地影響了西歐的農業制度。有些領主為求現金，要農奴繳錢幣來代替貢賦及勞役，或允許農奴以錢來贖身、租地，許多農奴因而得成自由民，有的到城市做工人，有的則成自耕農，種植經濟作物，出售到市場牟利。另有些領主則在自己的領地專種市場所需要的作物，作商業式的經營，成了小資本家。於是莊園經濟逐漸崩解，現金交易的貨幣經濟開始取代了中古封建的階級與勞役制度。

這個轉化的過程約始於十三世紀初，至十五世紀末大抵完成。

中古歐洲原有貴族、教士、農民三階級。自資本主義漸興，就出現了資產階級—布爾喬亞(Bourgeoisie)。資產階級原意是「住在城裏的自由人」，包括商人、貿易商、工匠等，是介於貴族與農民之間的階級。可是，隨著工商業的發展，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有些商人累積資本再擴大投資，或者開設銀行、放高利貸，資財愈益龐大，遂形成了一個不同於一般市民的特殊階級。中古後期的資產階級即專指這類腰纏多金的富商、資本家。他們組成同業公會以雄厚的財力向封建領主爭取權利，促成城市在行政、司法上的自治，中古時期的自治市相繼出現，大多出於他們的努力。他們在城市中居領導地位，不僅控制經濟也控制政治大權，政府中的行政、立法權都操在他們手中。他們運用權力制定合於本身利益的法律，侵害其他市民，尤其是工人的權益。威爾·杜蘭(Will Durant)在「世界文明史」中說：

在大多數的城市，他們將貧者排斥於議會及公職之外，壓迫勞工和農民，壟斷商業利益，向社區課以重稅，耗費大半的收入於內爭或外戰以爭取市場，摧毀競爭者。極力壓制工藝協會，不給予他們罷工權利，懲罰之刑有放逐或處死。又規定價格和薪金，只顧其本身的利益，嚴重地損害了工人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歐洲自十三世紀末到十四、十五世紀發生了多次的工農暴動，此是後話，暫且按下不表。

中古歐洲的資產階級致富的方法，除了從事貿易，經營工商業外，就是放貸與設銀行。有些

富商憑藉豐厚的資財，以高利貸款給工匠、小生意人，借貸者常因利息過高，無力償還而淪為受僱於人的無產者。有的放貸者、銀行家或貸款給國王、貴族或為教廷徵收稅金、獻金，而獲取商業、政治、宗教上的特權。這類資產階級不但富可敵國，也常是權傾一時，能左右國政的有力人物。現在舉意大利的麥地西（Medici）家族、日耳曼的傅格耳（Fugger）家族及法國的夏克·格耳（Jaques Coeur, 1395-1456）為例，以見一斑。麥地西家族的銀行是十五世紀歐洲最大的銀行，分行遍及西歐各大商業中心，此外他們還經營大規模的工商業，可謂集工、商、金融業於一身。憑着這股龐大雄厚的財力，麥地西家族統治佛羅倫斯達六十年之久，不僅如此，麥地西銀行還為教廷處理各處的財務，麥地西家因而出了兩位樞機主教，並進一步登上了羅馬教宗的寶座。日耳曼奧格斯堡的傅格耳家族也同樣在經濟、政治、宗教上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先從事貿易，借錢給提洛爾（Tyrol）的公爵，藉此取得該公爵領地內銀、銅礦的稅權，遂得以操縱提洛爾地區的銀、銅貿易，因此而成巨富。接着又取得匈牙利銀、銅礦的開採權、壟斷銀、銅的市場，獲取暴力。傅格爾家的財力在歐洲國王競選神聖羅馬皇帝時，顯出驚人的威力。傅格爾家借錢給哈布斯堡王族的查理王世去賄賂各選侯，查理王世便擊敗了法王法蘭西斯一世和英王亨利八世，當選為神聖羅馬皇帝。當選後查理王世開放對葡萄牙的香料貿易並讓傅格爾家獨佔壟斷。一四九四年佛羅倫斯的麥地西家族垮台後，羅馬教廷的稅捐司獻金改由傅格爾家族代收。宗教改革時，傅格爾家又貸款給哈布斯堡王朝對付新教徒。以上所述都是大家族的財勢。法國的夏克·格耳則是以一人之力，權傾朝野。格耳經營國際貿易，擁有貨船無數，資財之雄甚為驚人。英法百年戰爭的末期，一四四八年時，他自資提供十一艘船與兵士擊敗英軍，為法軍解圍。他經常資助法國政府，在政界也甚為得意。當過總管王家財政的主計官，王庭會議的議員，並被賜封為貴族。後來連巴黎等地的製幣廠也由他管理。他的兒子當了Bourges的總主教，弟弟當了Lucon的主教。他屢屢出使各國，或代表國王參加地方的三階會議。一四四九年查理七世攻下諾曼地，他

爾身貴族之列和國王並肩進入盧昂城。不過，後來因他氣焰薰天，又有許多貴族向他借款過多，難以清償，就誣陷他下獄，後來他付巨款贖身，查理七世沒收他的財產，把他逐出法國。

中古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財富集中於少數資產階級手中，工人與農民則普遍處於受壓榨剝削的悲苦境遇，於是自十三世紀末起即發生多次極為慘烈的工農暴動。在莊園經濟逐漸崩解時，許多農奴從附著的土地游離到城市，成了沒有技術的勞動者，而城市中原有的工藝同業公會（Guild）也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而變化。公會的店主（Master）通常是貴族，為牟取更多的利潤，要店中的技工（Tourneyman）、學徒為他長期做工賺錢，便壓制技工、學徒不讓他們升格為公會的會員，這些技工、學徒因不能升為店主，無法獨立開業，就只有受僱於人，成為無產的工人，而店主則變成雇主和資本家。富有的資產階級有大量資金可購買原料、機器，又握有財勢，在經濟、政治上屬於支配者的地位，常訂立法律嚴禁罷工，得以極低的工資雇用工人。如一三五一年因黑死病而人口銳減，工資高漲，英國國會就通過勞工法，嚴禁工人、農奴、佃農提高工資，拒絕工作者則逮捕入獄。這個法令是國王「和高級教士、貴族以及其他飽學之士」的一致意見。資本主義萌芽期的許多工業已經用大量生產，分工合作的方式經營，當時的工業主要是紡織、毛織工業，一些工作如清洗羊毛、整理羊毛等，只需勞力，不要任何技術，工人的去留完全由廠主決定，自然易受控制、剝削。農人方面的境況也一樣的悲慘，他們要負擔各式各樣的租稅，遇有戰爭，戰費及戰後重建的費用也大都落在他們頭上，至於貴族、鄉紳、教士和富商則深知逃稅妙法，不會有何重稅臨頭。在這樣的情況下，十四、十五世紀歐洲發生了多次的工農暴動，如一三五八年法國有一次農民暴動，一三八二年在巴黎、盧昂兩市的市民也暴動。義大利的政治、社會是中古歐洲最為動亂不安的。一三七八年佛羅倫斯發生一次工人暴動，紡織工人要求組織基爾特維護經濟利益，並要求參加政府以維護工人的公民權，雖獲短暫的成功，一三八一年又恢復舊觀。十四世紀最著名的是一三八一年的英國農民暴動。暴動的起因是英王理查二世連連

征稅。英法百年戰爭（一三三七—一四五三），進行多年，英國節節失利，政府需錢擴充軍備，這個負擔當然是由一般平民來承受，遂激起他們的不滿，他們向查理王遞呈請願書，要求「經濟上的平等」，其中一項就是取銷一三五一年訂立的強迫工農工作，不准提高工資的勞工法。這次暴動頗受當時盛行的社會—宗教革命思想的影響，這些思想主張回到財物公有，沒有階級區別的平等生活。英國有名的宗教改革家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一三三〇—一八四）不遺餘力的宣揚這樣的思想。彼時流行的口號是：「亞當耕種，夏娃織布，當時又有誰是紳士？」這次暴動的領袖之一約翰·包爾（John Ball）是個浪跡各地的教士，他常在星期天，民衆望完彌撒，走出教堂時，在市場上聚集一大堆人向他們說：

朋友，除非在英格蘭一切東西都爛大家，除非取消主人與奴役之別，除非主人不再主宰我們，情況是不會好轉的。他們是如何的虐待我們，他們憑什麼如此壓榨我們？難道我們不都是亞當和夏娃的後代麼？他們能有什麼證明，或有什麼理由，說他們是我們的主人？他們穿戴着華麗的服飾，而我們卻衣不蔽體，他們吃的是美食，喝的是美酒，用的是香料，而我們用的則是粗茶淡飯和白開水；他們出有車，住有堡壘，而我們則披星戴月，在中田辛苦勞作；是憑我們的血汗他

們過着舒適的生活！他們稱我們是奴隸，如果我們不勞作，他們就會鞭撻我們，而我們竟沒有一個上司可以向他伸訴，也沒有一個人願意聽我們訴苦的。讓我們到國王那裏去，向他訴怨。他年輕有為，或許會細聽我們的話；否則，我們只有靠自己來改善我們的情況了。（此處據王任光教授譯文）。

這樣的言論自然極易得到飽受剝削之苦的工農的共鳴。各地農民湧向倫敦。沿途拘捕貴族、紳士為人質，六月十二日各路人會集倫敦立刻受到當地中下階級的支持。次日，會見理查二世，遞上請願書。有一批人則逮捕宰相、財政大臣及其他重要官員，在審判後，斬首示衆。鄉間的農人則縱火搶劫貴族的堡壘、鄉紳的別墅、教堂、修道院等，並把田地租契、勞役記錄等付之一炬，作為「解放」的象徵。理查二世雖曾答應要為他們爭平等，但隨即又聯合貴族和教士用武力把他們鎮壓下去了。

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狀況大抵如上所述。資本主義的萌芽茁長使歐洲靜態封建的經濟趨於崩解，提高了歐洲的生產力，奠定了日後歐洲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也孕育了文藝復興的燦爛文化。但是，貧富的差距、勞資的對立、階級間的衝突也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愈益深刻，尖銳了。

從小小的紅包袋改革起.....

縱使是一個小小的紅包袋，
也可以發揮我們的改革精神，
今年農曆年，
如果您需要紅包袋的話，
請您選購富於浪漫精神的中國紅包袋。

——三位設計家，為我們設計了七種新式紅包袋，不僅圖案變化豐富了，在色彩上更突破了傳統.....

.....不論大批、小批、零買，歡迎來電洽購，公司行號歡迎索取樣品

●重要零售處「台大香草山書屋，博士書店，各書報攤.....

浪漫藝術中心
TEL：(02)9311742

從個人經驗到社會經驗

□陳鼓應



編按：

八月廿一日旅美台大校友會及史丹福大學東亞中心舉辦座談會，邀請陶百川、陳若曦、錢寧及陳鼓應主講。陶百川講“從我與康寧祥看台灣政治”；陳若曦講“淺談當今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心態”；錢寧講“我從事編輯工作之個人體會”；陳鼓應講：“從個人經驗到社會經驗”。座談會主席是台大校友會會長李玲瑤，地點在史丹福大學校內，參加座談會人數有三百多。陶百川、陳若曦、錢寧三位的發言內容，島內報刊均有介紹。這裏是根據陳鼓應發言錄音及其發言稿整理出來的。（李瓊整理）

民權、人權、主權

我個人的經驗，想從生活經驗和讀書經驗方面來講。這些經驗中的社會經驗，漸漸構成我對「三權」的關心。這「三權」就是民權、人權和主權。它成爲我日後生命活動中的重要部份，其中民權運動尤爲主線。

在民權活動中，我們爭取表達權、抗議權、參與權。初時僅限於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在發展的過程中，才逐步擴及基層民衆。而思考問題範圍，也由政治的領域擴展到經濟的領域。

不少人因爲發表演論文字而遭捕。這樣，在爭取民權的過程中，又經常發生人權受損害的問題。

三權是有相關性的，比如主權，並不只是領土管轄的問題，它對一國人民的安危和發展有莫大的關係。當我們受到外敵入侵時，主權發生了問題，人民也會遭殃，就像「南京大屠殺」那樣的大悲劇。國家分裂處於戰亂的時候，一旦實施戒嚴法，民權和人權自然就會受到很大的箝制。由這裏，也形成我的反戰思想——無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或內戰的自相殘殺所帶給人民的巨大災

難，從我童年時代開始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對現實的回應，多屬台灣經驗。最初我所關心的問題，集中在言論開放的範圍。由於參加了幾次座談會，寫了幾篇文章以後，本來是想為青年人爭取些發言權的，結果以言獲罪，反倒弄得自己長時間被剝奪了發言的機會。自從被警總約談以後，連基本人權也風雨飄搖。多年全就看到不少周圍的人因「思想問題」而失蹤，自己的切身經驗使我更能體會人權保障的迫切性。主權意識是經鈞運思潮的激發而增強的，其後發展而為反帝的民族主義思想，並進而對現行資本主義體制有著反省性的認識。

在轟炸中成長

小時經驗，有三樁事情在回憶裡可以和日後發生聯繫的：一是戰亂的景象；二是農村的生活；三是舊式的教育。

從我有記憶開始，就在警報聲中長大的。日本飛機每天來轟炸，警報一響，母親慌張的臉孔，一把拖著我朝城外跑，等到解除警報聲響後，才敢回家。一路上經常看到房屋在燃燒，屍體遍地，親人在哭啼。

由於日機不斷地濫炸，我們便由城裏回到鄉下。我的家鄉是在福建長汀縣河田鄉，屬於客家地區，孫中山是客家人，他的祖籍是在明代的時候由河田鄉搬到廣東去的。我們鄉下的生活真窮，早上吃蕃薯，中午吃芋頭。這一段農村生活，使我日後在鈞運呼籲知識份子關心基層民衆的運動中，很快的能走出象牙塔。鈞運以來世事變化雖然很大，但我個人仍有較強的社會意識。

家鄉很偏僻，在鄉下惟有接受私塾教育，每天要默四書，老師也不給我們講解句義，只讓我們搖頭晃腦地死背。這種強迫式的教育，使我看到課本就覺得乏味，我一直對儒家打從心裏沒有好感，和小時這種教育也不無關係。

討厭背四書，但我喜歡課外看小說。小說裏的「四書」——西遊記、封神榜、三國演義、水滸傳——看得津津有味。那時候我們的英雄便是武松、關公、姜子牙、孫悟空。童年生活確實較愉快，「英雄」可以多元地存在，不像長大以後的環境，只能有一個「萬歲」。

小時教育唯一的樂趣是背詩。用客家語去吟

詩，音調要比國語更有味兒。我不會唱歌，不懂得生活的排遣，但鬱悶時就唱唱詩。小時的詩歌教育，無論對寫情寫景的作品，真覺「江山萬里看無窮」、「柳暗花明又一村」。自從我對中國思想史發生興趣以後，特別留意現實主義的作品；從詩經、漢代樂府、李、杜、白居易之作，到三十年代的新詩，內容豐富極了。同時我也很欣賞屈原、陸游到聞一多一系列的愛國主義的詩歌。中國文學，僅就詩歌傳統以觀，真是一座偉大的文化長城。這是我對歷史文化裏恨愛交織成分中熱愛的一面。

讀「自由中國」的年代

我在十四歲那年隨父母到台灣。那時台海局勢吃緊，我讀初中的時候，正逢大陳撤退，軍隊駐進學校，我們沒有教室，就在操場並借民房上課。和我同年代的，都經歷過這五十年代的兵荒馬亂，六十年代的政治悶局——自從一九六〇年雷震被捕、「自由中國」雜誌被停之後，整整十個年頭沒有一份民間政論性的刊物得以存在，一直熬到七十年代初，才透出「大學雜誌」的革新聲音。比起現在的新生代，他們要算幸運多了，六十年代政局雖沉悶，但經濟情況好轉，新生代成長及受教育於較安穩富裕的年代，七十年代後風氣漸開，他們的參與也較順些。我們早年做文章的時候，相當辛苦，沒有什麼刊物激發你寫東西，寫了些意見也找不到地方登；好不容易發表出來，周圍的困鎖力也大。想寫本書一邊寫就一邊想到被禁的問題。一旦被禁，麻煩可大。不比後來，像「選舉萬歲」被禁，作者一夜之間可成英雄。人多勢衆，氣候的確不一樣了，現在新生代崛起的時候較快，迅速就進入運動場。而我們那時，爭取一點點發言權，無不跌得滿身傷痕。這是後話，現在回頭講我的讀書經驗。

中學的時候，我們腦子全被盯在「標準本」的教科書上，真是目光如豆。進入大學以後，才開眼界。在台大一年級的時候，有三件事對我有重要的影響：一是看「自由中國」雜誌，二是聽殷海光教授的課，三是讀三十年代的作品。我只能在這裡簡單的說說：和我同時期而稍有嗅覺的人，幾乎沒有不看「自由中國」的，它撥開迷霧，使我們看清楚現實是怎麼一回事。和殷先生接

觸，他的人格教育遠比邏輯知識訓練更為受益，他的堅持理想與不妥協的風格，對我們有很深的影響。在我大一時，輾轉地從同學那裏看到一些三十年代的作品，使我一直頗為憧憬五四時期的人物思想。

大學求學時代，一方面係老鼠跌入米坑，另一方面覺得大部分的哲學課程都像在說天書。從柏拉圖的「理念世界」到黑格爾的「世界精神」，覺得和我的思想生活不能發生任何關聯。一直到我進研究所讀到尼采和莊子的著作，才使我和哲學有了內在的聯結。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寫洛克的知識論。他的知識論在西方哲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不是今天的話題。不過我順便提一下，洛克政治理論中將自由、平等列為不可渡讓的自然權利，這觀念對我那時頗有影響。啟蒙運動人物的批判封建制度、反對等級特權、反對專制主義、否定壓迫人民的國家和法律制度的體系，這些觀念也為我所讚賞。但真正摸索出一條自己要走的路，還是在唸研究所以後。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我讀台大哲學系研究所的時候，有兩件事對我很重要：一是開始研究尼采，二是我認識了一些時常討論問題的朋友。

大學時候唸書，就像無頭蒼蠅一樣，毫無系統。哲學著作本來就很艱澀，淺嗜即止，就像瞎子摸象，雖然花了不少工夫讀柏拉圖「對話錄」和洛克「人類理解力」等原著，但依然書是書，我是我，兩者之間沒有什麼交通性。但我接觸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以後，便豁然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尼采的文筆十分犀利，他真是時代的挑戰者，對傳統文化——從柏拉圖到基督教文明——所進行的批判，明快有力。他鬥志如虹，他說：「凡是墮落的，都應該推倒！」他充滿了戰鬥性，「我以我的健康意志與生命意志創造哲學……在我生命力最低潮的歲月裏，我仍不會成爲一個悲觀主義者。」讀尼采的作品，直覺生命力的鼓舞，活潑奔騰。總之，尼采哲學的積極性，轉變了我的生活態度。

在研究所的時候，我們一伙同學自己辦演講會，同時又在「文星雜誌」上寫稿。本來大家想

利用這園地介紹些新觀念，如果發展得好，或許可以推動一個革新運動。但不久內部發生了一些問題，衆言堂變成了一人獨擅的攪局。

在那時的朋友裏面，我最懷念包奕明，他不僅常和我談存在主義與尼采，也引發我讀莊子的興趣。尼采和莊子的思想雖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在追求人生的自由下，反對傳統規範的約束、反對政治力的干涉、反對權力導致人類的災害性等，都有相同的批判態度。某種意義下，老莊和尼采的哲學，都可稱爲自由哲學。而他們所談的自由，是屬於人的內心生活的某種狀態。這種崇尚人的內心的絕對自由，是不同於現代政治學上所談的人與人外在關係的「自由」。七十年代以後，我從書齋哲學的閣樓裏走到現實的世界，才體認到在制度上求基本權利保障的迫切性。然而，長期以來歷代這些哲學家的抗議精神依然成爲我在現實戰鬥中極大的支持力。而中國知識份子的抗議傳統，對我的影響尤大。

先秦諸子都有很強的時代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各家之中，孔子算是個溫和的改良主義者，但仍不見容於當道，到處飄泊。現在我們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像陶百川先生這樣，說了幾句希望「台灣要好」的話，就受到了圍剿。先秦各家對已趨崩潰的舊制度，有著不同的態度。除了儒家之外，其他各家都較激進。墨家對於僅憑血緣關係的親親政治有強烈的批判，道家是現行制度的否定派，法家應該屬於當時的革命派。法家政策的推展，對既得勢力的貴族集團打擊得最厲害。當然法家有很大的缺點，若從今天的觀點，法的制定就缺乏人民性。但法家也受到很深的誤解，如果我們細細地讀一讀韓非的「孤憤篇」，對法家就會有較深一層的認識。現在港、台講中國思想史的人，多站在儒家的立場看問題。講先秦思想的人，比先秦諸子要保守得多，所以先秦諸子的抗議精神自然遭學界掩沒。台灣講儒家的人，「逢君之惡」者不少，完全失去孟子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氣魄，更沒有他那種「望之不似人君」的輕君氣概。

古道照顏色

先秦以後，抗議傳統延續未斷。西漢時代，司馬遷等之外，還有淮南劉安，他匯集了一個很

大的學術集團，與中央集權思想相抗衡。一向被誤為雜家的「淮南子」，其實是一本很難得的具有古代民主思想的著作。

東漢時代的王充，是兩漢思想史上最傑出的人物。當時統治者（章帝）宣佈圖讖於天下，加速經義的神學化。王充的言論處處針對當時思想界的迷霧進行批駁。他在觀念釐清的工作上，有輝煌的成就。王充之後，還有王符、仲長統等思想家，王符的「潛夫論」裏，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實況有敏銳的透視。漢末太學生運動，是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抗議運動。當時知識份子集團多達三萬餘人，「上譏執政，下譏卿士」，和外戚、宦官、官僚三大集團鼎足而立，對當時肆虐最深的宦官集團攻擊最猛。兩次黨錮之禍，犧牲雖慘重，但對傳統知識份子的抗議精神仍有深遠的影響。

魏晉時代，抗議份子輩出，嵇康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當時司馬政權的清除異己，手段十分殘酷，連當權派裏的何晏都有「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的恐懼，可見「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的嵇康處境之危疑。嵇康「至性過人」，不守禮法，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所以為「世教所不容」。司馬氏想拉攏他，但他毫不遷就，並且朗朗地拒絕山濤的荐引（「與山濤絕交書」是一篇反映嵇康自己的思想性格的重要文章）。司馬氏幕府中的智囊人物鍾會曾遠道去拜訪嵇康，嵇康在大樹下打鐵，旁若無人，鍾會要離開時，嵇康問說：「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回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不久鍾會便伺機向最高當局打了個小報告，說：「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有敗于俗。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有關當局遂製造了一個政治案件——呂安政治案件，將嵇康牽入獄中。嵇康被捕後，太學生數千人請以為師。但他終遭刑戮，臨刑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從容就義。

南北朝時代的范縝，史書（「梁書」）評他：「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當朝曾發生一個政治案件——王亮政治迫害事件，大家噤若寒蟬，只有范縝挺身而出替受害者說話。而他最震動當朝的言論，要算是發表「神滅論」。正當

歷史上最著名的迷信皇帝（梁武帝）宣佈佛教為國教以後，范縝便發表神滅論，使「朝野喧嘩」。最高當局遂發動了六、七十人前來圍剿，一面又派青年才俊去對范縝進行遊說，答應給他高官做，但他斷然拒絕，表示決不「賣論取官」。

凡帝王者皆賊也

我們在大學裏上宋明思想課程時，只講程、朱、陸、王的理學，其他家便無從得知。後來才知道那時期有這麼多精闢的思想家，像陳亮、葉適、鄧牧、王廷相、呂坤以及泰州學派的王艮、何心隱、李卓吾，整個文學院沒有一個系講到他們的思想。這使我想到了：現實政治的退縮心態便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學術空氣的萎退保守。

清代以前知識份子的抗君傳統，自上莊周而下至黃梨洲為眾所周知以外，像晉代鮑敬言的「無君論」（見「抱朴子」結總篇）、宋代鄧牧評「君道」（見其「伯牙琴」君道篇）、清初唐甄的「抑尊」思想（見其「潛書」抑尊篇），對君主專制都做了強烈的抨擊。即令到今天，若把他們的意見用白話寫出來，不免要惹禍。大家都知道譚嗣同說過這樣激烈的話：「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其實唐甄比他更早就說過：「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的一些話用現代語言說出，也定會受到「有辱元首」入罪。

晚清以後，知識份子以反帝救亡為主流的抗議運動，更是風起雲湧。由於時間已到，不再多說。總之，中國知識份子是有它長遠的抗議傳統。康有為所說的：「感國難，哀民生。」「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這種心情，為歷代知識份子所共有。

不幸的，當今現實政權的「往下紮根」，其灌注性隨科技發展而進入到每個人的精神空間裏來。不過，和美國比較起來，中國知識份子在社會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竟要大得多。雖然歷代知識份子諍言而能免於禍者少，但前仆後繼，春風吹又生。我相信隨著教育的發展，數量的激增，知識隊伍將可發生較大的影響。知識份子的建言與其他階層的壓力形成，促使在制度上求國家體制的健全運作，是較根本的任務。

從日警的黑牢裡死裡逃生

□洪瑞麟

日本由瘋狂地侵華戰爭到掀起太平洋戰爭，十幾年間，亦把它的殖民地——台灣，拖至水深火熱的悲慘之境。

戰爭到末一年，日本軍閥已如瘋狗般，陷於神志不清的境地。日軍在各地戰場節節敗退，日本在台軍警已預知到末日的來臨，如著魔一般，對台島之民更肆張狂，惶恐民心動搖。當時配給食物很差，人民在飢餓難忍之下，有時會偷偷做黑市買賣，比如留一條自己捕的魚吃，或交換極為賤缺的日用品等等……，一旦被日警抓到，往往被打個半死，人民的生活，真是悲慘極了。

這一年秋，（民國三十三年），我在瑞芳煤礦做工，有人密告煤礦場有人私造鐵器去海邊叉魚，當局即以二大罪名進行逮捕礦場職工：一、私造武器，二、違反食物配給。某夜，礦場老板倪將壞的二子，職員職工，包括了我，共四十人被逮捕了。

我們被夜以繼日地審問、灌水，用棒球棍拷打，吊刑，種種難忍的刑罰。而我們並不知道被密告，也不知到底犯了什麼罪。（後來才明白被稱陷的內容）。有位礦場裏的師傅（我也曾畫過也，一個十分木訥溫和的好人），受不了酷刑，曾用鐵釘猛刺胸口，想自殺以解脫痛苦。有的人則認了莫須有的罪，被收押起來，過暗無天日的生活。

我在牢裏三個月，戰爭末期和物資嚴重缺乏，牢裏真是淒慘，每日僅得一撮飯、一點鹽末。在極度飢餓下，我們把焦黑的飯視如珍饈，一粒米掉到地上，都和泥土混不清了，我們仍小心翼翼地挑檢出來，吃下去。過年了，牢裏每個人得到一顆橘子，這顆橘子味道之甘美，至今記憶猶新。那整個秋冬季，瑞芳冷雨下個不停，難友們多救不堪刑苦而病倒，日本牢頭也不聞不問，

死了人，就拖出去，丟到海裡。我們衣不蔽體，全身長滿了蝨子，家屬偶而能湊點吃的穿的送來，總是被餓狼般的牢頭們私吞掉，亂世無法紀啊！

我撐過三個月的苦刑，始終咬住牙關不認罪，後來被提到汐止去，不久也就放了。民國三十四年秋，台灣光復，我直奔板橋去當時最先成立的我方當局，叫「前進指揮所」，把難友尚在監獄的情形詳細告訴所裏長官，得到一紙指示令，急忙拿到瑞芳日偽警尚未撤走的牢獄，把難友們全部接出來，大家見了面，歡天喜地，彷彿隔世一般。

我們那一批四十個難友中，總計在日偽警折磨下，死了十三人，生還二十七人，在一年的時間裡。

其他在戰爭中黃死者，被日軍拉伏，一去不回者，則更無計其數了。

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帶給中國人民多麼深鉅的痛苦，我們絕不能坐視它的借屍還魂！

以歷史的見證透視當代政治
以犀利的批判剖析現代社會

大地生活

1~10期合訂本

代表著戰後在台灣新生的一代，
對民主、自由和法治的一項努力。

訂價：國內每卷台幣200元
國外航郵歐美美金14元
亞洲美金10元 港澳港幣50元
（一次合購10本以上七折優待，
5本以上八折優待）

郵撥帳號：555202 黃溪蘭



清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
的中日甲午戰爭

是近代中國的一大轉捩點。這一仗，中國敗給了向所鄙視的「蕞爾島國」日本，舉國震動，中外俱驚。次年，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了均屬「腹心根本，膏腴要害」的遼東半島與台灣。從此，中國陷入瓜分的危機，清廷也因無能應付日益深重的國難而遭到傾覆的命運。

馬關條約議定之時，全國人心沸騰，京官、督撫紛紛上奏，多主張拒和、再戰，康有為、梁啟超更鼓動廣東、湖南舉人，上書請拒和議，再聯合各省舉人「連日遞章都察院，衣冠塞途，圍其長官之車，台灣舉人，垂涕而請命，莫不哀之」。其後，俄國因不甘讓日本獨佔東北之利，乃

聯合德、法兩國共同干涉還遼，遼東半島遂得以三千萬兩贖回。三國干涉之舉令中國人心大為振奮，認為有外援可恃，台灣也必可照例贖回。於是王公大臣數數奔走於俄、德、法三國的駐京公使館，告以台灣人民，絕不願淪入日人之手，請三國伸援一併收回台灣。八十多位翰林院編修則聯名上奏請暫緩批准和約，並說若割讓台灣「非特無以對忠義之民，海內聞之，誰不解體？」康有為草萬言書，聯合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多人共同簽名，請拒和、遷都、變法，此即震動一時的公車上書。輿論如此激昂，光緒帝遂再下諭旨給李鴻章說：「連日紛紛章奏，謂台不可棄，幾於萬口交騰，……台民誓不從倭，百方呼籲，……再行熱察情形，能否於三國阻緩之時，與伊藤通此一信，或豫為交接地步，暫緩批准和約。」可是，俄、德、法三國因台灣與其無密切利害關係，不願再行介入，日本在被迫退還遼東半島後，也絕不願再作讓步。割台之事遂成定案。

負責談判馬關條約的李鴻章，當時成了眾矢之的，朝中言官交章劾奏，有的指責他通敵賣國，有的則請皇帝殺他以謝天下，光緒對他尤深致不滿，光緒的師傅翁同龢在日記中說：「（帝）

以李鴻章覆電，言台灣事不能與伊藤說，甚怒。……論及台民死守，上曰：『台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爲天下主？』」。李鴻章回國督見時，光緒又責備說：「兩萬萬兩如何籌措，台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其實，平情而論，李鴻章業已竭盡所能，力挽台灣了。他預知俄國有意干涉還遼，故捨遼東而力爭台灣，無奈日方對台灣志在必得，寸步不讓，伊藤博文更以威脅恫嚇的口吻對李鴻章說：「若不幸此次談判破裂，則我一命之下，七十艘之運送船搭載大軍，船艦相接，直往戰地，如此則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再深切言之，談判破裂，中國全權大

甲午戰爭與台灣的割讓

□杜宇

臣一去此地，能否安然再出入北京城門，亦屬不能保證。」對這樣跋扈逼人的態度，李鴻章雖憤怒非常，也只有傷心垂淚而已。

甲午戰敗，割地賠款對中國人心刺激極大，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或直接或間接都由此而起。梁啟超對這有極深切著明的描述：「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台灣的割讓不過是中國悲運的開始，列強此後即圖謀瓜分中國，各劃勢力範圍，而日本則在馬關議和時，其民間政黨的要人就已揚言：「戰後若中國不能保存其社稷，陷於自暴自棄，拋棄其主權時，則我國不可不有瓜分四百餘州之覺悟，此時須以山東、江蘇、福建、廣東四省爲我領土。」中國的有識之士也早由台灣的割讓瞿然驚覺亡國之禍，隨時可至。商談割台之時，御史王鵬運上奏章力勸不可，更說如割台灣「不出十年，恐欲爲小朝廷而不可得。」這話說於一八九五年，而清廷因暮氣已深，不思振作，無法挽中國於危亡，終于一九一一年底被趕下歷史的舞台，亡國之期距王鵬運的預測僅晚七年而已，人心大勢之所趨，昭然可見。



評「西方美學史」 (上、下二卷)

作者：朱光潛

出版：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定價：二五〇元（平裝）

三〇〇元（精裝）

□張恆豪

國內的美學教育一直很不蓬勃，以平實流暢的中文撰述的美學史，尤其難得一見（真知灼見的更是鳳毛麟角），而當代美學大師朱光潛的「西方美學史」正可彌補這項缺憾。這部劃時代的鉅著，出版於一九六四年，厚達七百多頁，是朱氏繼「文藝心理學」、「詩論」……之後，晚年從中國詩藝的闡發回歸到美學研究的心血結晶。

基本上，這是一部着重於介紹每個時代的總貌和派別源流關係的美學「通史」，其旨在做重點式的提綱挈領，而不在專題式的探本溯源。這點作者頗有自知，「對於某些專題（例如審美範疇、藝術種類、創作技巧之類問題）的歷史發展綫索就顯顧得不夠。這方面的研究就有待於美學專題史。」但此書仍有它特別的意義：

一作者試圖指出每個時代的美學思想，皆有其相關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進而將哲學潮流和文藝動向聯繫起來，這種不視美學為孤立的象牙塔產物，而結合於人生、文化、社會背景的態度與做法，值得有志人士深思。

二本書第三部分，對於近代美學中兩大流派的演變：一從康德的唯心主義到克羅齊的「藝術即直覺」；一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藝術再現生活」「為現實主義文藝奠定堅實美學基礎」，均有較詳盡的論證，尤其對於俄國別林斯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評述，更為目前台灣出版物所罕見。

三第二十章關於三個關鍵性問題的歷史小結：「美的本質問題」「藝術典型」「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均可代表朱光潛晚年對美學的看法及改變：藝術是種創造、是種反映客觀現實又表現主觀理想的產物，就精神實質而言，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並非不可調和，二者之結合是藝術的唯一的康莊大道。這種美學觀顯然改變了早年對克羅齊的服膺，較接近於高爾基的觀點。

四附錄的簡要書目，雖有遺漏（任舉二例，像托爾斯泰的「藝術論」和柏格森的「創化論」就遺漏了，托氏「藝術論」反對上層階級娛樂，鼓舞民粹藝術作品，直接影響了後來的蘇聯批評家；柏氏「創化論」中的時空觀念，深深影響到法國心理小說大師普洛斯特的「往事追憶錄」，導致「新小說」的崛起），但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份精選的書單算是提供了按圖索驥的參考，亦頗有價值。

總之，這是一部經過觀察、內省而具有進步思潮的論著。真正的藝術必然要反映現實、關懷人生；也必然要表現理想、發揚人性，此二者結合的可能性是經得起長期實踐的，也唯有從現實生活中不斷去實踐，藝術才不淪為空洞的概念，美學才能提昇為歷史的經驗，變成人類可貴的智慧結晶。這種論見，對於長期以來某些浸淫於現代夢囈的、病態的、逃避的、自我陶醉的國內文藝工作者，應有醍醐灌頂的作用。

誰說癌是絕症？

十四年前，年輕的李豐醫師得了癌症，她不但勇敢、堅強地活了過來，而且活得有聲有色。遇到癌症病人，她往往以自己的例子來鼓勵他們。而且，還以自己的經驗為經，以專業醫學知識為緯，陸續寫下數十篇防癌、剋癌的文章，結集成書，共分「癌是什麼？」、「癌不是突然發生的」、「癌也是心病」三大部份，深刻感人，值得所有關心癌症的人一讀。

著者／李豐醫師

定價／八十元

出版／健康世界雜誌社

郵撥／106474號



藝文

「送報伙」五十年訪 楊 達

□ 鍾 喬

問：楊先生，「送報伙」發表已經五十年了，請問您當時是在什麼樣的心情和動機下開始寫這篇作品？

答：「噍吧年事件」當年發生在我的故鄉，日本人對此一事件的記載全部是歪曲歷史，更視抗日份子為匪徒，殺死了許多人；而後不久，「六三法案」的製訂，更明文交代反抗者皆為匪徒，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我便決意到日本求學，想以文學創作來糾正被歪曲的歷史，也糾正這不公平的法律。二十六歲那年我寫了「送報伙」，發表至今也已經有五十年了。但是，早在這之前四、五年，我在日本時即開始寫作一些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名為「自由勞動者的生活」是描寫我在日本時打工的經過，全文約六千字，刊登於東京記者聯盟的機關雜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拿到稿費。此後，我始終找不到這篇文章

，直到前些日子我由美國返國路經日本時，才聽說已經找到了，擺在「大宅壯一圖書館」中，（按：大宅壯一為早年日本東京記者聯盟的成員之一，他死後人們為了紀念他而成立此一圖書館），朋友幫我找了出來影印並寄了一份給我。

這篇文章是我在日本參加勞工運動的心得結晶。當時我還在求學，為了維持生活必需找一份臨時工作，但是，由於經濟蕭條，失業的人很多，臨時工很難找，造成極為蓬勃前進的勞工運動，我自然也參加了，而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在這同時，我聽說台灣的文化運動、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也正如如火如荼地展開，便決意回到台灣來了。

返台之後不久，九一八事件爆發了。日本統治者開始控制文化運動的進行，眾多抗日團體也就在這時被破壞殆盡。情況既是如

此糟糕，直接抗日的活動變得不可能，我的一些朋友便轉入地下，甚而跑到海外去從事暗中活動。不過，此時我意識到，雖然我個人已經不可能直接參與運動，但是我是學文學的，我可以藉文字來傳達抗議情懷，在這種認識下，我便又重新提起筆來而寫就了「送報伙」。

問：可否請您談談「送報伙」這一篇作品的真實歷史背景？

答：「送報伙」的背景可由社會與個人兩方面來談。社會背景方面，當時日本政府當局實行兩個高壓政策，台灣人民普遍受到這二個政策的壓制，飽受摧殘與逼害。其一是蔗糖政策，眾所週知，日本對台灣的控制是與糖業相始終的。透過製糖會社的嚴苛管制，日本官方強制規定台灣農民必需在耕地上種一定數量的甘蔗，甘蔗收成後，價錢需聽命「會社」的指揮，不得私訂價格。並且，還制訂規章要求蔗農，在每期收成時需賣一定數量的甘蔗給會社，不夠的由農民自行設法。在如此重重政策限制之下，斤兩計較，弄得民不聊生，破產事件層出不窮。

蔗糖政策之外，另一個榨取農民血汗的則為「拂下政策」，日本人在統治台灣之後，為了徵繳土地稅金，進行土地普查，要求農民需有憑證才能去登記，經過登記才正式擁有土地，偏偏當時許多農民拿不出憑證來，有些雖然拿得出憑證卻不敢去登記，怕一旦登記了便得繳高額的土地稅。而日本當局便趁此一機會，將沒有登記的土地全數收歸公有，視作官有地看待，而後勸日本人民大量移民台灣，意圖將台灣歸化日本，但是卻遭到大多數日本人的抗拒。在這種情況下，只好制定「拂下政策」，規定只要總督府的工作人員願意在退休之後長居台灣，便能夠擁有官有地。此一政策制定下來，簡直是豪取強奪，台灣自耕農從此土地被瓜分一空，許多人紛紛破產，無地可耕了。

在個人背景方面，由於早年我在日本時曾當過送報伙，並在那段時日吃了許多苦頭，受了許多騙，從而深深瞭解到勞工與資本家對抗的事實，並漸漸熟悉了勞工的辛酸與

血淚。在大戰前夕，不論是日本還是台灣，農民和一般勞動者在不景氣下受壓迫的情形便是「送報伙」的真實背景。

問：「送報伙」出版了五十年，五十年前您作品中強調的問題，如今是否繼續存在呢？

答：過去日本殖民者以武力、政治來欺壓、迫害並進行控制；現在則以文化、經濟的手段間接侵犯並剝削弱小國家的人民。基本上說來，這與殖民時期無多大差異，都是一種軍國主義的欺凌作風。

問：光復後，您翻譯了一些三十年代中國作家的作品，請問當時為何要這樣做？

答：光復後，我譯了一些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以中日對照的版本與讀者見面。我這樣做的原因有二；首先，那時候我深深感受到既然光復了，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語言，而我也應該好好將自己國家的語言學好，因而開始以翻譯的方式來介紹祖國的文學作品。再則，當時大多數人只懂得日文，對自己的語言一竅不通，我很想讓更多的朋友與讀者多瞭解祖國的文化，所以才全力以赴翻譯了一些三十年代作家的作品。

問：今年您應「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邀請到美國，據說您有幾次機會參加了抗議日本竄改教科書的活動，請您談談這些活動的情況好嗎？

答：有機會到愛荷華大學，說來實在是意料之外的事。出發之前，五月七號輔仁大學的草原文學社曾經邀我前去講演，屆時，我曾經提及噍吧年事件發生到光復後這段期間的個人經歷，那之後，由於日本發生了竄改教科書事件，我發表了一篇名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的文章，文中主要指出日本當局有意欺瞞年輕一代侵華的罪行；讓新生的青年再度步上侵略的道途。後來，我到愛荷華去便是攜帶這篇文章，在許多場合中，公開聲討日本帝國主義復活的罪行。八月二十八日，柏克萊加州大學也曾經就此一事件開了一次座談會，他們邀我去參加演講，會中胡秋原先生與陶百川先生也分別發表了書面意見，北京大學一位歷史系教授也就此事詳述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真相，而我便趁此機會發

表了日本軍閥當年侵略台灣的種種惡劣行徑。一位柏克萊大學的教授與來自台灣的陳鼓應先生也分別以文字和記錄照片陳述了他們的見解。

像這樣的聲討大會，非但在芝加哥、紐約紛紛展開，就是日本當地也有三十八個團體進行相類似的抗議。三十八個團體中，當然，缺少不了來自東南亞、韓國、「中國」與台灣的人民。只是，較為可貴的，卻是其中有很多是日本當地自組的團體，他們同樣秉著極大的熱誠抗議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問：您這一次參加「愛荷華寫作計劃」，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見聞，和感想？

答：「愛荷華寫作計劃」已有十多年歷史，每年舉辦一次，邀請的對象以第三世界作家為主，包括中東、非洲、東南亞、南美洲與海峽兩岸的中國作家。

今年則有二十六個國家的作家受邀赴會，台灣方面由我與管管為代表，大陸方面，則有劉冰雁、陳白塵二位受邀前去。

劉冰雁的作品「人妖之間」曾經在我們這裡的報章公開被介紹過，我對他的印象極深，非常讚譽他的文學才華；陳白塵則改編過魯迅的「阿Q正傳」為舞台劇，曾經在大陸公演過，更一度拍攝成電影，在瑞士國際影展中曾獲首獎，備受讚譽。

在一次座談會上，陳白塵提及他個人曾於文革時遭批鬥，吃了幾十年苦頭，可是，他從來沒有因而妥協，仍然一貫地坦誠暴露中共政權的黑暗，這一點讓我非常感動與欽佩。給我印象更深刻的，則是在會中，劉冰雁提到，在我們這個時代中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他認為在惡劣的環境中，人會變成妖，但是，同樣的，若是在正常的環境中，妖也可以變成人。

問：綠島回來之後，您的生活一度陷入極其貧困的苦境中，也很少提筆寫作了，請您談談當時的狀況好嗎？

答：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了二二八事變，此後，省籍問題愈加尖銳化起來，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衝突，對抗也愈演愈烈。當時，由於一些文化界人士，諸如教授、新聞記者、編輯

受此事件波及的人非常的多，他們時常在私下討論省籍衝突的問題，我有意出面溝通這種誤解，便草擬了一篇「和平宣言」，我的想法是結合文化界中比較沒有私心、權力慾的人士來影響一般平民大眾，共同攜手締造一個和平的環境，更藉此將激烈的局面和緩下來，沒想到卻因此遭到有關當局的誤會，稱我是為共產黨宣傳，因而判徒刑十二年，到綠島服刑。回來之後，很多朋友都因為我曾經是叛亂犯而拒我於千里之外，不敢與我接觸，甚至連相遇時都害怕和我打交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雖然人未亡，整個家庭已經破碎了。為了重拾家園，我向朋友借來一些錢，回到大度山開闢了東海花園，這段期間，在園圃裡鋤草工作，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實在，抽不出空來提筆寫作。更何況，當時的朋友與出版界的人都懼怕與我見面，久而久之，我也漸漸沒有想到寫作這回事了。

問：可否談談您未來的寫作計劃呢？

答：剛剛提到因為種花的事忙碌，出版界的朋友又視我為敵人，不敢發表我的作品，因而我的創作減少了！

不過近六、七年來承蒙出版界朋友的幫忙，使我再有機會出版自己的作品；「鵝媽媽出嫁」問世之後，集子裡一篇名為「壓不扁的玫瑰花」的小說被選入國中課本裡，從此漸漸又有人來找我出版作品。而最近，我花園裡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我想我是可以再出發，再拿起筆來寫作了。

另外，我一生歷盡坎坷，可以說是變化多端，當然很想找機會將這些經歷以文學方式記錄下來，做為一個時代的小小見證。再則，除了記錄自己的過去經驗之外，現實的觀照與省察仍然是我非常重視的，我也想用我自己的筆來傳達對社會、環境的關懷。

問：您對年青一代的作家有什麼期待呢？

答：徐復觀先生曾經說過我們要「作真人，說實話」，對於他這句話，我頗有同感。我總以為，無論任何時代的文學或文化都應該向社會紮根，才是實在的，也唯有透過這樣的覺醒，才能以文學來改造我們的時代和環境，這是我對年青一代文藝作家的期許。

◆ 光復前台灣文學研究系列 ◆

麒麟兒的夢

——朱點人及其小說

□張恆豪

一、台灣新文學的麒麟兒

在受到中國五四運動的鼓舞和一次戰後民主思想、民族主義的啓迪而萌發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正如同近代殖民地的歷史格局一般，從開始便注定與台灣新文化的啓蒙運動、民族解放的政治運動齊頭並進、並肩作戰，這種文學運動和政治運動的緊密結合，在世界弱小民族文學的演進中恐怕是不可避免，也是無足爲異的。但文學生命是自主的、源遠長流的，政治風潮卻是短暫的、瞬息多變的，從長期的眼光來看，文學不甘附庸於政治結構的支配自是很顯然的。日據時期真正以文學立場出發，以文學爲本位，有意識的新文學結盟、創辦雜誌，則應是一九三〇年進入「開花期」以後的事了。

由於新文學先覺們的奮鬥、催醒、迎戰、打倒保守的舊勢力，散播新生的種子，終使得新文學陣營從早先的「台灣新民報」，逐漸轉移到「伍人報」、「明日」、……，以至於文學性雜誌「南音」，而進入了「開花期」。在歷經黃石輝、郭秋生等人所掀起的「鄉土文學論戰」的洗禮，到「先發部隊」、「第一線」的觸探出路，「台灣文藝」的紹承遺緒，更臻於百卉奔放、空前蓬勃的景況。

朱點人是新文學「開花期」的健將。從一九三〇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開始，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迫停止創作爲止，總共發表了十一、二篇小說。日據下的中文小說，從賴和、張我軍開始翻土、播種，可以說是到朱點人、張慶堂的出現才茁壯的、成熟的。這位被張深切稱爲「台灣新文學創作界的麒麟兒」的作家，雖然留下來的作品不多，但幾乎篇篇精鍊深刻。相對於那些不知不覺的、在錯誤歷史裏渾噩苟活的台灣人，朱點人

對殖民地社會的考察、對島民性格的反省、對個人和民族出路尋覓的努力，並將此民族意識融進了他那冷癡、理性、厚實的小說藝術，以呈現出殖民地的社會面貌和心靈特徵，這種業績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胸懷是廣闊的，毫無種族偏見，而是去批判日本資本帝國的殖民主義和同化政策，他的人道之愛超越了民族的侷限，期盼建立一個大公無私、平等博愛的新社會。

二、成長在急驟資本主義化的社會

明治維新後，早熟的日本資本主義利用甲午戰役，獲得了他覬覦已久的勝利品——台灣，以做爲他「近代的殖民地」。而「近代殖民地」的成立，無可避免的，必然要以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存在爲前提，日本當局爲了要使台灣由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轉變爲資本主義化，其統治初期的首要工作，便是使分裂歸於統一，由人治變爲法治，因此，自一八九七年後，台灣總督府陸續公佈了「貨幣法」，採用金本位幣制，頒佈「台灣地籍規則」、「台灣度量衡條例」……，將台灣推入急速的資本主義化的浪潮中。朱點人生於一九〇三年，這一年正是台灣總督府下令禁止使用舊有的度量衡，換言之，朱點人和那個時代的運動者、作家一樣，是成長在一個急驟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形態中，雖然台灣是處在蛻變的渦流，然而不免仍受到頑固封建勢力的影響，因此確切的說，應該是成長在一個半封建、半資本的殖民地社會中。

原名朱石頭的朱點人，生於台北的艋舺。從小家境貧寒，未成年時雙親便都過世，所以養成了獨立刻苦的個性。在公學校畢業後，沉迷於文學，和王詩琅、廖漢臣（鏡文）、吳逸生（松谷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記

美國記者亞克森斑所著的

日本上空之煞星

——復活中的軍國主義、

將以翔實資料與親身訪問告訴你日本軍國主義如何死灰復燃，如何在日本官僚與財閥的陰謀統籌下有計劃地復活起來，龐大起來。

出版／學術出版社
定價／六十五元
郵撥帳號／4876號

迎接「中國之春」的

王曉波著：「春天與中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王炳章在紐約出版了一本雜誌叫「中國之春」。在這之前，一九八一年四月，凝視中國未來的王曉波為迎接中國的春天，在台北出版了一本書叫「春天與中國」。王曉波以充滿樂觀奮鬥的堅定口吻宣告：「黎明前的黑暗終究要在陽光下逝去的，冬夜的酷寒也終必為春風驅逐。分裂的中國要統一，被壓迫的人民要民主。中華民族要從重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擁抱即將來臨的春天。」

這本書論述了近代以降中華民族的苦難，也探出了一北京之春」以來中國春訊的脈動。「中國之春」的出現，更證明了王曉波敏銳的觀察和預見。

出版／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郵撥／一〇五六二六號
定價／二〇元

）、楊朝枝（柳塘）等人同為艋舺地帶的文藝少年。稍長，進入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當雇員，在南方熱帶醫學研究所擔任助手，專門研究細菌學，在他的手中曾造就了不少日後的博士，這種醫學專業訓練，非常有助於他的觀察、剖析和思考。

一九三〇年，朱點人開始在王萬得所辦的「伍人報」發表第一篇作品「失戀者日記」，這是一篇以日記體裁來傾訴戀愛苦悶、抨擊階級婚姻的小說，相同的題材也出現在後來的小說「紀念樹」、「無花果」、「蟬」上，此或與作者的初戀有關。

同年八月，黃石輝、郭秋生二位相繼在「伍人報」、「台灣新聞」主張「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提出建設台灣話文的基礎工作，而引起了廖漢臣、林克夫的反對，朱點人也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廿九日的「昭和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檢一檢鄉土文學」，批評黃、郭的論點，這便爆發了轟動一時、反響激烈的「鄉土文學論戰」。據廖漢臣在「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回憶：

當時雙方的爭執的最大的原因，是因提倡台灣話文的，站在現實的立場上認為台灣是一特殊區域，如黃石輝所說：「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在政治的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

來支配，在民族的關係上，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來支配，所以主張適應台灣的實際生活，建設台灣獨立的文化」。而主張普及中國白話文的，是站在理想的立場上，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環，台灣和中國是永久不能脫離關係的，所以反對另立台灣特有的地方性的文化。

當時支持台灣話文的，有黃石輝、鄭坤五、郭秋生、莊遂性、黃純青、李獻璋、賴和、擎雲、黃春成、…等；支持中國白話文的，有廖漢臣、林克夫、朱點人、賴明弘、林越峯、…等人。以今人的眼光看來，這也是為什麼在文學實踐上，賴和、郭秋生的小說在語言上多夾帶些「台灣土語」，而朱點人、廖漢臣的小說較接近於中國白話的原因。這種源於帝國主義的割裂而造成的創作語言的爭執，歷經二十七年的困擾，隨著歷史進展和客觀環境的變化，直到光復後第一代鄉土作家鍾理和的肯定，才獲得明確的釐清。鍾理和說：「『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固是切中肯綮之論，但台灣的客觀環境卻限制了方言在這方面的發展，只容許它在『文學中的方言』範圍中求取地位。」光復以來，方言文學的論調，幾成絕跡，而黃春明、楊青矗諸人為加強其小說對白的傳真感和親切感，乃有選擇性地運用「文學中的方言」，這正是應合歷史演進的必然法

●光復前台灣文學研究系列●

則。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日，朱點人在「台灣新報」發表第一篇重要小說「島都」。在這篇中作者以直述、倒述交錯互見的方式，追溯一個勞動者步向於社會運動的家庭背景和心理因素，貫穿作品底流的是朱點人的基本精神——前進、不妥協、義無返顧、屢仆屢繼的精神。

一九三三年秋季，朱點人在廖漢臣的慫恿下加入「台灣文藝協會」，和蔡德音擔任小說戲劇的審稿。翌年七月十五日，其機關雜誌「先發部隊」創刊，朱點人除在該刊發表小說「紀念樹」及詩「南國的女兒」外，並在「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專輯中披露了一篇短評「偏於外面的描寫應注意的要點」，他針對當時的作品提出批評：

台灣的現代小說以新報為中心，其他在各刊物發表的可算不少了。但就成績言，不過量勝於質，沒有什麼收穫；在思想方面，言愛情不出失戀的苦悶，言社會不過弱者的悲哀，總之不能創作些較潑刺的新生活樣式的作品。在技巧方面缺少描寫手段，尤其是缺少內面的描寫。

一篇作品的成功與否，在主題、題材、描寫的三者之中，要看描寫的手段如何了。沒論思想怎樣豐富，題材如何清新，若沒有描寫的手段，結局無異一篇記事的文章，或是一段報告，所以記事的文章，是類於地圖式的文字，要是繪畫的文字，才是文學的作品。

這些有感而發的論見，於今觀來雖不算什麼，但在當時不啻是醍醐灌頂，發人深省。由此可窺出朱點人堅守文學本位、創新求變的用心，和對心理寫實、藝術技巧的講求。事實上，真正好的文學作品，除了要注重表現手法外，還必須兼顧到主體的人性和客體的社會性，才能禁得起歷史的考驗，成為永恆的經典作品。在文學實踐上，他前後又發表「無花果」、「蟬」、「安息之日」、「秋信」、「長壽會」、「脫穎」等小說，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台灣總督府為配合決戰體制強行廢止中文，朱點人才被迫停止中文創作，同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發動蘆溝橋事變，中日八年的戰爭乃全面開始。

據王詩琅追述，朱點人尚有一篇重要小說「血櫻」，是以霧社抗日事件為題材，朱氏曾親自拿給他過目，王詩琅說：「這是以花岡一郎、二郎為主人翁，描寫其英勇的事跡及事件，全篇充滿著熱情，這是這位日據時期以細緻愛情作品著稱的中文作家最有特色的作品之一。」，可惜，不知何故，這篇小說在光復前就被作者焚毀了。

一九四一年，朱點人由於王詩琅的推薦，遠赴廣州，擔任「廣東迅報」編輯，和王詩琅在同一單位工作。這是他首次登臨祖國大陸，親炙渴慕已久的故國山川，目睹戰亂中的風土人情。但未及半年，因為繁瑣的編務不合志趣，乃束裝返台。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獄未久的賴和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當時台灣人唯一主力的文學雜誌，由張文環所創辦的「台灣文學」於三卷二號策劃了一個包括楊達、楊守愚等人執筆的「賴和先生悼念特輯」，朱點人在特輯上也以日文寫了一篇「回憶懶雲先生」，在文中他推崇賴和對台灣新文學的啓蒙、教導和貢獻，居功厥偉，「懶雲先生不但足以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也是楊達君把中文作品介紹到中央文壇的第一人。貫穿於他的文學作品中的精神，是一種為地上的正義而奮鬥的精神。」在中日戰火激烈之時，在皇民化氣燄盛囂之際，朱點人不畏強暴，敢如此正面肯定賴和的民族精神和文學地位，足見其道德勇氣、民族意識之不可撼搖。最後他說「我想懶雲先生的作品將永遠輝耀於台灣文學史上。若情況允許，我請建議刊行懶雲先生全集，並設立懶雲文學獎。」沉霾的歷史，蒙塵受凍，賴和先生全集的重見天日，也直到光復三十二年之後才獲得實現。

日本帝國主義潰敗，台灣歸返祖國後，朱點人在一九四七年的事變中遭到逮捕入獄，一九四九年逝世於台北。他從近代殖民地的噩夢中醒來，正跨過歷史轉變的關頭，迎接曙光的來臨，卻不幸在近代中國的悲劇中，結束其悲劇的一生。

三、社會批判與文學創作

朱點人的創作活動，大概在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這個時期。這時正是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由「純民族的」走向於「多元化的、

社會性的、思想性的」，甚至思想分裂鼎立的階段，事實上，由於受到「二林事件」及「鐵工所爭議事件」的刺激，自一九二七年以後，農工運動業已漸成爲掌握當時社會運動的主流了。

朱點人「島都」中的史明就是塗工所的工人，也是一個勞動者的兒子，在「母親的貧病至死、小弟的失蹤、父親的慘死」和世界思潮的洗禮下，最後他覺醒了，而走向於社會運動的第一線。他爲何覺醒呢？因爲「方始覺到工人們所以窮苦的原因，也纔了解他父親所以愈勤苦愈困窮」。這個社會的現實性是什麼？作者並沒有直接地一語道破，但我們可聯想到史明故鄉的土地是怎麼被掠奪的？在總督府建設「文化村」、「新村」的美名下，將所有的土地、山林都拂下給辭官退職的人，並分割給自日本移到台灣來的「脫褲班」。這種日本人官僚及資本勢力的滲入，和這個爲宗主國容納過剩人口的「脫褲班」，很顯然的，都是「近代殖民地」經濟形態的必然產物。

另一篇小說「秋信」中的前清陳秀才，當參觀了日本「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見到日本人躊躇滿志地炫耀「產業台灣的躍進」是日本人的功勞時，他按捺不住，乃駁詞駁道：「國運的興衰雖說有定數，清朝雖然滅亡了，但中國的民族未必……說什麼博覽會，這不過是誘示你們的……罷了……什麼『產業台灣的躍進……』，這也不過是你們東洋鬼才能躍進，若是台灣人的子弟，恐怕連寸進都不能呢，還說什麼教育來！」日本統治者動輒大言不慚地誇耀其資本主義的政策是如何成功，有多麼輝煌的成就，其實什麼「文化村」、「產業台灣的躍進」，無非是以殖民地人民的血淚爲代價的，資本主義只是其表面，殖民主義才是它的本質，我們實在不能無視於此具有獨佔性、侵掠性、以及被殖民者待遇上不合理、人權上不平等、……的種種事實。

因爲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是以掠奪爲本務，所以其競相發展的結果，則必然會給人類帶來戰爭的威脅，在「蟬」中對於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台灣人有深刻的寫照。因珍兒的病轉成肺炎，他的父親純真顧不得是防空演習的夜晚，把孩子送進了醫院，相對於醫院外的飛機空中亂舞、低空飛行投彈、爆裂臭氣四溢，醫院內則是寧靜的、和平的、安詳的，在這教人的地方，純真看到大

路

——集體即與創作

你說的話我都聽不懂
我說的什麼你也聽不下
你們到底在說什麼我都不知道
都是胡說八道。

細細的聽你就會明瞭
細細的看你就會看清楚
我們可不可以把以前的都劃掉
但是看到了你也不會忘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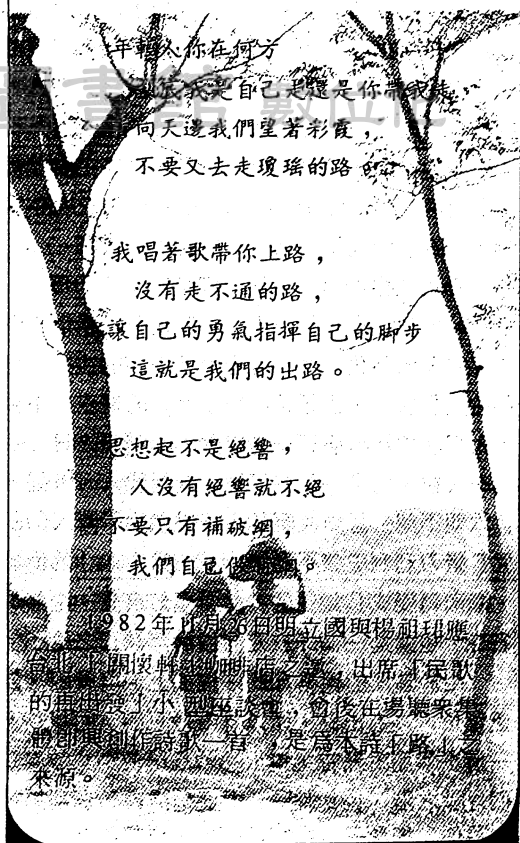
我們在找一條路
一條屬於我們自己的路
要敢走才有路
雖然是一條崎嶇不平的路。

年輕人在何方
我們是自己是還是你帶我走
向天邊我們望著彩霞，
不要又去走瓊瑤的路。

我唱著歌帶你上路，
沒有走不通的路，
讓自己的勇氣指揮自己的脚步
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思想起不是絕響，
人沒有絕響就不絕
不要只有補破網，
我們自己修補。

1982年11月26日，由國立國史館與楊祖珺應
會北平開懷軒舉辦聯席會議，出席以民歌
的編排發「小園至談」，會後在場樂集
體即興創作詩歌一首，是爲本詩「上路」之
來源。



●光復前台灣文學研究系列●

家守望相助，不分台灣人、日本人互相照顧，於是他便聯想起戰爭這回事來，「戰爭是殺人的東西！一個彈丸可斃幾千幾萬的生命！一個小孩子從小到大，不知道費盡了他們底媽媽的心血！為什麼世間的人們不守自己的本分，偏要構成這個殺人東西的戰爭來！」作者由對資本的、帝國的、殖民主義的批判，進而對人類的戰爭提出質疑，予以強烈的譴責。

「島都」中史明的走向於社會運動，另一重要原因則是迷信獎勵。這固然是帝國主義的伎倆，利用封建桎梏來愚弄殖民地人心，以阻撓改革進步，利用其直接有效地控制。但這也牽涉到那夾雜在半封建、半資本形態中的島民性格，它既是牛步化的守舊、愚昧、迂腐、迷信，像「紀念樹」中梅的姑母，其口頭禪是「也着人，也着神」，所以生病時最相信女巫的話，肺病被以為犯沖，是被大肚婦人沖著；「秋信」中那群被統治者宣傳的魔力所誘惑，爭先著要去博覽會的村夫們，以及那班藉著「擊鉢吟」去應酬，去巴結當道權勢的詩人；「長壽會」中阿河哥，有錢時會組「雅頌閣」湊熱鬧，而錢用精光了，生病卻要找人幫忙，病重時會發誓，說病好後要永遠戒酒，而出院的第一天便大排酒席；「島都」中史明的爸爸，則是因廟寺建醮，被地方頭兄強迫樂捐，因無力繳納，只好賣兒來給付，最後在憤恨羞愧中投河自盡，照說做醮本來是要庇佑世人平安的，而今卻造成了一家人離散死亡的悲劇。

島民性格的另一特徵，則是牆草般的擺盪、投機、勢利、以金錢為本位，將愛情、親情、道德都完全商品化。像「紀念樹」中梅的丈夫，他婚前大獻殷勤，而婚後則為了個人的財產，不顧太太死活要她抱病賣命地賺錢；「安息之日」中的李大粒，則是一個發了財，就對親人、寡婦來個六親不認、恩斷義絕的人，果然應了鄰人的詛咒「豬刀利利賺錢不過後代」。當「人」的價值，漸漸轉變成「錢」的價值而毫無自覺、毫無反省時，也就是一個民族走向於淪落滅亡之途了。

由於島民的性格如此，復加上環境貧困，缺乏背景，沒有出路，所以當有利可圖，可以往上一層去攀龍附鳳時，無根性的島民便不會放棄這個晉陞之階。在「脫穎」中便是描繪一個利用婚姻關係，搖身一變為御用權貴，忘却了自己的身

份、自己的父母，寧可去給日本人做兒子的人的發跡過程，歷史上亦正是這種人為自己的民族敲響喪鐘的。此篇寫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後，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發動對中國的全方位侵略戰爭，將台灣納入決戰的總體制，推行了一連串倒行逆施的皇民化運動，要台灣人數典忘祖，去做日本的順民。「脫穎」儘管寫於這一運動之前，事實上只要是強權支配的社會，便有見風轉舵的機會主義者，本篇的冷嘲熱諷，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值得島民深自警惕。

這也正如同泗釜在「台灣人的幾個特性」中所診斷的：好戴高帽性、貪財性、老鴛性、奴隸性以及小膽性、渙散性；無知在「神私自制島」中所反映的「自制的項枷化」；張深切在「鴨母」中所指出的「舉柴仔撞目睛」……，要掃除落後的障礙、要擺脫被扭曲的命運，唯賴群眾的自覺革新，才是民族自救圖強之道。史明的醒悟，毅然獻身改革行列；陳秀才的凜然不屈，面對清朝遺跡撫髀衙惡弔，都隱諷了這一寓意。

四、朱點人的理想世界

雖然，歷史的局勢一直在逼近，殖民地的現實環境愈來愈惡劣，戰爭在遠方招手，死亡在暗處呼喚，人們都不知道自己朋友的命運會如何，然而，朱點人在此最絕望，也是最有希望的轉機中，藉著他的小說人物映示了他的理想、他未來的世界。

在「紀念樹」裏，養病的梅在百無聊賴中，突然發現：

「當中有一株桑樹，我記得這株桑樹兒是我初入×公學校那年K給父親種的。那一年K怕是公學五年生吧，他跑到郊外撲蝶，順便把這株樹兒帶回來的，因為他的家裏沒有種樹的餘地，才給了父親，以後就做了我家的所有物了。在我不經意的十年來，這株樹兒既高出屋頂了，直徑怕有五、六寸，樹身約有十五尺高，枝葉茂密綠蔭欲滴了。我就選了這綠蔭底下當做避暑，不，當做我的靜養的地方。果然人得「靜」的生活，才看得出萬物的性情……。」

在「安息之日」裏，守錢奴李仔粒病重時，他如此懺語：

「錢，這個東西是借給世間的人用的」J所

以無論誰都不能把它私有，我在生所有的錢，死後不知要走到誰的手裏去。」「頂好頂公平的，還是沒有富沒有貧，大家平平安安的過著，日子那不是好嗎？」

在「蟬」中，當純真譴責了戰爭的殘酷後，他則如此期待：

「病室裏底和睦的狀態——各人看護自己的病人以外，還要顧及他人底互相相應的狀態——若能夠施之於社會，或是施之於國際，那麼世間就可以永久保持著平和了。」

麒麟，原是古人所傳說的一種罕見的仁獸，唯有聖人降臨時才會出現。這位「台灣新文學創

作界麒麟兒」的夢，也正是仁者的夢、人道的夢、理想主義者的夢。我們姑且不論在被支配的殖民地的歷史格局中，這個大公無私、平等博愛、和睦相處、靜觀自得的烏托邦的夢想可不可能實現？它又是何等的天真、縹緲、虛幻？但同時不正也意謂著它對人類亘古不變的愛的追尋？在歷史上，或許就是這小小的希望之火，再次劃亮了人類那墊存心中的、甜美的、不滅的美夢吧？

其實，朱點人的夢，也正是台灣人的夢；麒麟兒的夢，正是台灣史與台灣文學史的夢，它們那微弱而不絕如縷的麟火，一直在漫漫長夜路迢迢上閃爍、發光、導引。

朱點人先生創作年表

□張恆豪 編

一九三〇年	二十八歲	發表小說「失戀者日記」。(「伍人報」)
一九三一年	二十九歲	發表評論「檢一檢鄉土文學」。(八月二十九日出刊的「昭和新報」) 發表民間故事「城隍爺惱了」。(九月出刊的「反普特刊」)
一九三二年	三十歲	發表小說「島都」。(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二十日出刊的「臺灣新生報」)
一九三四年	三十二歲	發表小說「紀念樹」。(七月十五日出版的「先發部隊」第一期) 發表詩「南國的女兒」。(七月十五日出版的「先發部隊」第一期) 發表短評「偏於外面的描寫應注意的要點」。(七月十五日出版的「先發部隊」第一期，此短評為「臺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專輯的一篇) 發表小說「無花果」。(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臺灣文藝」第一期)
一九三五年	三十三歲	發表小說「蟬」。(一月六日出版的「第一線」，後蒐於李獻璋編的「臺灣小說選」，原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版，印刷中被禁止發行) 發表民間故事「賊頭兒曾切」。(一月六日出版的「第一線」) 發表小說「安息之日」。(七月一日出版的「臺灣文藝」二卷七號)
一九三六年	三十四歲	發表小說「秋信」。(三月三日出版的「臺灣新文藝」一卷二號) 發表民間故事「媽祖的廢親」。(蒐於李獻璋編著「臺灣民間文學集」，六月出版) 與毓文(廖漢臣)、楊守愚、李獻璋合著民間故事「邱安舍」。(蒐於李獻璋編「臺灣民間文學集」，六月出版) 發表小說「長壽會」。(七月七日出版的「臺灣新文學」一卷六號) 發表小說「脫穎」。(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臺灣新文學」一卷十號)
一九四三年	四十一歲	以日文發表「回憶懶雲先生」。(四月二十八日出版的「臺灣文學」三卷二號，為「賴和先生悼念特輯」中的一篇，光復後另蒐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賴和先生全集」，明潭評)

註：一、朱點人有一小說「血櫻」，創作日期不詳，未發表，光復前全稿燒毀。

二、據王詩琅的「台灣文藝作家協會」一文所述：一九三一年六月，台北日僑平山勳、上清哉、藤原泉三郎……等人籌組台灣文藝作家協會，八月發行日本文藝雜誌「台灣文學」，朱點人曾於此發表文章，惜該雜誌已散佚，今從缺，尙望日後增補。

「詩人」又鬧笑話了！

——中華民國詩人代表團在西班牙

□張香華

今年（一九八二）夏天，柏楊和我有歐洲之行，他是應法國高等社會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之邀，去當一個月的研究員，順道第一次觀光歐洲幾個國家。對我來說，這是第二次赴歐洲了。由於前年西遊產生了對歐洲的嚮往，這次重遊，兼做柏楊的嚮導，心中真是無比興奮，所以，很早我們已把法國、德國、義大利的簽證辦妥。正準備束裝前往，忽然，六月底的一天，柏楊和我分別接到第六屆世界詩人大會在西班牙召開的邀請函，會期是七月十九日到廿四日，地點是三天在馬德里、三天在加那利群島。對於這個突如其來的邀請，使我們感到錯愕，因為一方面簽證的時間倉促，旅行社沒有把握辦得下來，另一方面不知道同行的詩友有誰。

對於歷屆都由鍾鼎文組織的中國詩人代表團，柏楊和我既於上一屆詩人大會在舊金山召開時被拒於團外，並且又鬧出了我上台朗誦被阻，改命唱歌的糗事，我們自然不會再去自討沒趣。倒是民生報記者鍾麗慧小姐不知從那裡得到消息問起來，我們據實以告，鍾小姐說，鍾鼎文告訴她第六屆國際詩人大會始終毫無消息，邀請函他一概不知。國內其他詩友，我分別聯繫過蓉子、羅門、方心豫、洛夫、趙天儀等人，雖然他們也都知道第六屆國際詩人大會將在西班牙舉行，原是去年第五屆大會在舊金山的決定，但從此音訊全查。再加上鍾鼎文封鎖消息，所以沒有一個人知道邀請函一事。

我想我們不可能是唯一被邀與會的詩人，正在這時，一位美國詩人忽然從舊金山來了一封快信，問我們要不要赴西班牙的大會，他說據他所知，美國的邀請函全部寄到上一屆主席露絲瑪麗·維京遜的手中，現在他們正在組團。

我們決定前往，但是，直到我們出發前夕，詩友們仍沒有一個人接到鍾鼎文的通知，在自一晚報任副刊主編的年青優秀詩人向陽，他在報館內遇到鍾鼎文時，鍾還是堅持他不知道詩人大會這件事。

在德國慕尼黑辦好了西班牙的簽證，開會的前一晚（七月十八日），我們趕到馬德里，離開機場時已是子夜時分，我們坐上機場的巴士抵達市區，再換計程車到拉斯卡哥斯旅社，一路上所有的商店都已打烊，街衢寂靜，除了燠熱的空氣中有股奇異的乾爽之外，在夜幕裏，很難讓人辨識自己已置身何處。

到了旅社，在櫃檯辦完登記，轉身之際，看到了除我們自己之外的另一個中國人，那就是歷屆中華民國詩人代表團長鍾鼎文的秘書瞿立恒。這一刻馬上證實了那位一再宣稱一切不知情的團長鍾鼎文，原來老早就秘密組好了團，趕辦好簽證，安然的來到西班牙。據後來西班牙主席的英文秘書路易士·波恩告訴我，鍾鼎文這一團人來得不易，為了趕辦簽證，還派人由台北專程到香港領事館去申請，最後才能成行。

組織團體，正式應邀出席國際會議，原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尤其今天，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的處境維艱，更應該摒除私心，全力對外的時候，而鍾鼎文處理此事却像秘密結社一樣避人耳目。一個堂皇的文化交流使命，弄得倒像背著人冶遊一樣鬼鬼祟祟，並且排斥大部分人，只找圈內的人出席，實在令人遺憾。而柏楊和我都慶幸正因為我們在上一屆世界詩人大會中被排斥於中華民國代表團之外，才能分別接到大會直接寄發的個別邀請函，反而促成了我們此行的成功。否則全由鍾鼎文壟斷，一定沒有我們參與的機會。

這次是我第三次出席世界詩會，雖然每次會期僅有短短的幾天，但每一次都從主辦國得到深刻的獲益。大致說來第四屆的韓國和本屆的西班牙是兩個極端，韓國人有紀律，辦事嚴謹，和西班牙人悠閒從容的個性，是個顯明的對比。如果不是後來那件和西班牙主席帕壯爾先生面對面的難堪事，以及目睹中華民國代表團和西班牙主辦單位發生的衝突，我們真會感到西班牙無論男女女都是一團泥和水做的。他們意態閒雅，語言溫文，從前面提到的那位英文秘書路易士·波恩，到大會的職員們，個個臉上沒有一條肌肉是緊張的。每當你有疑問時，他們都非常樂於相助，只不過因為他們天性閒散，往往問了半天，你的問題仍一成不變的擺在原地，得不到明確的答案。他們習慣的答覆是「也許」「大概」「有可能」。大概是因為他們這副和善的態度，使中華民國代表團忽略了應邀做客的身份，及國際友誼間應有的禮儀，做出了一連串叫人心驚肉跳的事，更不幸的是其中一件事又把我牽扯在內。

大會的第二天，代表團的瞿立恒忽然向柏楊鄭重的道賀，他說：「恭喜，恭喜，你夫人當選了大會亞洲區的代表，這個機會難得，千萬不能錯過，請她準備一下，後天就要上台講演。」柏楊對這突如其來的恭喜感到意外，他告訴瞿立恒直接向我說。於是瞿立恒走到我前面重覆了剛才那段話，並且附帶加上幾項說明，他說：「妳準備一下演講，告訴大家中國詩歌源遠流長，從詩經開始至今，一直在亞洲居領導地位，凌駕韓國、日本之上，是亞洲最優秀的詩歌……。」我不知道他說這番話的目的是什麼，在這樣一個聯誼性的場合，講這些不倫不類的話，是何用意？他看我沒反應，接着說：「要不然妳就坐在主席台上，不要講話，只要嘴巴動就可以，這些話由我透過麥克風在後台替妳發言好了。」接着他問柏楊有沒有照相機，叮囑柏楊要從正面、左右側面分別各拍一張，因為他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絕對不能錯過，再說，」他看看柏楊又看看我：「柏楊先生一直全力栽培張香華，所以，這個機會萬萬不能錯過……。」我覺得已沒有再聽下去的必要，索性打斷他的長篇大論，我說：「我們既不屬於中華民國代表團，請不要來騷擾我們。」瞿立恒這時却堅稱這不是代表團的意思，

而是西班牙主席帕壯爾的宣佈，「這是他開幕時常眾宣佈的，我親自聽到。所以妳一定要上台，這件事與國家榮譽攸關，妳儘管坐在上面，我來代妳發言好了。」我覺得滿頭霧水，為什麼這件事我自己一點都不知情？開幕時我也在場，卻沒聽到主席帕壯爾的宣佈，而且這樣嚴肅的事，還要上台去演講，怎麼會連個書面通知都沒有？

我只好旁敲側擊的向各國詩人探聽這事的真相，這真是一件十分難以啓齒的事，因為這很容易使外國詩人誤以為我在搞派系，製造機會，爭取支持。我小心翼翼的向美國女詩人 Carol Hill 和澳洲詩人 Patrick Brian 打聽，他們都困惑不解的表示沒聽說起有分區選代表的事。最後我向我們的鄰居韓國打聽，韓國團長趙炳華和女詩人金良植、申東春表示，他們還是第一次聽說，接着他們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使我困窘到了極點。

倒是大會的英文秘書路易士·波恩充滿了友善的說：「也許吧！我也不大清楚，妳不妨明天到大會辦公室查查看有沒有名單？不過無論如何，妳到了西班牙就是最好的事，是不？」他不求甚解的笑容露出一團和氣，他是我們一開始趕辦簽證時所接觸到的第一個西班牙人，說話總是慢條斯理的，看來他實在弄不清楚我這個東方來的中國女子為什麼老是焦急，不管怎麼說，他的好脾氣解除了我的緊張。

不過那天晚上的另一個局面却使我再度陷於尷尬難堪。因為翌日就是瞿立恒所說的上台的日子，可是我始終不能肯定這件事的真實性，晚飯時，湊巧大會主席帕壯爾先生一個人在用膳，我想索性直接了當問他吧，看他怎麼說，帕壯爾先生還未聽完我的問題，就用濃重西班牙口音的英語打斷我的話說：「妳們中國人照相的機會多的是，總會安排給妳們的……。」我心想，糟了，他把我弄成昨天在朗誦會上中國代表團中的一員，當時正輪到中國詩人的朗誦，沒想到鍾鼎文率領的代表團一行十人竟一轟而上，在台上大家比手劃腳，爭相照相，大呼小叫讓人對鏡頭，足足鬧了一陣，最後才在一位七十多高齡的老先生用中國話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之下結束了這場表演。當時與會的各國詩人紛紛皺眉蹙額，有的還退席，真不知道中國人為什麼那麼愛照相，和那

麼愛大聲喧嘩，把一個藝術氣氛極濃厚的朗誦會場弄得亂哄哄一團。現在看來帕壯爾先生不管我問的是什麼，一味以為我又要求上台照相了。

當我弄清楚帕壯爾先生的法語比英語流利時，我立刻召來陳玉惠——一位我過去教過的學生，在法國留學，當時正參加劇團在馬德里附近公演，在詩人大會期間，她特地趕來看我和柏楊。我立刻要陳玉惠向帕壯爾先生用法語說明我的來意，只見帕壯爾先生用流利的法語，和一付冷漠而厭煩的神情一再向陳玉惠強調，「要照相有的是機會。」至此，我知道這場誤會是無法用語言來化解了，因為帕壯爾先生對中國人的印象已堅如磐石，而我又怎麼可能告訴他這個消息也是來自另一個中國人（瞿立恒）呢？總之，在他心目中所有中國人的問題看來都和上台照相有關。

憋了一肚子氣，過了一晚，第二天，柏楊還是認為瞿立恒絕不敢撒這麼大的謊，但為了避免事情的複雜化，他決定留在旅社守候，由我一人依時去會場。經過大會辦公室，我順便把攤在桌前的日程拿來看了一看，根本就沒有什麼分區代表名單之類。說時遲，那時快，瞿立恒一頭闖進來，怒氣沖沖的指着其中一位西班牙小姐說：「你們為什麼沒有準備張香華的名牌？趕快準備，她是亞洲區的代表，我親自聽到帕壯爾先生當眾宣佈過兩次，你們快點把她的名字拼出來，是 CHANG SHIANG HUA，現在就做好名牌，今天主席台上有一個人正好缺席，你們把張香華的名牌放在上面，把那位缺席的名牌換下來……」我嚇得不知所措，連忙一面示意請那位女職員不要介意他說的話，一面想此刻唯有趕快脫身一途，因為任何語言都只有使問題更糾纏不清。我轉身走出來，瞿立恒尾隨着我，神秘異常的吩咐說：「妳現在馬上就準備上台，而且千萬不要和任何人說起，就直接上台。」我有一種焦頭爛額之感，正在這時，陳玉惠也到會場來看我，她告訴我會場上另一位西班牙辦事人員告訴她說，要上台照相是可以的，以後也許還有機會，云云。我急得全身冷汗都冒出來了，在七月西班牙大暑天的艷陽下，陳玉惠和我氣急敗壞的直走出來，我們決定離開中華民國代表團遠遠的，以求清靜。

誰知那天午餐時分，我和一群韓國詩友同坐

在一桌用餐，忽然瞿立恒出現在我對面韓國女詩人申東春身旁，用英語喋喋不休的談論我，他說：「妳已經上過一次台了，下一次應該把機會讓給中國的張香華，而且張香華在這次大會中十分寂寞……」我立刻大聲叱責他的荒唐，我覺得再也沒有為國家榮譽隱忍的必要，因為越隱忍，國家榮譽受到傷害越大，我用英語（為的是使韓國人也聽清楚）痛斥瞿立恒的失禮，並向她們道歉，申東春帶着譏諷的口吻說：「他真是個愛國主義者，其實他來和我說有什麼用？我又不是大會主席啊。」午飯結束之前，瞿立恒又跑到我的身邊，抱着無限希冀的向我說：「張香華，還有一個機會，可以上台去……」我終於忍無可忍的向他說：「走開，你走開。」柏楊加上一句：「我們朋友遍天下，一點也不寂寞，寂寞的是你，不要再吵張香華。」瞿立恒對柏楊不大敢放肆，馬上改容說：「是的，是的。」

自從出席世界詩人大會以來，我的心情漸漸變得非常矛盾不安。我喜歡參與這個聚會，一方面借此一覽當地的風景名勝，增廣我的見聞，同時又可以結識或者重溫許多異國詩友的情誼，更重要的是這是當今中華民國還能毫無阻礙參加的少數國際會議之一，如果我們能藉此為國家多盡一分力，多爭取一分榮譽，作一點文化交流的基本工作，那麼參加世界詩人大會的意義，就不僅僅個人的活動而已。

可是幾次大會下來，中華民國詩人代表的表現，真叫人怵目驚心，從中國人的毫無紀律，到不諳國際禮儀，在會場上大聲喧嘩，對大會工作人員頤指氣使，甚至疑神疑鬼，懷疑同房的人偷自己的護照，這些衆人皆知的可笑事層出不窮，而這屆大會上，中華民國代表團還有人為了西班牙一道名菜——烤乳豬的肥瘦分配，爭執得口沫橫飛，聲震鄰坐。西方人吃飯時特別講究安靜、優雅的氣氛，最後鬧到在場的外國人，個個面帶厭煩的對中國人側目，還有一位就餐的西班牙婦人，乾脆端起自己的盤子，奉送到這些中國詩人代表的面前，這場爭執才在大家七嘴八舌的勸阻下平息下去。每當面臨這種場面，我就感到和這樣一個詩人代表團並列，實在讓人羞愧難當。

渡過了六天雖然是窘象環生，但畢竟還沒有出大紕漏的日程，詩人大會終於落幕，私下正吁

一口大氣，沒想到就在最後一刻，還是爆發了一樁最令人懊喪的事。原來這次世界詩人大會的榮譽主席是西班牙國王，可是在開會的第一天，主席帕壯爾先生就已經當眾宣佈過國王不能親自前來，謹代他致意，這原是極平常的事，沒什麼特別。可是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鍾鼎文却堅持要在閉幕式上，要大會安排出一個呈獻禮物的場面，作為向國王致敬意的表示。帕壯爾先生顯然已被中國代表團的拍照舉動搞得對中國人產生了厭惡之感，所以表面上唯唯否否，含糊答應。事實上却根本沒有把中華民國代表團上台獻禮亮相的事排入閉幕式中，而鍾鼎文團長還一直在台下眼巴巴的等着再一次的照相良機。

當晚的閉幕式是在馬德里近郊一處多列朵名勝舉行——原計劃在加那利群島的三天日程，後來改在馬德里完成。這天晚會非常隆重，完全是西班牙皇家貴族的氣氛，佳餚、美酒、音樂和詩人的心融合在一起，各國詩人都紛紛在這一夜裡盡情把臂言歡，因為明天大家便各自離去，再見是後年（一九八四）的另一天涯——非洲的塞內加爾共和國。晚會直進行到午夜，漸漸人們開始退席，搭上來時的專車，準備回馬德里。一瞬間人們離去了三分之二，這時鍾鼎文忽然發現他的獻禮節目還沒登台，急得開始出言不遜，他上去和西班牙主席以及工作人員理論，聲音和舉止都和整個晚上的氣氛完全不調和，弄得會場上尚未

離去的各國詩人們好奇不已，結果他們愈吵愈激昂，各國詩人們還以為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匆匆躲到汽車裡去。就這樣禮物被拒收了。鍾鼎文固然傷心氣惱他沒有上台拍一張獻禮的隆重照片，以便回來向國人展示他在國外成功的辦了一樁國民外交，其實真正傷心的還是柏楊和我，為我們國家受到的屈辱掩面。

翌日一早，韓國女詩人申東春在早餐時遇到我們，她要我們猜猜是誰在昨夜二時許打電話給她，我們一時不知道該如何作答，最後她告訴我：是 Chinese，原來中華民國代表團有人半夜打電話給她，竟把閉幕式時鍾鼎文和西班牙主席衝突的窘事，拿來當話題向她們控訴。我們聽了之後，一時只覺得喉頭髮乾，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看來我的矛盾不安心情，將要伴隨我出席到下一次的賽內加爾去。今年（一九八二）的世界詩人大會除了中華民國代表團製造的幾個噪音之外，已經在西班牙的和風麗日中落幕。後來（一九八四）的世界詩人大會主席就是身兼詩人的賽內加爾總統，真希望下一屆的中華民國詩人代表團，會給這位總統詩人留下一點起碼應有的禮貌印象，如果能藉此建立起親善的友好關係，便是為我們在孤立的國際形勢中，多增一分力量。走筆至此，我禁不住學西班牙的一個手勢，在胸前劃個禱告的十字。

憤怒啊!!

我們是花，能創造新的自由底
種子和果實。
資本主義利潤的美麗花朵
社會盛開了
憤怒的勞工和
全世界群眾的飢餓。

我是一朵花，並非表示
我需負責——
對根的憤怒。
但是，我是人，我知道這憤怒、勞工和痛苦，
以及社會的謀殺者。

——節錄 Michael McClure 「中毒的麥子」
南方朔所著「憤怒之愛」第228頁——

——所有有熱血、有理想的朋友，請閱讀美國六〇年代

學生運動本末——“憤怒之愛”——

四季出版公司 郵撥／105626號
電話／3929134（三線） 特價／每本120元

大陸文學

巴金

回想錄

編按：去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登出巴金的「懷念蕭珊」，曾在台灣的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迴響。「懷念蕭珊」是巴金在一九七八、七九年一連串發表的「隨想」之一。以下本刊選錄的也是屬於同時期同系列的作品。巴金寫作這些「隨想」時已屆七十五高齡，在他的「隨想錄」第一集的最後記裏，他曾說道：「我覺得我開始在接近死亡，我願意向讀者們講真話」。這些「真話」不只針對四人幫和文革浩劫，也因着當前大陸的種種問題有感而發。

在四人幫橫行時期，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但巴金「身經百鬥」，沒有「含恨而死」，而且當年壓迫人的四人幫也終於垮台了。巴金說：「他們成了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在慶幸個人的浩劫餘生時，針對四人幫大加撻伐之餘，巴金並不忘記觀照中國的現在與未來，他並不以為目前已經「形勢大好」，因為，他說道，「封建毒素並不是林彪和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曾讓他們完全帶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透過巴金真摯的談話，我們對大陸社會的封建和專制將有更深刻的體會。



巴金在自己的著作法譯本上為讀者簽名
(1979年5月攝於尼斯巴黎大學書店)

毒草病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內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丟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却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我只說兩三句話，我

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只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第二幕閉前煉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我呢，自己吹噓也沒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今天我仍然是說：「我沒有才華。」而且像某某人在批鬥我的大會上所說我寫的都是破爛貨，只有在解放後靠「文藝黑綫」吹捧才出了名這一類的話，還可以作為參考。不過有一點得說明，事實證明所謂「文藝黑綫」是「四人幫」編造的誣衊不實之詞，「文藝黑綫」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稱為「邪書十四卷」。這不足為怪，因為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視，就是不「正」的東西。靠了讀者的保護，「破爛貨」居然「流傳」下來，甚至變成了「文集」。有人把它們當作「肉中刺，眼中釘」，也是理所當然。再說集子裏的確有許多不好的東西，但它們並不是毒草。我不只講過一次，我今後不會讓「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種單行本我倒願意。不印的書是我自己認為寫得不好，藝術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實等等。但它們也絕非毒草。

我一再提說「毒草」，好像我給毒蛇咬過看見繩子也害怕一樣。二十年來天天聽說「毒草」，幾乎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我寫了不少的思想匯報和檢查，也口口聲聲承認「邪書十四卷」全是「大毒草」。難道我們這裏真有這麼多的「毒草」嗎？我家屋前有一片草地，屋後種了一些花樹，二十年來我天天散步，在院子裏，在草地上找尋「毒草」。可是我只找到不少「中藥草」，一棵毒草也沒有！倘使我還不放心，朝擔憂，夜焦慮，一定要找出「毒草」，而又找不出來，那就只有把草地鋤掉，把院子改為垃圾堆，才可以高枕無憂。這些年來我有不少朋友死於「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也有一些人得了種種奇怪的恐怖病（各種不同的後遺病）。我擔心自己會成為「毒草病」的患者，這個

病的病狀是因為害怕寫出毒草，拿起筆就全身發抖，寫不成一個字。

我不是藝術家，也沒有專門學過文學。即使因病擱筆也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一月二十二日

遵命文學

我說我不是藝術家，並非謙虛，而且關於藝術我知道的實在很少。但有一件事情也是不可否認的；我寫了五十年的小說，雖然中間有十年被迫擱筆。無論如何，我總有一點點經驗吧。此外，我還翻看過幾本中外文學史，即使丟開書就完全忘記，總不能說腦子裏一點印象也沒有。

人們經常通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很少有人只是因為想做作家才拿起筆。我至今還是一個不懂文學的外行，但誰也沒有權說我寫的小說並不是小說，並不是文學作品。其實說了、罵了、否定了也沒有關係，稱它們為「破爛貨」，定它們為毒草也無關係，只要有人去讀，有讀者肯花錢買，它們就會存在下去。小說「三國演義」裏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好像人是罵得死的。可是據我所知（當然我的見聞有限），還不曾有人寫過什麼誰罵死作品的故事。我的作品出世以來挨的罵可謂多矣，尤其是在一九六六年以後，好像是因為我參加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有人生怕我擠進亞非作家的行列，特地來個摘帽運動似的。「四人幫」不但給我摘掉了「作家」的帽子，還「砸爛」（這是「四人幫」的術語）了「作家協會」，燒毀了我的作品。他們要做今天的秦始皇。他們「火」、「棍」並舉，「燒」、「罵」齊來，可是我的作品始終不曾燒絕。我也居然活到現在。

我這樣說，毫無自滿的情緒。我的作品沒有給罵死，是因為讀者有自己的看法。讀者是我的作品的評判員。他們並不專看「長官」們的臉色。即使當時的「長官」們把我的小說「打」成「毒草」，把我本人「打」成「黑老K」，還有人偷偷地讀我的書。去年七月我收到一封日本讀者的信，開頭就是這樣的話：「一九七六年我轉託

日本朋友的書店而買到香港南國出版社一九七〇年所刊出的『巴金文集』，我花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今年四月才看完了這全書，共十四冊。」（原文）一九七〇年正是當時在上海管文教的「長官」徐某某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的時候，也是我在幹校勞動給揪出去到處批鬥的時候，香港還有人重印我的文集，這難道不是讀者們在向「長官意志」挑戰嗎？

我這樣說，也絕非出於驕傲。我是不敢向「長官意志」挑戰的。我的文集裏雖然沒有「遵命文學」①一類的文字，可是我也寫過照別人的意思執筆的文章，例如「評『不夜城』」。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我第二次去越南探訪前葉以群同志組織我寫的，當時被約寫稿的人還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給，我一再推辭，他有種種理由，我駁不倒，就答應了。後來，我又打電話去推辭，仍然推不掉，說是宣傳部的意思，當時的宣傳部長正是張春橋。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難，似乎有些害怕。當時說好文章裏不提「不夜城」編劇人柯靈的名字。文字寫好交給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我就動身赴京作去河內的準備了。上飛機的前夕我還和蕭珊同去柯靈家，向他說明：我寫了批評「不夜城」的文章，但並未提編劇人的名字。此外，我什麼也沒有講，因為我相當狼狽，講不出道歉的話，

（一九七〇年八月攝於上海）
巴金的夫人蕭珊女士



可是心裏却有歉意。三個多月後我從越南回來，知道我的文章早已發表，「不夜城」已經定為「大毒草」，張春橋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對柯靈感到歉意，而且不願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標題我至今還說不清楚。同時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實，因為另一位被指定寫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這樣他反倒脫身了。

這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我靠邊的時候，在批鬥會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說我包庇柯靈，我自己也作過檢查。其實正相反，我很抱歉，因為我沒有替他辯護。更使我感到難過的是第二年八月初，葉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幫」的迫害含恨跳樓自盡，留下愛人和五個小孩。我連同他的遺體告別的機會也沒有！一直到這個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譽才得到恢復。我在追悼會上讀了悼詞，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國文藝界失去這樣一位戰士，我失去這樣一位朋友，我在心裏說：絕不讓再發生這一類的事情。

在這個儀式上我見到了劉素明同志和她的五個孩子。孩子們都長大了。把他們養育成人，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何況以群死後第二個月單位就停發了他的工資，作母親的每月只有幾十元的收入。這十三年十分艱苦的歲月是可以想像到的。這是一位英雄的母親。她在「四人幫」的迫害下，默默地堅持着，把五個受歧視的小孩培養成爲我們祖國各條戰綫需要的年輕戰士，這難道不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嗎？

一月二十四日

①我這裏用的“遵命文學”和魯迅先生所用的意思並不一樣，這裏“遵命”二字的解釋就只是聽別人的話。

「長官意志」

我不是藝術家，我只能說是文藝的愛好者。其實嚴格地說，我也不能算是作家，說我是寫家倒更恰當些。「寫家」這兩個字是老舍同志在重慶時經常使用的字眼，那個時候還沒有見過「作家」這個詞組，我們曾被稱爲「小說家」。記得

一九三三年上海「東方雜誌」徵文欄發表了老舍同志和我的書面意見，兩個人的名字上都加了「小說家」的頭銜。老舍同志不用「小說家」的稱呼而自稱「寫家」，只能說是他很謙虛。我稱自己為寫家，也有我的想法，一句話，我只是寫寫罷了。對於寫作之道和文學原理等等，我是說不清楚的。最近有幾位法國漢學家到我家裏作客，閒談起來，一位年輕的客人知道我就要着手寫一部長篇小說，他問我倘使寫成它將是一部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回答說我寫小說連提綱也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要寫什麼主義的作品，我只想反映我熟悉的生活，傾吐我真摯的感情。至於我的小說屬於什麼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或者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結合？應當由讀者和評論家來講話。作為「寫家」，我講不出什麼。但作為讀者，我還是有發言權，對自己的作品也好，對別人的作品也好。因此對寫作的事情，對具體的作品，我還是有自己的意見。我並不敢說自己的看法正確，但有時候我也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即使它們和評論家甚至「長官」的高見不同，我也會保留自己的看法。

前兩年有一兩位過去在「上海文學」或「收穫」作過編輯的朋友對我說，張春橋在上海「作官」的時候，對他們罵過我。我又想起在批鬥我的會上有人「揭發」刊物編輯用了我的稿子受到張春橋的責備。當時張春橋是被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是「好人」，他罵了我就說明我是「反動派」，是「壞人」。在「四人幫」及其爪牙的心目中，文藝也好，作家也好，都應當是他們的馴服工具。他們隨便胡說什麼，都有人吹捧，而且要人們照辦。我記得一九七五年徐某某忽然心血來潮，說出版社的首要任務是「出人」。出版社不出書，却出人，那麼學校幹什麼呢？可是徐某某是「長官」，大家都要學習他的「新的提法」。本來是胡說，一下子就變成了「發展」。「三突出」、「三陪襯」等等的「三字經」不也是這一類的胡說嗎？想想看，一個從事創作的人發明了種種的創作方法來限制自己，等於在自己的周圍安置了種種障礙，除了使自己「行路難」之外，還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又如張春橋過

去大吹「寫十三年」①的「高見」，北京有人剛剛表示懷疑，他就大發脾氣。他在上海的時候，你要反對「大寫十三年」，那可不得了。其實誰也知道這種「高見」並不高明，也無非使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而已。我還記得還有一位主張「寫十三年」的「長官」，有人請他看話劇，他問：「是不是寫十三年的？寫十三年的，我就去看。」不幸那齣戲偏偏比十三年多兩三個月。他一本正經地說：「不是寫十三年的，我不看。」

這並不是笑話。上面一段對話是我親耳聽見的。雖然請看戲的人和被請看戲的人都已離開人世，但那位只看「寫十三年」的人因為是「長官」，人死了，餘威猶在，還可以嚇唬一些人。的確有一些人習慣了把「長官意志」當作自己的意志，認為這樣，既保險，又省事。所以張春橋和姚文元會成為「大理論家」，而在上海主管文教多年的徐某某也能冒充「革命權威」。當然這有許多原因，張、姚二人五十年代就是上海的兩根大棒。難道這和「既保險、又省事」的人生哲學就沒有一點關係嗎？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却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裏的確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却是事實。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推廣這個方法。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台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臉不認人。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確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製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於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

成風。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別越來越高。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只好在「封神演義」裏去找「走資派」了。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台。「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於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賣帳，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讓我這個不懂文學的「寫家」再說幾句：為什麼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三十年代的上半部，出現了文藝活躍的局面，魯迅、郭沫若、茅盾同志的許多作品相繼問世，而在「四害」橫行的時期，文藝園中卻只有「一花」獨放、一片空白，絕大多數作家、藝術家或則擱筆改行、或則給摧殘到死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一月二十五日

①十三年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一顆核桃的喜劇

「家」的法譯本序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後，有個朋友寫信問我，在按語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繼承人吃剩的一顆核桃的喜劇是怎麼一回事。我現在來談一下。

首先讓我從「往事與隨想」中摘錄三段話來說明這件事情：

「在一個小城裏還舉行了招待會，皇位繼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個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員中間有一個喝飽了酒的高長子馬上走出來，這是縣陪審官，一個出名的浪子。他從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進衣袋裏去。

「招待會之後，陪審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

面前，把殿下親口咬過的桃核送給她，太太很高興地收下了。然後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裏，又到第三位太太那裏——她們都十分歡喜。

「陪審官買了五個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滿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為她那顆桃核是皇位繼承留下來的……」

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裏，這種「喜劇」是經常上演的。不過「皇位繼承人」給換上了「中央首長」，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別人，桃核給換上了別的水果，或者其他的東西如草帽之類。當時的確有許多人把肉麻當有趣，甚至舉行儀式表示慶祝和效忠。這種醜態已經超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們的表演了。我們在某一兩部影片中還可以看到它的遺跡。除了這種「恩賜」之外，十多年來流行過的那一套，今天看起來，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鑼打鼓半夜遊行等等。

這些東西是從哪裏一下子跳出來的？我當時實在想不通。但是後來明白了：它們都是從舊貨店裏給找出來的。我們有的是封建社會的破爛貨，非常豐富！五四時期這個舊貨店給衝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給保護起來了。蔣介石後來又把它當作寶庫。林彪和「四人幫」更把它看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四人幫」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實他們道道地地在販賣舊貨。無怪乎林彪整天唸他的「政變經」，江青整夜做呂后和武則天的夢。「四人幫」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厲害，在國際上混到了個「激進派」的稱號。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來既可悲又可痛。

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麼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麼在某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天幾次高聲「敬祝」林彪和江青「身體永遠健康」呢？

在抗戰的八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炸」，沒有給炸死是僥倖。在林彪、「四人幫」干擾破

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鬥」，沒有「含恨而死」，也是幸運。幾乎在每次批鬥之後，都有人來找我，或者談話或者要我寫思想匯報，總之他們要我認罪，承認批鬥我就是挽救我。我當然照辦，因為頭一兩次我的確相信別人所說，後來我看出批鬥我的人是在演戲，我也照樣對付他們。在那種場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時期的見聞。我六、七歲時候我父親在四川廣元縣當縣官，我常常「參觀」他審案。我一聽見有人叫喊「大老爺坐堂！……」我就找個機會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講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細的竹板打光屁股。兩個差役拿着小板子左右兩邊打，「一五一十」地數着。打完了，還要把挨打的人拖起來給「大老爺」叩頭，或者自己說或者由差役代說「給大老爺謝恩」。

我當時和今天都是這樣看法，那些在批鬥會上演戲的人，他們扮演的不過是「差役」一類的角色，雖然當時裝得威風凜凜彷彿大老爺的樣子。不能怪他們，他們的戲箱裏就只有封建社會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藥並不是林彪和「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會讓他們完全帶走。我們絕不能帶着封建流毒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我四十八年前寫了小說「家」。我後來自我批評說，我反封建反得不徹底。但是那些認為「反封建」已經過時的人，難道就反得徹底嗎？

沒有辦法，今天我們還必須大反封建。

二月十二日

要不要制訂 「文藝法」？

我國的憲法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這所謂「自由」絕不是空話。這裏說得很明白，一個人從事文藝創作活動，只要他不觸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應該受到干涉。憲法上並沒有規定還有一種拿着棍子和帽子的人可以自由干涉別人的文藝創作活動，可以隨便給人扣帽子，向人打棍子



在巴爾扎克墓前（一九七九年四月攝於巴黎）

。然而有人說是不是還要制訂一種「文藝法」，他並非在開玩笑，他實在是膽戰心驚，因為拿棍子的人就在近旁，他們並不躲躲藏藏，却若隱若現，有時甚至故意讓你看見，在這些人的腦子裏，憲法是不存在的，他們對待第一個憲法和第二個憲法有了豐富的經驗，他們只是在等待時機。所以說話的人真正希望刑法之外還有一種「文藝法」，上面說得明明白白，寫什麼主題，怎樣寫法，如何開頭，如何結束，哪一種人可以作反面人物，正面人物應當屬於哪一種人等等，……這樣一來文藝工作者就可以「安全生產」，避免事故了。

這種想法似乎很妙。其實一點也不妙。首先不會有人出來制訂什麼「文藝法」。其次即使有了「文藝法」，它也不會像安全帽那樣保護工作的人。我還記得「四害」橫行的時候，因為有人說「文藝工作危險」，就大批「文藝工作危險論」。「四人幫」及其爪牙大批「文藝工作危險論」的同時，又大整文藝工作者。凡是在文藝工作上有一點成績的人都挨過整，受過迫害，有的給弄得身敗名裂、妻離子散，有的給搞得骨灰盒中只有一枝金筆或者一副眼鏡。總不能說這不是一場百年難逢的浩劫吧。

現在形勢大好。不過所謂「大好」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解釋。我們是在一面醫治創傷，一面奮勇前進的時候，我們應當鼓足幹勁，充滿信心，但是絕不能夠自我陶醉，忘記昨天。我們還得及時給身上的傷口敷藥。還要設法排除背後荊棘叢中散發出來的惡臭。有人大言不慚地說「

現代的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衣無食之慮，日不怕盜賊執杖行兇，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漢輕輕叩門」，這種白日做夢信口開河的做法是不會變出「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來的。

然而在今年六月號的「河北文藝」上就出現了這樣的話。文章的題目是：「『歌德』與『缺德』」。用意無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難道作者真以為「社會主義」就是靠吹牛吹出來的嗎？不會吧！「四人幫」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國國民經濟吹到了崩潰的邊緣，難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見，就不明白？

那位作者當然不是傻瓜。他有他的想法。就有這麼一夥人。有的公開地發表文章，有的在角落裏吱吱喳喳，有的在背後放暗箭傷人，有的打小報告告狀。他們就是看不慣「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他們就是要干涉這種「自由」。憲法不在他們的眼裏。其他的法律更不在他們的眼裏。

那些給蛇咬過，見了繩子也害怕的人最好不要再搞文藝創作，你們希望有一個「文藝法」來保護自己。有人就是不同意憲法給你們的這種權利，你們怎麼辦？

道理非常簡單：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必須經過鬥爭。

八月五日

絕不會忘記

我還記得我十二、三歲的時候在成都買過一種「良心印花」，貼在自己用的書上。這種印花比普通的郵票稍微大一點，當中一顆紅心，兩邊各四個字：「萬眾一心」和「勿忘國恥」。據說外國人譏笑我們是「一盤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所以我們發售這種印花以激勵自己。我那個時候是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後來我相信了無政府主義，但愛國主義始終丟不掉，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一直受到各種的歧視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運始終跟我的祖國分不開。

然而有一點我應當承認：我當時貼了印花，

我記住了國恥紀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條約「二十一條」，五月七日提出，五月九日袁世凱表示接受，因此當時有兩個國恥紀念日），但過了一個時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乾乾淨淨，偶爾想起來自己也感到難過：難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鐘的熱度」嗎？我每自責一次，這個記憶在我的腦子裏就印得更深一些。所謂國恥早已雪盡。今天的青年並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我沒有忘記，而且我不願意做健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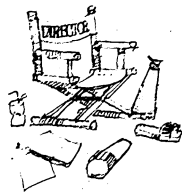
這一年我身體不好，工作較多，很少時間讀書。但偶爾也翻看了幾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寫了他們個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有的接觸了一些社會問題……，總之，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個時期我們社會生活的真實的側面。有人討厭這些作品，稱它們為「傷痕文學」、「暴露文學」，說這些作品「難免使人傷悲」，使人「覺得命運之難測、前途之渺茫」。也有人說：「鬥爭才是主流」，「寫反抗的令人感憤」。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夢，還是別人在做夢？難道那十一年中間我自己的經歷全是虛假？難道文藝界遭受到的那一場浩劫只是幻景？「四人幫」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興別人控訴他們的罪惡和毒害。這不是健忘又是什麼？我們背後一大片垃圾還在散發惡臭、染污空氣，就毫不在乎地丟開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滿身傷口，難道不讓他們敷藥裹傷？

「忘記！忘記！」你們喊吧！這難忘的十一年是沒有人能夠忘記的。讓下一代人給它下結論、寫歷史也好。一定有人做這個工作。但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給他們留一點真實材料呢？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個人的遭遇如實地寫下來呢？難道為了向前進，為了向前看，我們就應當忘記過去的傷痛？就應當讓我們的傷口化膿？

我們應當向前看，而且我們是在向前看。我們應當向前進，而且我們是在向前進。然而中華民族絕不是健忘的民族，絕不會忘記那十一年中間發生的事情。

八月六日

電影廣場



• 第三世界電影系列探討 •

今天的印度電影

——三位印度新潮導演訪問記

慈林教育基金會 韓良露 · 譯

前言

印度人民喜歡看電影是眾所皆知的事，在飢荒、疾病、貧窮蔓延的印度，電影成爲群眾逃避現實的出口；電影不僅是娛樂，更是人民的麻醉劑，使他們可以暫時脫離現實的痛苦。如此一來，導致印度電影工業的蓬勃發展，但由於把持電影工業的商人，以壟斷性的利益爲前提，故大量生產粗製濫造的影片，只求滿足自己的荷包，不顧任何社會或藝術的責任。

薩泰吉雷崛起印度影壇後，爲死寂、保守的印度電影帶來美學的復甦，雷成爲國際影壇矚目的印度電影大師。然而，雷的影響並未匯成強大的新電影潮流。直至近二十年來，不少年輕人從電影學校畢業，投身電影界工作，他們在電影內容和形式上，都明顯地和傳統的印度電影有所不同，這些新一代的電影導演，逐漸演變爲印度電影的新浪潮。美國的前進電影雜誌 Cineaste 在八二年第四卷上訪問了三位印度新導演，可做爲了解印度電影新氣象的起點。

■ 馬連奴山簡介 ■

馬連奴山是印度新電影的老將，並且是這個運動在意識型態方面的領導人。他一九五六年拍攝完第一部片子 Raat Bhore，一直到一九六九年，當他拍攝 Bhuvan Shome 後才開始一系列地拍攝討論當前問題的影片。這期間拍的影片，最「Calcutta 71」、「Pada tik」、「Chorus」，大都是探討農村地區日漸緊張的政治衝突，這些影片都具有相當的顛覆力量，引起不少爭議。馬連奴山最近的一部影片 Ashaler Sandhane 得到了八二年柏林展的銀熊獎。

電影作者應成爲 觀衆的代言人

——訪馬連奴山

問：許多人認為印度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不可能拍攝政治電影，基於這個前提，你個人是否拍攝過政治電影或有關政治的電影？

答：我拍過的許多電影都牽涉到政治環境，有些角色還和政治人物有關。不管如何，我一直希望在電影中把持著一個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視野。我自認是個社會動物，自然會對圍繞我週遭的事物有所反應，我不能逃避和社會的關係。即使在我處理一對男女間的關係時，我也希望賦予他們較豐富的社會背景。

我有一部電影「日覆一日」(EK Din D-ratidin)，敘述一名獨立維持家計的女人，有一夜她突然失蹤了。這部電影的場面大都在室內，卻仍然顯示社會、政治和道德壓迫的現實。這些壓迫控制了人們的社會行爲，也控制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我不同意那些說我們不能拍攝政治電影的人，當然專制政府就不會允許一些有顛覆性的影片，但是並非所有的政治電影都要強調破壞力，只要提供一個政治的角度亦可。最要緊的是面對事情的態度。

問：有些電影作者認為，在當前印度電影環境下，只能以寓言的方式討論政治問題，你是否遭受到這類環境的壓制？或者你會對自己百般限制？

答：有些體制的規範確實使我難以行事；不過，如何超越束縛或妥協還是操之在我。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必須偷偷摸摸地拍電影，或私下放映、討論影片？就像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情況一般。參加這類秘密試片活動，會惹來不少危險，只有那些全身投入政治的人，才能承擔這種風險。許多人很想分享電影作者的想法，卻不敢去看影片。這正是為什麼對印度而言，能夠公開放映任何影片是多麼重要的事。

電影作者必須扮演雙重的角色，一方面必須對抗壓制我們的官僚人員、政治規定和法律——他們一直希望阻止我們行使正當權力。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學得實際一點，爲了要完成影片，必須和現存的體制略作敷衍。

舉一個例子來說，Govind Nihalani 的電影「傷者的哭號」(Aakrosh)，表面上這部影片在處理一個部落的組織和其社會成員的矛盾

角色，其實這片子真正討論的是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危機。此外，更有意義的是，這片子大大地攻擊了印度的國法制度。這麼一來，我們才了解為什麼要用部落做爲影片的情節設計，以向印度的法律制度大加批評。這片子達成了有益的政治目標，這一切却是和專制權威週旋而來的。

問：許多人認為我們高估了電影對印度社會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政府根本不會在意電影，政府覺得電影沒有什麼實際的功效。當然，接著他們會說，既然你們不能用電影影響政府或改變社會，爲什麼還不放棄呢？你是否同意這類說詞？

答：電影，就像文學或其它藝術媒介，在社會上有其一定的角色。它們帶來一種氣象，也會激起某些爭議。我的作品提供了具有正確觀點的訊息，使得人們能成爲一個較開明、較客觀的觀眾。

我不同意高達所說的「電影是一把槍」，這種想法太浪漫了。我們不能靠波坦金戰艦（俄國導演艾森斯坦的影片）去推翻政府或體制，即使有十部波坦金戰艦也不成，我們惟一能做的就是創造一個允許討論的環境，去對抗不民主和法西斯的社會。

問：電影想要有影響力，就要靠觀眾支持，你們這些影片受不受觀眾歡迎？

答：我們有一些固定觀眾，但總數還沒多到能滿足商業的需要。我們必須做到——這點在印度是慣例，我們也不例外——採用低成本製作。我們要向那些獨占的企業家展示，電影並不一定要靠資本密集或只能由他們壟斷。電影可以變成每一個人的事業，而且沒有人能壟斷。我們必須善加考慮經濟因素，想辦法多吸引一些觀眾，最後才能建立廣大的觀眾群。

問：農村的觀眾反應如何呢？你們這些影片是否會在鄉村地區上映？

答：沒有上映。農村的觀眾有種奇怪而矛盾的反應。觀眾一方面在現實中希望有政治變遷，一方面又排斥政治性的教化。在一個叫 Bengal 的地區，住滿了窮人、佃農，他們曾投票選出講共產主義的國會議員。這個地區相當廣大，但大多數的影片卻不到一星期就下片，可是有一部片子卻上映了八個多星期。這部片子講的是一個會行使神蹟的人如何戰勝了科學家。電影中的農民期

待雨水灌溉，但卻沒有任何辦法獲得雨水，直到一個奇人帶來神蹟。就是這些觀眾，他們一方面投票給那些主張變遷、土地改革的政客，一方面又顯現他們對科技毫無信心，情願依靠奇蹟。這種意識型態分裂的局面，正是我們必須對抗的。



「大飢荒」一片讓人憶起一九四三年的印度大飢荒，當時一年內死了五百萬人。

問：你最近的一部電影「大飢荒」(Sandhane)描寫到有一群電影工作者到農村去拍攝一九四三年大飢荒的情景，然而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他們卻逐步地破壞了農村的民景。這部影片是否在批評印度的電影工作者一窩蜂到農村拍片的現象？還是對個人電影工作的自我反省？

答：這部影片試圖處理許多層面的東西。它希望讓人憶起一九四三年的大飢荒，當時一年內死了五百萬人。然而，直至今日，飢荒的情形仍然使得我們束手無策。這群電影工作人員原本想下鄉去拍些過去的事。但隨即發現過去的歷史變成現實。只要我們對現實保持客觀的距離，像原先拍片的目的，我們把歷史當成博物館裡的陳蹟，我們就不會不安。但是一旦我們接近現實，我們就無從逃過了。

問：是否近來有這樣的趨勢：年輕的電影從業人員下鄉拍片，拍攝農村景物，卻和當今的現狀互不相關？

答：正是這樣。不過，我不想隨意數落別人是非時犯錯，我寧自我批評——這是我終身的指南。現在有許多導演，都發現農村是拍片的好背景，他們就拿起攝影機，任意闖蕩。的確，有不

少重要的導演拍過一九四三年的大飢荒這個題材；我的這番評議不僅針對他們而發，對我自己一九六〇年拍的「婚禮那一天」(Sravana)也同樣有意義。

問：目前一般人談起印度電影，都會談到三個潮流。一是傳統的电影，其次是薩泰吉雷的電影，以及在雷的影響下長大的印度新電影作者。這種區分你覺得恰當嗎？

答：今天印度電影的主流仍是傳統印度片，這些片子都和藝術或現實無關。薩泰吉雷是個革命性人物，在雷之前，從未有過具有震撼力的電影工作者，是雷使印度電影的發展開始有了藝術的自覺。

我們這些新電影的工作者，有不少被歸類於受雷的影響。但是，到目前而言，雷已經成爲一個風靡人物，一個超級大師，反而比較少人受其影響了。對我來說，我當然樂於看到雷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成功，但我對現實保有自己的觀點，而這些都和雷的看法差異甚大。我想對其他人也是這樣的。我們對電影、對世界，都有我們自己的想法和態度。

問：你們這些新電影作者，對電影看法又是怎麼樣的呢？

答：我一向認爲電影不同於其他藝術型態。電影是不斷演變的；電影的語言也不斷在發展，比起其他藝術型態的變化更快。我剛開始拍電影時，用的是傳統的敘事手法，後來當我更了解電影後，我發現傳統的敘事形式之外別有天地，想想看，即使早在三〇年代，艾森斯坦就曉得在電影中加上字母了。

在「大飢荒」中，我企圖運用我對電影的所有想法去拍片，同時，我避免在拍攝荒瘠的農村風光時，拍得像幅美麗的畫。我認爲把事物拍得醜陋，保持它們原本粗糙的風貌是很要緊的。我不想只做一名電影的專業人員或傳統份子，我希望盡可能有效地溝通，和觀眾互通聲氣。電影作者應該成爲觀眾的代言人——激起觀眾的心聲，刺激他們採取行動。

最近我常常感到電影已逐漸喪失了從平凡事物中產生的力量，這些平凡事物容或不太刺激有趣，卻是每個人日常生活的真實。因此，我企圖在我最近的一部片子「萬花筒」(Chaalchitra

）表達這些。我發現如果我們愈依靠戲劇化的情節事物，我們愈會脫離了真實人生，真正的生活是由一些瑣細普通的人事組成的。

問：大多數的新電影作者是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有些在電影同行看來很有意思的片子，卻引不起觀眾的興趣。你是否找到了什麼辦法去彌補你個人的看法和觀眾看法間的差距？

答：如果不是我的親身體驗，我怎麼明白觀眾的看法是什麼？我只能不斷地嘗試和犯錯。印度的觀眾向來喜歡看一些什錦片，有歌唱、跳舞和老套的故事。直到雷來臨了，他證明他那一套對觀眾也有吸引力。當我談到我不依靠戲劇化的結構，只是拍些平凡無奇的生活瑣事，這是新寫實主義者早就做過的事了。我認為新寫實主義可以不斷演進。如果我們拍些表面不重要的生活細節，而讓觀眾感到有意思，他們可以得到認同感，能從我們所提供的細節中了解自己，這一切就很值得了。我認為忠於觀眾最好的方法是忠於自己的意識。



導演：居希卡南

■居希卡南簡介■

居希卡南的演藝生涯是從擔任演員開始，他曾在 Pattabhi Rama Reddy 的電影「葬禮儀式」(Samskara) 中，飾演一名反抗專制的婆羅門社會的年輕人，這類題材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佔有強大的影響力，像「家族樹」和「Kaddu」

這兩部片子，都在探討印度傳統社會的問題。卡南轉任導演後，仍然不放棄電影的演出，他在不少新電影中擔任要角。他最近的一部片子是 Ondanondu Kaladalli，這是一部歷史戰爭片，處理十三世紀的一段歷史。卡南宣稱他將這部影片獻給日本電影和日本名導演溝口健二。

我們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的社會

——訪居希卡南

問：你在未投身影圈之前，是位著名的劇作家兼演員，你為何進入電影界呢？

答：我正式投身影界是由於閱讀了一本六十年代中期的 Kannada 小說——(葬禮儀式) Sam-skara。那時，我和一個名叫 The Madras Players 的小劇團共事，我們花了好幾年的時光討論如何將這部小說搬上銀幕，突然有一天，劇團中一名有錢的會員決定資助我們，我們就開始工作，我負責撰寫劇本並飾演主要角色。

這份工作十分艱難。外界傳說這是一部帶有革命色彩、反婆羅門、反宗教的電影，所以每一個村莊鄉鎮都不歡迎我們前往拍片。不管怎樣，片子是拍完了，卻很快就遭受禁映的處分。後來，政府還是准許片子上映，並且未動一下剪刀，稍後，這部片子還獲選為一九七〇年的最佳影片呢。

問：你執導的首部作品是「家族樹」(Vams-a Vriksha)，是根據一本著名但是飽受爭議的小說改編的。

答：在「家族樹」發行之前，電檢制度已大有改進，其實，這部片子接受了婆羅門社會的價值標準和觀點，而「葬禮儀式」則否，它對「正統」的基本倫理提出了質疑。可是，「家族樹」卻提出另一種看法，那就是說，這些價值標準可能是錯的，人們也可能是錯誤的，可是它提出的最多也只有這些了。它展現家族的問題，即何謂家族？父子之間如何聯繫？「葬禮儀式」卻對印度教整體的形上學提出相當基本的質疑：我們是否能夠評斷他人，並且決定他人的階級？同時，更

根本的問題是，何人具有評斷的權力？而「家族樹」這部片子絕不提出類似的問題。

問：「森林」(Kaaou)則與「葬禮儀式」呈現的宗教論述和「家族樹」的家族問題大不相同，這部影片看來多少有些驚人與暴力。

答：「森林」這片子是在紀錄一個村莊。全片的主題在說明：我們生活在一個不穩定的社會，隨時都可能有突發的暴力。當前的社會，暴力是無法避免的趨勢，近來的一些影片一譬如「傷者的哭號」一即不斷地覆述此種觀點。然而，在七〇年代早期（即「森林」拍攝當時），大眾尚未接受這樣的想法。我們直到最近才承認，傳統社會在摧毀自己，因為它已老化僵硬了，一點小小打擊便會牽一髮而動全身。



「葬禮儀式」對印度教整體的形上學提出相當基本的質疑。

問：你的影片以及B.V.Karant的「柯馬那的鼓」(Chomana Dudt)，可說是南方新浪潮的先鋒。你可否談談這個潮流？

答：在最初的四部電影——「葬禮儀式」、「家族樹」、「柯馬那的鼓」和「森林」在卡那達(Kannada)上映之後，突然興起了一種風潮，大家開始明瞭，如果導演把片子處理得好，那麼就不會賠本。於是一種電影運動——一種很奇怪的「新浪潮」於焉誕生。同時，政府也開始對卡那達地區的电影提供補助金。這些片子大多是低成本預算的片子，因此補助金乃預算的主要來源。

問：目前南方的非商業系統影片情況如何？

答：逐漸有炒冷飯的現象，所有的片子開始變得十分類似，它們都太耽溺於古老的印度——那種充滿廟宇和儀式的印度。彷彿我們有的只是異

國情調，每個人都盼望着宗教節日、迷信或巫術。

問：身為演員兼創作人，你為電影界帶來了一種整體的舞台工作傳統。在印度電影中是否有演技傳統？

答：印度的傳統戲劇和日本的能劇可相提並論。就算在社會劇中，你也能發現其中演技是十分風格化的。早期的電影工作者只是將傳統照本宣科，根本不管那種風格是否適用於故事的內容或主題，於是呈現出的成果往往看起來很奇怪。僅就印度電影而論，也很難找到任何演技傳統的痕跡。大多數表演的人根本不算是演員，其中有些的確不錯，但是如此一來很可能會失去成為明星的機會。

問：好萊塢也是如此啊。

答：對，只要你一旦成為明星，就變成一種形象，而人們都不敢去破壞那個形象。明星制度終極的哲學是，明星就像一個朋友，你不會希望你的朋友天天都在改變。觀眾到戲院去看電影，心中想到的是某種固定型式的電影，他們可不希望受到驚嚇。

問：印度電影的本質是不是使此等情況變本加厲？

答：印度電影在發展任何傳統時，所遭遇的問題是，三十年來的印度片大多由一些自由劇作家、工作人員以及業餘製片人拍攝而成，他們都是非常投機的。人們只想儘快行動，只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明年、下個月、甚至明天會在哪兒。沒有人知道自己是否還會繼續拍片，而事實上，真的沒有繼續的可能。所以，如果有人成功了，便會重複自己，就連Raj Kapoor這樣有才氣的人，在Awara一片嚐到成功的滋味之後，有好長的一段時光盡在述說同樣的概念。

問：觀眾的情況呢？

答：印度電影院的大本營在城市裡，全國一萬多家戲院大多數座落於城市。如今城市改變了，電影院也變了。三〇年代時，城市居民主要是中產白領階級，所以我們拍一些「頗值得尊敬」、絕對不向傳統價值挑戰的電影。隨著戰事的發生，情況有了改變。電影業被一些發戰爭財的人所把持，他們買下明星、片廠和設備。更明白的說，城市性質的改變在於國家的分裂（殖民地印度

後來分裂成兩個獨立的實體——印度與巴基斯坦）。那時，大批無家可歸的人群一窩蜂地湧入城市。此外，工業化的結果在城市中產生了工人階級。五〇年代的孟買與四〇年代的孟買大不相同，無產階級已經形成，貧民窟開始蔓延，印度的農村也被破壞，印度村莊優美又浪漫的自治精神在五〇年代瓦解了，大批無家的農民因而遷入城市。

所以，短期之間，印度觀眾再也不是城市佬，而是不安、憤怒又無根的勞工階級。他們無家可歸、露宿街頭，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影。然而孩童和他們無根的父母不同，他們生在貧民窟中，電影對他們不僅是娛樂，也是他們全部的文化。所以，目前的情況是一種很難打破的惡性循環。電影是在提供這些人們想要的東西，還是電影工作人員只在拍他們自己想拍的片子？

圖：目前主導影界的主題或敘事方式為何？

圖：電影往往要那些令人舒服、具體又有票房的形象，目前流行的形象是 Ami tabh Bachchan（印度頭牌的電影明星）——一位失去兄弟的憤怒男人。兄妹分散、千里尋妹，重整旗鼓整頓家園。這種形式是雙面的，一方面，是對家族制、由父母口中聽來的傳統安逸生活的鄉愁；另一方面，由於他們並非生活在這種環境，故而感到憤怒，並產生暴力意識。每一件事都改變得很快。他們毫無基礎，他們越來越憤怒，因為他們沒有職業又沒有錢。印度電影奇怪地綜合了這種對宗族、對好人好事、對誠實無私的人的同情。對貧窮總有一種說法——窮人即為好人——這一切又混合了憤怒成份。印度片便藉著一名邪惡、富有而通常開著美國車的暴君來轉移這種憤怒。

圖：所以印度的電影觀眾實際上受著經濟和階級的分界。

圖：印度的觀眾可分為五類。第一類，這是最重要的——為勞工階級。另一類則是婦女，有一種片子特別吸引女性，就是那些頌揚家庭且以女性觀點拍攝的影片。印度女性從不單獨看電影，他們往往三五成群結伴前往，有時還會帶著孩子一塊去。如果她們喜歡，更會一再前往觀賞。第三類則為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他們喜歡有品味的片子，那些非商業系統的電影。小成本製作的

電影希望吸引的就是這些觀眾。他們抱持著頗為嚴重的嚴格主義態度，如果你拍有關「性」的場面，或是討論成人問題，他們便會抵制，他們會不准婦女和小孩去看。我的作品「很久很久以前」（Ondanondu Kaladalli）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這種觀眾認為它太暴力了。

圖：但是這部片子並無流血鏡頭，全都是風格化的暴力。

圖：片中殺人場面看不見一滴血，這是我們故意做的。你知道，觀眾在北印度片中見到打鬥場面時，很快地就了解那根本是假的。對於我的片子，觀眾常常會感到困惑，因為片中角色對打鬥事件的態度似乎頗為嚴肅。許多男人不允許妻子去看這個片子。在片中有一個場面是兩個人像老虎一般地作愛，這一來把許多人嚇跑了。有許多家庭不來看，只是因為那個場面，總而言之，總是有這樣的觀眾，所以，不管你想要拍多特殊的電影，總是會受到限制的。

圖：這些限制既然存在，那麼地方電影的希望何在？

圖：目前，政府方面的情況比十年前好多了，由於政府的資金補助，如今在卡那達一年可以出品七十五部電影。然而仍有一個瓶頸存在，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戲院。我們真正的希望是政府不僅出錢拍片，還能夠出錢建築一些小戲院。像我們這些低成本影片較適合在小型（容納二五〇～三〇〇人）的電影院放映，因為這些片子需要觀眾口碑和影評文章，而且要讓觀眾知道它正在上映。如果我們能為觀眾提供代替的影片，一種可供替換的娛樂，我們便極有可能生存下去，並且打破商業影片加諸於我們的壓力。

■ 卡塔曼坦簡介 ■

卡塔曼坦畢業於「電視電影中心」，曾做過一陣子的電視節目製作人。他有感於印度農村地區普遍的不安和動盪，人民迷信無知，因而決意要拍攝這類的題材。他的第一部作品 Bhaavaai 使他成為印度新電影的新銳份子。這部電影的形式複雜，以傳統敘事方式說故事，兼具布烈希特的疏離調子，迄今尚未在印度做商業的公開放映，但已經引起影界極大的矚目與爭議了。



導演：卡塔曼南

對於壓迫和現狀 應採取明確的立場

——訪卡塔曼南

問：爲什麼你要拍攝一部有關世襲制度與賤民制度的片子呢？對大多數的西方人而言，這些似乎都是過去的事情了。

答：從電影學校畢業之後，我在電視台工作了大約一年半。我在Gujerat旅行了許多地方。爲勞工、賤民和低階級做了一系列的節目。我突然了解到——原先我自己也認爲是過去的事——低等階級與賤民仍然飽受壓迫，我必須挺身爲他們做一些事。同時，我發現這個Bhavai老故事（Bhavai是一種傳統的民間故事形式）具有社會自覺的種子。

問：這個故事有多老？

答：大概有三、四百年的歷史了。總之，本片所透露的賤民的苦境似乎更嚴重。在南印，在東岸、西岸，在中印的許多地方，這種情況均存在已久。隔離政策與人民所受到的壓迫都是真實的歷史，而且直到今日仍以某些形式存在着。

問：爲何要用民間故事的形式呢？

答：這只是因爲我認爲印度的商業片也同樣從民間故事傳統中大量汲取靈感。雖然我們的根源相同，可是他們卻加以曲解。總之，商業片摒棄了這些根源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Bhavai這種形式在戲院及鄉村地區仍十分流行，人們能夠

認同。此外，它包含了布烈希特式的疏離感、社會批評和諷刺，往往引起許多社會迴響。這就是這個題材與形式吸引我的理由。我嘗試去創造一個具有社會自覺、民間形式與現代真實情況的合成體。

問：雖然印度觀眾對這種形式相當熟悉，你認爲他們能明白你的用意嗎？

答：當然，我們試著儘量避免太過深奧。我堅信，就算本片在印度未造成很大的聲勢，可是畢竟有效地闡明我自己的論點——非常公開、強烈、絲毫不隱瞞。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印度電影工作者應了解到我們主要是要爲印度觀眾拍電影，我們必須找到觀眾熟悉的形式。所以，目前以這些民間形式來拍一些主題與題材是很適宜的。

問：爲什麼本片迄今仍未在印度公映？

答：片子剛拍完時，Gujerat發生很厲害的階級暴動，由於本片探討賤民問題與階級制度，所以沒有人願意發行，甚至有人威脅我們，假若影片放映的話，不管是在何處，那個地方都會被燒掉。現在一切都歸於平靜了，我會安排上映事宜，假使沒有人接手發行，我們就自己來。

問：非傳統、非商業片若想上映是否很困難？是不是有時候連一部非商業片都沒有辦法上映？

答：商業片發行商造成我們很大的阻礙。由於印度的戲院數量不足，而且基本上均爲商業電影獨佔，其他種類的影片簡直無法獲得合理的上映機會。更糟的是，政府很少插手阻止這種獨占事業。政府對發行事宜不採取立場，自然無法協助非商業片的上映。每個人都同情投機商業片商，所以他們盡力阻止非商業片的發行，因爲這些片子有可能會代替商業成品。

然而，這並不是惟一的原因。有些非商業片十分深奧，好像只是爲城市菁英份子和布爾喬亞而拍的，並未考慮到大多數的印度觀眾——勞工階級的需要，這的確是個問題。我深信，娛樂性與社會自覺不一定是互相矛盾的。

在印度，有一個字眼monoranjan，mon指心與心靈，所以monoranjan暗謂你必須用心與心靈去完成你的作品。我們的民間傳統似乎就包含了此種成份。人們整夜看戲，一點也不會覺得乏味無聊，而且他們也很喜歡其中的諷諭和社



Bhavai 一片中，老敘事者以說古口吻來製造喜劇結局。

會批評。在印度，這種合成的類型剛以連貫的層次興起，雖然以前在Marinal sen或Ritwick Ghatak的作品即有此種傾向。現在約有廿個導演試著拍一些能吸引大眾的片子，這些影片能夠緊緊捉牢觀眾，並對他們說一些道理，這對印度觀眾而言真是一個改變，也是電影業向前邁出的一步。

問：可是這仍未解決發行的問題啊！

答：人們對發行問題開始有了自覺意識了。國家電影發展組織（National Fil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FDC）對影片發行提供貸款，現在電影從業員可以試著自己發行，或找別人替他發行。同時，NFDC（印度監督非商業電影的政府機構）也開始建立小戲院，仍舊稱為藝術戲院，同時開始推展發行工作。在大城小鎮均有這種電影院。

問：讓我們將話題扯回你的電影 Bhavni。Bhavni，它的風格和內容與許多類似的印度電影

都不相同，觀眾陷入整個故事中，然後又用敘事者的旁白將他們的距離拉遠，這種手法效果非常好。然而，讓我困惑的是它的結局，或者說那兩個結局。其中一個是賤民的反抗失敗，另一個結局則成功了。

問：印度戲劇沒有悲劇傳統，每一齣戲都是喜劇收場，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美好，這或許很重要，但是喜劇結尾常常與現存事實完全相反。所以在 Bhavai 中，當那個老敘事者以說古人口吻來製造喜劇結局時，和真正的事態卻相反了。而不管建構全片的自覺意識，以此種結局收尾是對觀眾玩弄小詭計，我覺得這種把戲很醜惡，所以必須有另一個方向。也就是，將觀眾距離拉遠。這就是為什麼也是觀眾之一的老敘事者之子會打斷他而說道：「我受夠了喜劇結局，我們不要再裝假，不要再創造無法增進了解的故事了。」

問：本片對印度的觀點是否太冷酷、太悲觀？

答：印度並沒有改變多少，獨立之後，我們只是多了一種本國的布爾喬亞階級和地主階級，官僚盡力在建立壓迫人民的制度。同殖民時代與帝國主義時代相比，我並不能感受到任何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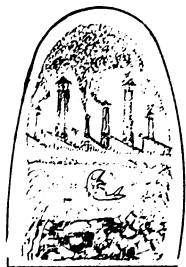
問：印度觀眾是否如 Bhavni Bhavai 感受到相同的冷酷與悲觀？

答：新聞界和觀眾的反應均十分熱烈，他們覺得這種傳統民間故事形式很吸引人。然而，吸引他們的主要還是其內容。你知道，Gujerati 電影一直很爛，往往是北印度電影的陳腐翻版。階級暴動中的反動份子，威脅要燒掉放映本片的場所，這件事本來就是種種紛爭的很好證明。

問：你是否認為像你這樣的電影作品能夠改變印度的電影方向？

答：到目前為止，每年仍只有幾部這樣的片子上映，要瓦解這少數幾部片子是很容易的。但是等到每天有廿~廿五部的產量時，人們便無法瓦解或忽略這個運動了。而這種情形就快要發生了。現在已經有更多具社會自覺，與當前社會更具關連，又對壓迫及現狀採取確切立場的影片出現。想要不斷壓抑這些片子是很難做到的，它們終會與他們的目標——觀眾合而為一。

本文譯自八二年的 Cineaste 雜誌第四期。



環境與公害

一隻台灣黑熊的控告

□徐上山

有一天，臺中地方法院接到了地球史上從未有奇異控訴事件，棲居中央山脈的所有野生動物聯合控告居住福爾摩沙（臺灣）島上的人類犯了集體謀殺罪。法官本著法律之前萬物平等的法則，宣佈接受此一案件，擇日開庭審判。

人類因事關全臺名譽，臺灣省議會、臺北市以及高雄市議會經過多日辯論及折衝，終於決議聘請名律師包大勝為全臺人士辯護。

開庭那天，出庭的原告代表赫然是隻臺灣黑熊，牠顯得老態龍鍾，憂愁滿面，潤嘴咬著一包紙袋裝著的文件。包大勝律師則携著一個錦蛇皮製的美麗公事包，身著一件豪華的鹿皮獵裝。後面還跟著一羣要出庭做證的證人。

「黑熊先生，為什麼只有你一隻出庭呀？原告不是很多嗎？唔，我看看……」法官翻開告狀書說：「是呀，看，有雲豹、梅花鹿、獼猴、飛鼠，有……哇，這麼多！」

「法官先生，牠們都不敢前來，您想想，這些野生動物都住在深山僻野裏，而許多人類尚不辭千辛萬苦地前去殺害、捕捉、誘拐他們；因此如果牠們自動前來，我想他們下車時，必不是到了臺中地方法院，而是什麼大飯店、名餐廳的廚房裏了！」黑熊慢吞吞地講。

「那你又怎麼敢前來呢？」法官不禁好奇地問。

「是這樣的，法官先生，」黑熊解釋說：「我原有一個青梅竹馬，可是當我們即將要成親時，她遇上了一羣能說善道的人類，說什麼她的膽值台幣三萬元，皮值台幣二萬元，掌值一萬元，而她的命一文不值。她就這樣不知所終。」黑熊嘆了一口氣，繼續有點嗚咽地說：「從那時起，我走遍了全省山脈，再也找不到雌熊，我發現我是唯一剩下的臺灣黑熊，我已沒指望了。因此拼著老命，來替所有中央山脈的野生動物，請求法院伸張正義保障生存權利。」黑熊說著不禁老淚縱橫。

「抗議！」包大勝律師大聲叫著。

「甚麼事？」法官問他。

「牠不能用眼淚當證據，這裏是法院，不是演哭調仔的戲院。」包大勝律師說。

「會議成立！」法官宣佈：「你有何證據？黑熊先生。」

「法官先生，請您立即打個電話去仁德中醫診所、回生中醫藥房、或必返春大國手那裏問問，他們是否有熊膽出售，如果有，就可證明許多臺灣黑熊遭到謀殺。」黑熊說。

於是法官依了黑熊的建議，把電話接了過去。

「有，有，您找對地方啦！」對方顯然以為生意上門：「您要那一種？日本的熊膽一兩五千元，臺灣黑熊值一萬元，要我們送去，還是您來看貨？您知道，這年頭熊膽極缺貨，臺灣全省也只要一、二家有呀！」三家幾乎同樣回答。

法官放下電話，把錄下的談話內容放給大家聽。

「抗議！」包大勝律師大叫：「這不能做為證據，應即刻找人請三藥房的主持人前來法院做證。」

於是三個人十多分鐘就到了，他們在車上時已知道整個案件的內情。

「法官先生！」必返春大國手代表作答：「是這樣的，這年頭那來熊膽呀！剛才我們講的其實都是豬膽，反正病人也分不出來，而且事實上熊膽有多少效果只有天知道，我想它的效果完全是心理作用罷了！」必大國手無可奈何的解釋。「你們可別太認真了！」說到這裏必返春大國手突然靠近法官，輕聲附在法官旁說：「倒是坐在那邊席上的黑熊，我方才偷看了一下，像是雄的，我倒願以十萬元買他的膽哩！」他這裏一面講還一面斜眼瞄著原告席上的黑熊。

「此外，如果法官先生您還要問像什麼鹿鞭、虎骨酒、海狗丸或著犀牛角之類，也就是這麼

一回事。但爲了生意理由，您可要禁止記者張揚開去，不然咱幾個就會遭到公會開除會籍的惡運了。」必大國手顯得有點後悔，幾乎向法官要求了。

黑熊頹然低頭，不住地嘆氣。

包大勝則得意地東張西望。

黑熊突然從紙袋中取出一些文件來說：「我控告你們福爾摩沙的人士，自古以來大量謀殺野生動物。看這段！那是瑞士人黑爾伯特（ALBV-ECHT HERPORT）寫的一本：『爪哇，臺灣，東印度及錫蘭旅行記』：「在臺灣有難以相信那麼多的鹿……鹿都強壯肥胖，每年被居民打死和活捉的不計其數。」「再看這本中村孝志教授根據長崎荷蘭商館日誌中歷年接貨單上的統計，臺灣在 1633 年有十一萬二千張鹿皮，一六三八年有十五萬一千張鹿皮，一六五五年十四萬四千張銷往日本。」

「再來看荷蘭在臺灣最後一任長官 FSEEDR-IE COYETT 在其所著一被忽視的臺灣一記述說：有許多野獸，尤其是鹿，比得上任何國家的產量。」黑熊將這些文件交給了法官，然後說：「由此可見，你們臺灣人士每年殺死多少野獸。」

「法官先生！」包大勝舉止優雅地向法官打個手勢說：「就人類心理學來講，沒有釣起的那一條魚永遠是最大的，因此那些文件，無論是日本人、荷蘭人都好，他們佔據臺灣，但最後又吐了出來。因此他們都犯了我說的話，沒有釣到的大魚那種毛病，因此該文件不值得做爲證據。」包律師把雙手往他的鹿皮夾克口袋一插：「又所謂的旅行家通常都是吹牛專家，各位可以看看汗牛充棟的旅行書刊，不外一個原則，外國的月亮特別圓、特別亮、特別大，而風景則特別美麗，野獸特別多……所以那個瑞士的吹牛專家實也不足採信。況且，這些都是幾百年前的事，根本無法求證，黑熊先生應該拿近代最近的證據。」

法官點頭看著黑熊，黑熊又拿了幾張文件出來，是幾則最近的剪報。

「第一，」黑熊唸其中一張：「花蓮一位獵人去打獵，誤殺了獵友。此人顯然是去打獵，所以應以違犯禁獵法及謀殺野獸未遂罪起訴。」

「第二，南投縣政府爲了防止山難，派隊勘查奇萊山回來後，大談在山上獵殺好幾隻飛鼠烹

食。這不但違反禁獵法，並且犯了一級謀殺野獸罪，他們是公務員，知法犯法應加重處罰。」

「第三，公路工程處在調查新橫貫公路預定線回來後承認，有山胞多人在秀姑巒山一帶圍獵雲豹，他們也犯了禁獵法及謀殺野獸未遂罪。」

「有關第一條新聞」包大勝律師起來覆說：「那位誤傷朋友的早就以過失殺人提起公訴，至於黑熊先生控訴他還犯了禁獵法，但據現場調查報告，該處除了老鼠及青蛙，甚麼野生動物，甚至麻雀也沒有，當然他們沒有打獵行爲，至於報上說獵人、獵友的，完全是想像的，像兩隻小狗玩玩追獵的遊戲一樣，故本案不能成立。」

「有關第二條，那完全是宣傳的手法，以引起社會人士重視奇萊山難事件。如果他們真烹食飛鼠，我們的警察人員早就逮捕肇事者。報紙上不是報導同行的有一個是警察嗎？黑熊先生，你應該相信我們的警察才對！」包律師有條不紊的回答。

「至於第三條，除非你請雲豹太太出庭做證，並指認追逐的人，不然也不能成立。」

「可是雲豹——」黑熊說：「她自那次被追捕以後精神有點失常，而且患了極嚴重的恐人症，再也不會在人前出現了，那還敢出庭呀！」

「那我們很抱歉，此案不能成立。」法官說。

「但，至少你們應派員調查啊！」黑熊說。

「好的，」法官說：「我們將委託打獵俱樂部的專家代爲調查。」

「我控告人類侵佔土地權。」黑熊說：「從前我們隨意可居住福爾摩沙全島任何地方。然後人類來了，把我們敢入深山，最近人類復進入深山侵佔了我們覓食以及居住的森林，砍伐我們的樹木，因此人類犯了侵佔罪！」

「喲！黑熊先生！」包律師雙手插腰，聲音裝得哆裏哆氣，「你們要住那裏，我們人類從來也沒有禁止你們呀！臺北新公園、臺中公園，甚至地皮很貴的圓山動物園都很歡迎你們去住。只要你們不隨地大小便，不然要罰六百元。至於你說我們侵佔野生動物的土地，你能否拿出土地所有權的登記文件？」

「甚麼是土地所有權文件？」黑熊不解地問。

「那就是在地政事務所登記有案，證明那塊

土地屬於你們所有的證明文件呀！」包律師不屑地回答。

「我們沒有。例如，我們黑熊只在四週的樹幹上留下爪印來表示我們的私有土地，而且我們自古，比你們人類還早就住在那裏，根本沒有必要向什麼事務所的去登記！」黑熊霍然站立起來，幾近咆哮。

「嘿！就像狗洒一泡尿來表示牠的勢力範圍嗎？那是不成的，不然國家的交界處豈不成了糞便堆積處？誰管你從何時住起，沒有證明文件，侵佔罪就不能成立。抱歉！」包大勝律師手一揮坐了下去。

「你們的山地同胞集體謀殺野獸，」黑熊又燃起了希望，「自從有了禁獵令以後，我們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但山地同胞却以大批獵狗，用大量陷阱捕殺我們，我們因此死去的不比立禁獵令以前少。」

「黑熊先生，我們人類的確想要保護你們，因為如今人類需要動物遠勝於動物需要人，而且人類只有與動物在一起時他才知道他是人類，因此我們才立了禁獵法，設下國家公園以及野生動物保護區。看，這篇中副刊登的『失去的地平線』不也大聲地為你們請命嗎？再看看這篇聯合報的劉復興記者不是也曾為你們說了公道話？看這二本圖文並茂的冊子，是觀光局為了保護你們印行的。黑熊先生，回去告訴你們的同伴們，好日子就要來了，要牠們小心不要踩到陷阱，並推派代表去與獵狗進行和平談判。」包大勝律師帶著彷彿憂傷而又令人感動的語氣說。

黑熊忽然站起來說：「好，這些都過去了，那麼我請問，我們動物園的野獸，犯了何罪，必須終身監禁？」

「嘿！你那些動物園的朋友，他們都是自願的，」包大勝律師說：「看這賣身契、合同、買賣證明、輸出輸入證明，都由你的朋友親自蓋了足印。來，三位園長請把複印的文件交給黑熊先生。」

「事實上你那些動物的朋友生活得比您老還好啊！」包律師說：「不愁吃、不愁住、不用擔心陷阱、獵狗，和偷獵的人，寂寞了，我們也幫他們找新娘或新郎。您看，最近我們還將花數億元來為圓山動物園建立一個二百零七公頃的豪華

動物園哩！」

「黑熊先生，不要氣餒。等你作古以後，我們將請臺灣最棒的動物標本製作家夏教授為你做成一具勇猛無比、活生生的標本，放在博物館裏永遠供後人憑弔。」包大勝安慰黑熊說。

黑熊掉下了淚珠，是恨、是感謝，牠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經過一陣休息後，法官終於上臺宣判：

「臺灣野生動物聯名控告人類謀殺一案，因罪證不足，不能成立……但是，因為居住福爾摩沙島的人類不當地大量繁殖後代，的確妨害了其他野生動物的生存權，因此判定人類有罪；人類必須在各大報，刊登向所有野生動物道歉的啟事，還要賠償象徵性的三百銀元。」該奇案遂告一段落。

第二天，臺灣省議會、臺北市議會以及高雄市政府一致決定，該項賠償由圓山、新竹以及西子灣三動物園的門票裏支付。

又過了不久，黑熊先生接到包大勝律師的一封信，信上說：

偉大的黑熊先生：

首先我向您致敬，敬您的勇敢、正義，敬您的高瞻遠矚；特別是後者，如果您的確是，您必會同意我下面的建議：

根據動物標本專家夏教授表示，要製成上好而又生動的動物標本，必須在那動物體格仍然雄偉，毛髮依然濃密光潔的時候就製作。因此，我建議您，與其等您作古以後再製作出一具老態龍鍾、狀若脫毛病豬的標本，還不如您現在就讓夏教授來把您製成一具美麗，可以傳之不朽，供萬人參觀的標本。

再者，我曾與必返春大國手連繫過，我替您的膽要到了十二萬元的高價，如果您委託我一包大勝當您的經紀人。我保證我們一雙蒙大利。

崇拜您的包大勝敬上

黑熊接到信後不久即欣然下山。又不久之後，博物館展出了一具黑熊標本一蠟製的，的確如包大勝說的，又美麗又生動。而包大勝則除了原來的鹿皮獵裝外，又多了一件熊皮大衣，同時好多中藥店掛出了從包大勝律師處買來的“熊膽”。而事實上該黑熊的膽早已在牠下山途中，被獵人追殺時嚇破了……。

公害日誌

□ 編輯部 □

類別	地區	污 染 內 容	備 考
空氣污染	台北市	根據北市環境保護局最近的一項空氣污染測定資料顯示，今年北市一至九月平均落塵量，懸浮微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化合物等含量，在建成區、南港區及昆明街等地區最為嚴重，且已超過環境品質工業地區的標準，不適合人居。至於林森南路地下道的空氣污染測定，其一氧化碳濃度高達卅七或四八 P P M 值，除了凌晨二時以後至六時前這段時間外，該地下道實在已不適用於車輛人員通行。 台北市議員于秉溪表示，當入夜後空氣污染層下降，將會使老人中風，心臟病發作，小孩咳嗽、氣喘，對人體極為不利。	71 11 21 中國時報
食物中毒	高雄市	到南部畢業旅行的桃園平鎮國中及台中東勢國中學生，廿六日晚在鹽埕區美味香小吃部團體用餐後，不到三小時，不少學生發生上吐下瀉、頭昏虛脫的現象，經送醫治療的學生多達四百九十人，此嚴重的食物中毒案件刻正引起衛生局有關單位和社會大眾的重視。	71 11 28 中國時報
公害防治	澎湖縣	澎湖縣議會昨日修正通過「取締非法採捕水產動植物及毒藥物者現行管制法」，此一單行法規的實施，將對毒魚的惡風及毒劑的非法買賣發生遏阻的功效，法規中還嚴禁出口錢點石斑魚、青衣及鯛類三種高級經濟魚苗，並對魚類的出口均限令在十二公分以上。	71 11 27 青年戰士報
公害追踪	高雄縣 嘉義縣	曾因造成環境公害而遭中門村民搗毀機器的「台灣阿米諾酸公司」，在十月六日發生意外火警，燒毀部份原料，而該廠在十一月十日下午運送補充原料時，又與村民發生衝突，於是決定提前進行遷廠，目前正在拆除儀器，預計明年初完全遷移至嘉義縣太保鄉嘉太工業區內繼續生產，並更名爲「台灣胺基酸化學公司」。換了名字，希望公害能減少一些或至於消失，否則換湯不換藥，嘉義縣民可要遭殃了！	71 11 28 中國時報
垃圾戰爭	台北縣	烏來鄉公所將垃圾焚化爐興建於水源保護區內，完工迄今一年仍無法啟用，鄉公所只好將垃圾傾倒在南勢溪中，結果不但污染水源，且影響附近環境衛生，當地居民向有關單位反映，迄今三個月了，未見下文，他們對縣府的辦事態度，以及大力推行便民利民措施，感到懷疑。	71 12 28 聯合報
噪音污染	桃園縣	中正國際機場周圍的十二所中小學師生，在一項噪音調查報告中，抱怨他們每天在飛機起降的噪音中上課，已有耳鳴、失眠、頭痛、聽力受損、心跳加快、心煩等現象。並且教師普遍有聲帶受損、喉嚨沙啞的情形。教育部正針對這項由衛生署做的調查研究，採取調整課表或改善隔音設備等措施，以減少噪音過度的困擾。	71 12 18 中國時報